

Wang Jianhao发布于
方块字教育读书社区
所有资料均来自网络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历史谜案揭秘

杜导正　廖盖隆　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LISHI MIAN JIEMI

历史谜案揭秘

主　　编　杜导正　廖盖隆

责任编辑　杨　雯

策　　划　袁杰伟　徐庆全

封面设计　康笑宇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illegible]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1068-5/I·173

定　　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历史铁幕之开之合　高层人物之升之沉
重大决策之得之失　锋火疆场之血之祭

目　录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许多人把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支持下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称之为"大抢救"，在这场"大抢救"中获得新生的人，则称之为"第二次解放"。获得第二次解放的人们，忘不了胡耀邦的功勋，更缅怀他那"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的胸怀……

冤惊海内，水落石出

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十年，伴随着党的领导的"左"的错误，无数人的命运像难以抵御风浪的小舟，时沉时浮，甚至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也在劫难逃。冤案迭起，冤惊海内……

历史谜案揭秘

谈起中共党史,人们自然不会忘记瞿秋白;经历过延安“抢救运动”的人,自然忘不了王实味。瞿秋白、王实味的遭遇,留下了太多的话题,太多的思索……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许多人把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支持下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称之为“大抢救”，在这场“大抢救”中获得新生的人，则称之为“第二次解放”。获得第二次解放的人们，忘不了胡耀邦的功勋，更缅怀他那“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的胸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

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老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胡耀邦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

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却出台了。按照“两个凡是”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照旧有效；

建国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三中全会上的胡耀邦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邓小平同志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胡耀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

“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

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我们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

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借口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以写多长？"

耀邦说："《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被迫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人民日报》的同志后来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17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发表。1977

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艰难复出后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耀邦仍认为发表文章的时机未到。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在这个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上，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到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予以全文刊登。

广大读者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决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个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这些信电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里话”;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家子人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平反?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

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文革"后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之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玉峰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动乱，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出有熟人可

投时即离开。郭玉峰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呆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玉峰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刹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

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党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同志。

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决定，郭玉峰调离中组部。经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三、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胡耀邦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

到当年苏区的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不少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这个局有一位局长和六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此后，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对推动平反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胡耀邦身体力行，中组部重新成为"党员之家"

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平反尽职尽责，而耀邦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党员之家"的美名重新大振。

1978年1月，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

同志畅所欲言。这205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一、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二、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三、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北京各高等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了"党员之家"，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郑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4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胡耀邦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平反结论，恢复了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因两条"罪行"被开除党籍。一是1950年，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人打伤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二是，他将《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他被开除党籍后，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65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只给生活费37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71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到中组部上访。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120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为他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派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73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也曾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

他的这番议论很快传到了康生耳里，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领导，要秦川谈谈如何通过"劳动锻炼"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但秦川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由于不认错，部里没有安排他的工作，要他自找门路。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

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才把秦川一并带回北京。"文革"风起，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四人帮"垮了台，他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不久，经中央批准，秦川被分配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的上访者人来人往，就是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的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到耀邦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到卧室找到耀邦。尽管耀邦为修改文章，到凌晨两点才睡觉，他还是倾听了朱鸿翔的诉说。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甦原是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余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甦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7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甦同志彻底平

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甦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6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甦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终生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来到中组部大门内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时曾三已72岁。

1924年就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三，1931年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共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

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许多迭经磨

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像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 年 2 月 19 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平反的两次会议：烟台会议山重水复，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

在为“文革”中遭迫害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平反的问题。早在 1977 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平反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 年 12 月，胡耀邦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平反工作了。

1978 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五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 10 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的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统战部。统战

部有关人员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帐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加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

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特别强调："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展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无疑，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后来，我

由于工作之便而得知，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人数的5.8%。这场大解放，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以实事求是精神解决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大胜利。

胡耀邦是位有名的“红小鬼”，他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功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支持下，为拨乱反正，为党的事业的中兴，作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一线的一个重要成员，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同志一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千百万因为胡耀邦参与领导的“大抢救”而得到第二次“解放”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戴　煌）

“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的前后

一、“六十一人案”的来龙去脉



六十一人案的主角薄一波在七大

在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案件，就是平反“文革”中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六十一人案”。所谓“六十一人案”，是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这个案子的主要内容是：在日寇势力蚕侵华北的1936年，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这批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监狱中的同志，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后离开监狱，重新投人了抗日斗争。

那时候，这些同志都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国民党政府北平反省院。他们当中，有北伐战争前入党的老党员，有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干部；也有当时还没有入党入团但积极要求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叛徒告密、或在大街上发表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而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有些同志在被捕前，已担任了党或团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特委书记或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迫害，他们都一直与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有些人刑期早满，但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宁愿把牢底坐穿。

1935年11月，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结束，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其时日寇魔爪已深入华北，全国抗日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北方局开展工作缺少得力的干部。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这批被关押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以解急需得力干部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们还进一步考虑到，如不及时营救这些同志，不论是日寇侵占了北平、天津，还是蒋介石集团把这些同志转押到南京去，他们都有可能全部被杀害。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提议，并上报党中央，经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缜密研究，让当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给刘少奇和北方局回电，批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北方局立即将这个决定转致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让他迅速派人将决定转送狱中党支部，要求立即执行。李葆华和北平市委另一位负责人徐冰委派当时担任地下交通的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转达了这个决定，但狱中党支部一致拒绝执行。他们的理想是：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将来打

着红旗唱着《国际歌》走出敌人的牢门。

1936年夏天，柯庆施等人再次写信，让孔祥祯辗转送到监狱去。信上说："你们知道谁让我给你们写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志。"狱中党支部负责人薄一波等几位同志都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的化名，这才勉为其难地着手研究如何执行这个决定。从1936年9月开始，他们才断断续续地履行了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了监狱。事后，柯庆施还开玩笑似地对薄一波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

1943年，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薄一波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副团长到了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与毛主席长谈时，他曾说到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你们在班房里做了很好的工作。"

这次长谈后，薄一波整理了谈话记录请毛泽东过目。毛主席在这个记录上批道："个人的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也与薄一波谈了话。在谈到出狱一事时，任弼时说："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后来，安子文等几位同志也与毛泽东谈了话。关于这件事，毛泽东作了同样的表示。

1947年，康生率领中央土改工作团到了山东渤海区，帮助搞土改。1948年春节，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惠民地区信阳县何家湾过春节。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专请康生吃饭，工作团全体成员也"参席"。

饭后，康生与土改工作团团员张琴秋、毛岸英、凌云、于光远、曾彦修等人到村外散步。康生从刘格平也在当年的北平军人反省院里坐过班房谈起，说到了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事。

康生说，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国形势，深感华北形势十分

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来，迫切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却在平津敌人的监狱里，如果再不加紧营救，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转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华北国民党政权汉奸化，这些同志就只有全部被杀。考虑结果，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了出狱手续。当时很多同志都照办了，唯有不属于薄一波他们这个党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才出来，多坐了八年牢。

这个"饭后漫步闲谈"足以说明，康生对这段往事的曲折过程也清清楚楚的，并不觉得薄一波等个人对这件事该承担什么责任。

正因为这些同志的狱中表现甚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功勋卓著，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被党的"七大"和"八大"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都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薄一波等同志于1936年奉党中央之命，以写"自首书"的方式离开敌人监狱，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日月轮转，三十个寒暑，这件事突然成了特大问题。1966年8月4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呼应彻底整垮刘少奇，下令在已很庞大复杂的"彭罗陆杨"专案组中，悄悄塞进与刘少奇密切相关的"1936年专案"或简称"三六"专案。

这时，这批老同志中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为人民壮烈捐躯，或在建国前后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另有二人在战争的生死关头，没能经受住严峻考验而叛变，被自己人处决。"文革"时仍健在的只有40人，其中22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

理;另有13人为省政协副主席或司局级干部,其他人为一般职务。

对所有这些幸存的同志,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予以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说,"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接着康生又到安子文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说:"南开'8.18'、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

在这个杀气腾腾大抓"叛徒"的过程中,尽管周恩来总理多次出面劝阻,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发电报,说明这个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些同志本人是清白的;李富春也给正在广州养病的薄一波发电报,叫他"千万不要回北京"。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动,各地纷纷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把过去所有被敌人逮捕过但已作过正确结论的同志的旧案统统翻了出来,甚至无中生有,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随之,过去在南京、苏州、济南、太原、新疆等地被国民党或侵华日寇囚禁过的老同志,以及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干部,几乎全都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拷打凌辱的"叛徒集团";株连所及,冤狱遍布全国。

此后,薄一波等61人也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不但这40位老同志悉遭残酷迫害,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



胡耀邦到基层考察

志，受到株连审查与迫害的成千上万。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小平说：61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那件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

然而，由于“四人帮”捣乱作梗，这个问题不但没能得到解决，而且中央专案组及郭玉峰主持的中央组织部还强迫一些在北京已被解除“监护”的老同志离开了北京：安子文去了安徽淮南，刘澜涛去了安庆；与“三六”专案毫无关连的彭真，也被勒令去了陕西。那些人也曾勒令薄一波去河南南阳，还要派人押送他去。薄一波坚决不从，并再三抗议，才被勉强地留在北京。

专案组的人对薄一波不止一次地警告或“提醒”：“你讲这个问题(指1936年出狱经过)，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

你不讲，对你有利，讲了对党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们的意见办，将来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从宽考虑。”

对刘澜涛等人，专案组的人也是这样说：“不要写 1936 年履行手续出狱的事，‘中央同志都知道’。你要把这一历史事实抹掉，重写。”

二、王先梅上诉——“六十一人案”平反的突破口

粉碎了“四人帮”，尤其在 1977 年 7 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之后，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再次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1977 年 11 月 11 日，两次向狱中党支部转达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逝。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情的经过呢？”孔祥祯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孔祥祯在这封信中，还把 1936 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李葆华和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薄一波等人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但是，没想到，中央专案组和郭玉峰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的一些人依然冥顽不化，又一次逼迫薄一波离开北京城。薄一波

还是照样坚决不去。双方正在相持中，耀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当他提出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时，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大为震怒，大发脾气："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

恰巧，与"六十一人案"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申诉人是位女同志，名叫王先梅，是"六十一案"之一王其梅的遗孀。王其梅当年离开敌人监狱时才22岁。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他担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不久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6年秋天出狱后，他遵照党的派遣，去开辟豫东根据地，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特委书记、地区党政军委书记、地委书记、旅政委、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师政委、军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十八军副政委兼进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和政委，首先率部解放昌都进入拉萨，随之被调回昌都兼任十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和昌都地区分工委书记，指挥部队修建川藏公路。"文革"前，他已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康生等人酿造了"三六"大案，身患重病的王其梅在1967年8月就被迫害辞世。他在北京的家，也早被查抄封门。他的妻子王先梅，是1938年14岁时参加八路军后又转入新四军的老同志，此刻与4个未成年的孩子分住4处。后来，王先梅把分住几处的8岁到16岁的两儿三女都聚拢在一起，去了她所在的轻工部江西"五七"干校。

1973年5月，江西干校撤销，按规定，没工作的孩子们带回北京。经周总理批示，开始发给这些孩子的生活费。但是，孩子的户口未能在北京落下，却被转到河北固安县五七干校。此后，

孩子们在分配工作、参加政治活动等等方面，都因其父“六十一人案”问题未解决而屡遭磨难。

面对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王先梅心境很难平静。1977年12月8日，她向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信，信中简单叙述了孩子们的遭遇，接着说：“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我的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以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使发挥他们的特长。

“党早有政策，出身没有选择的余地，‘重在表现’。但一些地区和单位在具体执行中，政策往往不能兑现。十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不少实际问题而得不到解决。根据党的政策和孩子们的现实表现，我感到对他（她）们说服无力，我和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经过一番辗转投递，此信到达邓小平面前已是12月25日。邓小平当即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问题不应影响其家属子女。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汪东兴看了也接着批示：“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中午，耀邦才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三时许，耀邦委派的中组部毛建梅、王盛湖两位同志，找到了右安门王先梅家的两间小屋，传达了两位副主席的批示和耀邦的嘱咐。王先梅和她的子女们都激动得流着泪，一再

表示感谢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从政治上解放了他们。当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王先梅说：对王其梅的结论应该重新做。至于我自己，组织上已经10年没让我工作了，我要求尽快恢复工作。另外，按党的政策，应该给孩子们出路，够参军条件的，就该让他们去。

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回到了轻工部，担任外事处长，仍做外事工作；大儿子参军去了海政文工团；学医的二儿子去了北京市政府附近的椿树医院；小女儿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同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题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评论员文章。

这篇评论员文章说：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地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并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个人的信件纷纷到来。熟知"六十一人案"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同志家属和子女的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又说了那样的一大段话，说明康生等蓄意制造的"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昭雪已指日可待。刘少奇冤案的平反也只是迟早的事了。

三、用"两个不管"的矛，去攻"两个凡是"的盾

然而，人们对问题不能想得太天真了。当胡耀邦向主管中

央级重大案件的负责同志提议，把包括"三六"专案在内的这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这些负责同志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他们强调，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胡耀邦说：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转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中央专案组所接受。

按照他们这种说法，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六十一人案"的所谓"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徒"、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这样做，哪里还谈得上为这些同志平反昭雪了。在这种情况下，耀邦断然决定：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胡耀邦很快把中组部干审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一些同志先后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们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然后才向大家下达了“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材料的动员令。

耀邦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毛泽东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就这么办。

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有必要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未几,小平同志又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1978年6月25日,他在其中的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61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邦随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

胡耀邦对参加复查的同志说:一个重大的案子,究竟是何原因搞起来的,必须查清楚。过去在搞“六十一人案”的过程中,中

央专案组当然也作过一些调查，但那是"各取所需"的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如获至宝；他们认为不合"口径"的，就不会写到结论上去。而这些没被写到结论上去的真实情况，从"结论"上是看不出一丝影迹的。所以，我们这"另起炉灶"，就必须下功夫对能够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访一遍，看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才能还历史事实之本来面貌，才能分清哪些是当事人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哪些责任应是组织领导方面承担的。这样，才能真正分清是非，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

说完，耀邦又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减少阻力，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材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谈完话，正好吃午饭。耀邦也拿着自己的碗筷，和大伙边走边聊地向大食堂走去。他说：如果不把"两落实"(指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得紧紧的、搞得美美的，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会扬眉吐气。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突破口，就是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这些同志的特大错案的平反昭雪……

买完饭，耀邦像往常一样，与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耀邦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这儿又是"党员之家"了。既然是"党员之家"，我们就要形成这么一股风气：多跑门可罗雀的寒门，少走车水马龙的大户。一句话：多走冷门，少走热门。

"老贾，"他向侧面对坐在旁边的贾素萍说："你能不能抽空去看看薄老薄一波？"

贾素萍，一位忠诚干练的老同志。革命战争年代，她就担任过太行兵工厂的党委书记。她连忙答应："这就去。"当天下午，

贾素萍等四人就去探望无家可住、临时栖居于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薄一波。其时，这位须眉皆白，被“造反派”打伤了一段脊椎骨而直不起腰的老者，听说是胡耀邦派人来探望他，十分激动。

贾素萍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兴奋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我们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贾素萍等四人请到房间，一口气谈了七个多小时。

此后，贾素萍等四人又找到与“六十一人案”有关的周仲英、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孔祥祯等多人，逐一交谈。接着又连续奔波数月，访问了被下放到安庆的刘澜涛、淮南的安子文，以及山东、天津、吉林、陕西等地所有受迫害仍然健在的同志。

回来后，他们研究了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一摞摞申诉材料；查阅了中组部保存的这些同志档案中的各人有关出狱经过的自叙；调阅了大量敌伪档案；走访了193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党的“七大”期间熟知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中组部干部科长王鹤寿，和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另一副团长王从吾，并请他们都写了书面证明材料。

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也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初期曾给他一个电话，让他这样回答“揪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赵林（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张闻天同志的老伴刘英也写了一份材料。她在材料中认真回忆当年张闻天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是如何与毛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批准了刘少奇的那个建议，并给刘少奇回电的。

中组部同志的调查研究紧凑而大有成效，写证明材料的同

志也争分夺秒。1978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于光远汗流浃背地跑到当时仍为“摘帽右派”的曾彦修住处,急急如令地说:“快快快,关于‘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耀邦要我们赶快写出证明材料。就是1948年春节,刘格平请吃饭之后,康生对我们谈的那段话。”

曾彦修一听,连忙摊开纸,挥汗疾书。写完,两人签了名,于光远拿了就走,连夜送到耀邦家。耀邦不但及时阅读这类送到家的材料,而且贾素萍等人每次调查访问回来,他都立即听取汇报,认真阅读他们所写的每份调查材料。他先后在这些材料上写道:“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

随后,耀邦就与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了给中央的复查报告。

四、中组部的调查报告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

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

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的实践表明，历史的真实不容歪曲！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

（戴　煌）

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人,或是读过记述这段历史文章的人,恐怕无人不知闻名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个当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又被作为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的葛佩琦,到底是什么人?如此"铁案"又是怎样铸成和怎样翻过来的呢?

原本一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读过村塾,后靠半工半读在北京崇实中学毕业,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华北危亡、祖国危亡的1935年,爆发了震撼全国、永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葛佩琦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并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会委员,与朱穆之(当时叫朱仲龙)、韩天石等分别担任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12月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被国民党军警包围。葛佩琦率领北大西斋同学向门外冲击,与身后举大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被关押在市警察局的葛佩琦与各校被捕同学一起,坚强不屈,高唱救亡歌曲以表心迹。

数日后,被捕学生保释出狱。

1936年1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

作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立后,葛佩琦立即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作为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参与了营救被捕同学、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支援绥远抗战等一系列活动。

他终于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葛佩琦被推选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与南下同学一起到了南京,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和另两位执委受同学会的委派,举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先后访问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同时他们还访问了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名流,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在平津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区地下区委书记李华与蒋南翔,会见了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先期到达南京的博古。博古指派李华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担任书记。平津同学遂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战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战地救护队去正在激战的上海昆山一线,抢救伤兵;又组织宣传团,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敌热情;同时成立了迎送流亡学生小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或大后方的,就达万人以上。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100多名男同学在战地服务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往武汉。他们立即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秘密取得联系，向已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博古汇报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要分配他们去河南第一战区工作的时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达武汉的蒋南翔，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蒋南翔说：你先随着大队去河南，到时候会有人找你。

果然，在葛佩琦离开郑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找葛佩琦谈了话，要葛有事直接找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任务是抓武装。

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徐州大会战。5月24日，国民党部队自徐州败退，苏北、豫东的主要城镇也随之陷入敌手。程潜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从郑州撤至洛阳。经他派在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中的39人，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区。葛佩琦主动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训处长。短短一个多月，就发展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成为当时黄泛区以东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拔除了日寇在陇海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收复过两座县城。

6月下旬，这支游击队派秘书李洪（中共地下党员）去洛阳向长官部汇报豫东战况。葛佩琦适时请李洪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传达他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葛佩琦应程潜电召赴洛阳。

一天晚上，李洪陪同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的刘子久，来到葛佩琦独自住宿的房间，向葛佩琦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

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葛佩琦顿感周身热血沸腾,为"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最崇高的愿望终得实现而感到无尚荣幸。他决心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身在"曹营"心在"汉"屡建奇功

离开洛阳前,刘子久交给葛佩琦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官兵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他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葛佩琦面交彭雪枫。

1938年冬,彭雪枫率部到达豫东。宋克宾等人不但表示欢迎,还送了几百套棉军衣,给彭支队战士御寒。葛佩琦单独与彭雪枫见面时,转交了刘子久的信,汇报了豫东的抗战活动和敌我情报。彭雪枫对葛佩琦的工作大加赞赏,要葛佩琦有事直接与他联系。

1939年。彭雪枫支队在永城县境与日寇作战,葛佩琦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慰问并参加了为牺牲战士举行的追悼会。会后,彭雪枫约葛佩琦单独谈了话。这时,宋克宾的部队已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葛佩琦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老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觉得很不舒服,要求到自己党的部队中去工作。彭雪枫大笑,他劝慰葛佩琦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你继续留在宋克宾这里为党工作,比调去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这才下了决心在国民党部队继续干下去,除非党组织有了新的派遣。

这时,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由洛阳到了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由卫立煌接

任。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之职，但宋克宾没有交出原来由葛佩琦帮助扩建的豫东抗日游击队。后来在程潜的支持下，这支部队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葛佩琦为政治部主任，调河北省抗日。

在河北大名、南宫之间，这支部队与扫荡的日寇频频发生战斗。由于人生地不熟，武器装备又差，部队损失惨重，军心颇为动荡。绝大部分官兵都主张返回豫东老家，葛佩琦竭力反对。因为原来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豫东陇海沿线又被汉奸张岚峰部队所控制，一时难有立足之地。可是宋克宾却说，张岚峰也是豫东同乡，又在西北军中共过事，不至于不给碗饭吃。

葛佩琦预感宋克宾等人有率部当汉奸的危险，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投敌；遂连夜只身潜出围寨，历数昼夜，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奔向彭雪枫部队原驻地永城县书案店。到了书案店，才知彭雪枫已率部东进，吴芝圃副司令还在附近一个村庄，当晚也将出发，葛佩琦立即向吴芝圃汇报了宋克宾部队的险象，并问是否可以再由他自己去把宋部的部分部队拉到永城，与新四军合作抗战。吴芝圃说，这不符抗日统战政策，要葛佩琦尽快去西安向程潜报告，力挽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的投靠了敌人，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长期埋伏，等待党的新指示。

葛佩琦与吴芝圃分了手，经多日迂回跋涉到了洛阳。他想向刘子久汇报党的工作，没有找到刘子久。他好不容易到了西安，程潜已获悉宋克宾率部叛国投敌，立即召见葛佩琦，问他能否把他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这支部队再拉回来？葛佩琦说：能！程潜让他去参谋处看看有关策反的文件，听候命令。

1939年8月中旬，程潜任命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策反汉奸部队反正，并给他派了三名联络参

谋和一个通信班及电台。

9月初，他们到达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葛佩琦分别派遣三名参谋潜入敌占区开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装潜入商丘，侦察到宋克宾部队已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二师”，宋为师长，驻商丘以东30华里的马牧集。他同时还侦察到，他当年扩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也已投敌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商丘以南的马头集。经数月周密策划，袁天柱部于1940年2月率先反正。

接着，葛佩琦又与宋克宾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答应反正。他立即报告了天水行营，程潜复电说：及早发动，有功者奖。不久，程潜又来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另给何军长去电知照。

何柱国是豫东前线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动“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另两个师的反正。葛佩琦仍一心想把宋克宾部队拉到彭雪枫那边去，以壮大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他专程赶赴洛阳，找到了刘子久，汇报了这一新的重要军情。刘子久说：你若把宋克宾部队拉到新四军，目前困难较多，难以成功；你与何柱国合作，是符合抗日统战政策，有利于抗战的。

这样，葛佩琦才与何柱国紧密协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国的骑兵接应，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削弱了日伪在豫东的力量。

1942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又遵从党的指示，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

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乃至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苦于“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直接同他联系的刘子久匆促离去，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秘密组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不知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可巧在西安见到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又得以与1936年冬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的陈忠经(中共党员)相会。陈、李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同党中央情报部门在西安的负责人赵耀斌接上组织关系，并直接为其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豫东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时，日本宪兵队紧急全城大搜捕。葛佩琦在地下同志的帮助下，机警地脱下伪军军服，用一根绳子吊下城墙，才得以脱险。

葛佩琦所领导的情报站每逢获得重要情报，均通过电报或密函，分别发给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的伪军师以上将领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文件，同年夏上海伪币狂贬、物价飞涨、日寇“以战养战”等敌囊之密，陇海线商丘站日寇军车运载部队和军用物资情况的分析报告等，都是经葛佩琦之手搞出来的。

1945年日寇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他的王牌军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并由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共中央作出进军东北、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在东北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与葛佩琦商谈后，同意葛佩琦搭乘美国空军飞机去徐州，再转赴北平设立地下联络站，以便向东北转移地下工作人员。

葛佩琦虽然身着国民党少将戎装，但没有“接收大员”头衔，

没法遵照赵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关开办报社或书店建立地下联络站。他通过私人关系，在北平西单以南一百多米的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个大四合院，以住家作掩护，接待经北平去东北的地下党同志。

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鼐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命令。

葛佩琦去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葛佩琦凭借这"政治工作"的掩护，不断地为自己的党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把书面报送长官司令部政治部的部队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官姓名等等，编成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送给党的地下情报组织；

——把跟随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出席两周一次的国民党驻沈阳重要头目联席会议，作为获得机密情报的重要来源；

——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安东(现名丹东)一带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及新修防御工事等情况，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长官郑洞国率领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离开沈阳驰援四平等敌情，密报给地下组织……

总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尽管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仍恪守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静似处女，动赛脱兔，机智果敢、沉着镇独地获取了大量情报，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

利，发挥了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组织遭破坏他成了“断线风筝”

既然置身“虎穴”，就难免虎狼伤害。1947年10月10日参加了“国庆纪念会”的当晚，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同志、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同志、住在王书鼐隔壁的“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同志，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李年爱人——地下电台译电员何英芬的告急电话后，立即作出如下判断：如果黑名单上也有自己的名字，早已被暗中控制，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为朋友说了几句好话”而被捕。

第二天，他就打听出了事变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来人办的，行辕二处只是奉命协助；“案由”是共党嫌疑，被捕人员下落尚不可公开。同时他还得知：从西安来到“东北通讯社”电台的申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他估计，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台长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帮忙，他与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会了东北行辕的崔处长。这位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行。好在他们又从军统特务沈阳市督察处处长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北平来办“案子”的人已经回去，看来不至于再扩大。这位督察处长知道葛佩琦是程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与李年有过来往就怀疑他。葛佩琦这才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决心留下继续为党工作。

但是，地下组织和电台都被破坏了，所获新的情报统统发不出去。更令葛佩琦伤心的是西安方面传来消息，与他保持联系

的赵耀斌也被逮捕。

此时，我们党在东北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而葛佩琦在这大好形势下，却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与党失掉了一切联系。

11月2日，沈阳解放。葛佩琦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去寻找党的领导机关。但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他去沈阳市政府询问，在拿不出任何有力凭证的情况下，自然没有结果。

他赶回和平解放后的北平，且在1949年3月找到了因"证据不足"，从南京监狱放回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甪、邢国彦等三人。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葛佩琦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十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也很高兴，按照接组织关系需要经党的组织部门的规定，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时，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他，根据现有调查材料，证明他确实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不过可以接受他先安置工作的要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毛泽东首登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北联大改称中国人民大学。

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当年抱着"科学救国"愿望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葛佩琦,自愿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担任了理化教研室物理组小组长。

由"党外人士"变成"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才断了组织关系的。党籍迟迟不得恢复,反让他以"党外人士"身分参加活动,心里十分不快。

第三次送来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当面动员,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到了会场,主持人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隔一天,《北京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的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

文中共有5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8位教授、讲师的发言。最后一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文中说: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

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他认为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却使他"炸了头"。他认为编者断章取义把他的话改成了"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葛佩琦当天下午面见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事实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其中有一个小插题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文中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以后的6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接连刊出“读者来信”，对葛佩琦进行批判。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了——就在这天报纸的第七版上，又刊登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在《葛佩琦连续发表反共言论》这一小插题下：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

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看到这段报道很生气，认为已经远离了他的原话。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中说：

“6月8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并说：“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话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葛佩琦这一更正信换来的是各界人士的连篇累牍的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葛佩琦这一“人人得而诛之”的“特大号”反共人物，“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极右分子”。

雪上加霜他被抓进了监狱

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于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自然会怀疑到他的历史背景。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被逮捕，并在他家搜出了他当年身穿国民党军装、骑在日本战马上的照片。着警服的人说：“这不是你反革命的证据吗?”葛佩琦则申辩说，那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照片。

葛佩琦被送到北京城东北角草岚子胡同，那个原是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地方。

负责他这个案子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不知这位年轻人是出于对祖国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的无知，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每次对葛佩琦“历史经历”的询问，都是南辕北辙，无“果”而终。比如：问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的问题，年轻人问：“你组织游击队干嘛？”葛佩琦回答：“抗日。”年轻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再如，问到解放战争中的情况，年轻人问：“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都干了些什么？”葛佩琦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年轻人打断他的话：“你是‘国民党少将’，谁承认你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进行了36次之后，1958年秋天，对葛佩琦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共达30次的系统审讯。重点是追问葛佩琦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葛佩琦出庭受审。门楣上边写着“法庭”二字，审判席上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直立着法警。这一切揭示他：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到了。

在检察员宣读完《起诉书》，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时，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开始为自己作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

《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分，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

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了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的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作辩护的3个月又25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作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全文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8个、帽徽1个、证章3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八个字上，对照自己走过的48年人生历程，他内心发出无声的呐喊：究竟谁“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苍天可鉴！

葛佩琦当然不服。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许多次，都被一一驳回。

直到1975年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葛佩琦才以“国民党少将”的身分被释放，从而结束了那榛莽漫漫的囚徒生活。

一位不断为他带来喜讯的老者

1978年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葛佩琦迁京后居住的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杂院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这位1926年曾奉党派遣从事“军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30年在洪湖苏区带兵的老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反右”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理解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时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葛佩琦搬进

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那时他就风尘仆仆地来过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极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他觉得，问题的起缘在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访，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访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全部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他去拜访成仿吾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20年的情况后，表示将他的申请改正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在学校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葛佩琦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以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的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镜胡同。在胡同中间

开的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了。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啥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的人围拢了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拿着领到的上访登记表和一位好心人让给他的当日接待谈话的号码，一并交给接待人员。

不一会，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约摸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后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请你后天上午再来。

12 月 27 日上午 8 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在办公楼会客室接待了他。郝一民一句问候："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葛佩琦向郝一民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 1957 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胡耀邦、陈野苹直接过问这一案件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了去,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要求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还远远没有影响到所有的单位。这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作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也与他的原发言不相符,他在第二天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对当年中央定的这个案子,没有人敢于平反。

葛佩琦又眼巴巴地等七个月——即等到当年11月12日,才等来了人民大学党委《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

是一个"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的结论，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

恰巧，这时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上访胡耀邦！"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耀邦家的大门口。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葛佩琦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那位同志说："耀邦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下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

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葛佩琦感激不已。一回到家就拿出放大镜，仔细看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点大红点，葛佩琦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

过了两天，任小彬电话告诉葛佩琦：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副局长处理你的申诉。

葛佩琦见到了这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在了解到人民大学"不予改正"的依据，仍然是1957年报纸的不实之词，且葛佩琦可以提出没有说过那些话的人证与书证后，对葛佩琦说："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回到他那自称"96陋室"的八平方米的小屋，首先想到的是"反右"时任人民大学组织部长、过后又一直惦念他的"知心老头"李逸三。1980年11月17日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陈述了他向人民大学申诉、向中组部上诉的全部经过，并寄去了有关证明材料，希望李逸三能助他一臂之力。

11月20日，仗义执言的李逸三立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 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19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

据我所知，葛是 1938 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战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 年解放至 57 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有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帐老帐一起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作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耀邦同志是否见到这封信，或对此信是否又作过批示，不得而知；但此信发出后的许多迹象是令人振奋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作出了"再审判决"。

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刘罗彬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再审判书中说：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原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给人民币叁千陆

百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1957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和(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在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1978年10月起恢复原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作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这样，终于恢复了他的“三八式”老党员的本来面目。

他以革命者的本来面目度过了最后岁月

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迅速广传于海内外。

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情祝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深重灾难中得到解放，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劳动人事部顾问的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
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
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春节的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53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博、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今，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于1993年1月13日上午11时55分，因心脏病抢救

无效辞世。新华社电讯中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分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戴　煌）

冤惊海内，水落石出

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十年，伴随着党的领导的“左”的错误，无数人的命运像难以抵御风浪的小舟，时沉时浮，甚至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也在劫难逃。冤案迭起，冤惊海内……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江青与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4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是非非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陶行知是《武训传》这部电影最直接有力的催生者。早在20年代，他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自励励人，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其中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四海惊悼，成为国人共仰

的民主先驱。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的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据此,陶行知实为《武训传》问世的原动力。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初映即赢得了一片赞扬之声。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映完后,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1951年春节后在各大城市公开放映,京、津、沪等地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几乎作了一致肯定的评价。《大众电影》杂志特为组织专辑,并把它列为观众喜爱的十大影片之一。

但很快从最高层中传出了不同意见,顿使情况骤变。5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径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严肃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40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颂扬武训的新书。这一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胡乔木1985年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这场被“过分夸大”至于“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程度”的运动，不但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和“非常粗暴”的，而且批判方法“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

为这一批判运动推波助澜的江青，这时在文化部文艺处挂名任职。批判运动开始后，她终于走到前台，投入讨伐。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作为结果，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文章之长，连载

之久，在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都是罕见的。由此，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30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主演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在教育界，运动的声势更是凌厉异常。文件三令五申，号召斗争，肃清流毒。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教师暑期集中学习，开展人人过关的面上运动。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带头引路，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这样，在建国不久的政治舞台上峥嵘初露小试锋芒的江青，便一石二鸟，分别在文艺界和教育界击中目标，踩着已经死去的武训和陶行知，踩着在世的陶行知弟子及其"武训精神"的信从者，悄悄地以文化教育为阶梯，向权力中心爬去。

对于陶行知来说，批判《武训传》和武训精神使他的形象受到严重损伤。他的身后荣名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被推落到少人问津的晦暗幽谷。从此，陶行知成为一名"可议人物"，其人其事连同其教育思想，被一并划入禁区。虽有少数几位风骨铮铮的朋友冲破禁戒线，喊出了诸如"陶行知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陈友松)和"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论"(邓初民)的呼声，但1957年"反右"之风一刮，又把陶行知卷到乌有子虚之乡。此后，除别人笔下偶一涉及，在大多数中国人记忆中，大教育家陶行知这个曾经大红大紫的名字被逐渐淡忘了。直到1981年，以纪念陶行知诞生90周年为契机，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并重行审察当年批判《武训传》一事。这样，人们在欣喜地拂去当年泼在陶行知身上的污

垢，重新摩挲这颗尘封一世(30年)依然光彩照人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明珠时，理当对那场使陶行知及其学生含垢蒙辱的文化罪案加以冷静的反省。于是，我们发现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30年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三十年代援助江青之恩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

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风动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不满南京政府所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思想更趋进步。1932年秋，他为了探索中国教育革命的新路，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再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在"文总"领导下的"教联"、"左联"、"剧联"和"社联"等组织均积极在此开展活动。正是在上述特定背景下，江青因"剧联"的关系被介绍到晨更，受到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在晨更，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

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日常生活安排也很有规律。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自置的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1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工作情绪十分高昂。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对外，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对内，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据当事人回忆，她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初到上海尚无很多社会联系的江青，必然会与陶行知及其学生建立颇为密切的关系。据知情者回忆，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特别要指出的是，江青同徐明清和王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也是江青在此最重要的同性伙伴。她是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辗转来沪，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同时，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江青到晨更后，他们同教小学，接触较多。王洞若的才华无疑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交情。他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

的异性伙伴。在陶门弟子中，有关此时的王洞若是江青的追求者一事并非秘密。

平实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住居。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引起当局严重注意。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当时在“教联”沪西区委中，党团负责人为孙达生，徐负责组织，王负责宣传。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负责工作。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 年 10 江青突然被捕，身陷囹圄。有关此事起因，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江青被捕后，孙达生等曾通过关系到狱中查找。个把月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可惜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探监和保释过程中，陶行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江青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三十年代开罪江青之怨

江青第 3 次来到上海已是 1935 年春天。

这一回来沪后，江青主要同"剧联"打交道，据江青后来得志时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来沪，点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深入角色，终于一举成名。这位飘飘然然的"红都女皇"在自夸自赞之时，有意略去了许多基本事实。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实在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帮助。她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柯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的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唐纳是一位与"剧联"关系甚密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过去，他在一些文章中被描绘成纨绔公子，恐怕主要是受累于和江青的那一段罗曼史。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在银幕上，他以英俊潇洒的小生现身，拿起笔头又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

的作用。同这样一位"影报双栖"的明星人物发展关系，对江青来说，其价值不言而喻。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她的颇有人在，她却唯独留意于唐纳。唐纳一铸丘必特挽弓，立中芳心，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推助之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及大大小小的捧场文章频频出现报端刊尾，上海影剧界新添了一名二流明星。

灯火辉煌欢腾活泼的影剧生活，显然有别于昔日默默无闻清苦冷寂的教育事业。风度翩翩气概不凡的艺术家，更不同于手执教鞭粉灰沾身的教书匠。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变化，使江青与"教联"的联系渐少，也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来往渐疏。

1936 年春夏之际，江青和唐纳戏剧性的婚变事件一度成为上海滩上的热门话题，由此引发陶行知的感慨劝导，从而开罪江青，成为一个不可解开的冤结。

1936 年 4 月 26 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论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而据江青自述当初与唐纳虽行婚礼而未立婚书的"理由"，也似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在 1937 年 5 月 31 日出版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江青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这一"留有余地"的做法："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

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苹”的哀艳凄绝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脍炙人口。作为变情者一方的熟人和殉情者一方的朋友，陶行知自不能不对此表示关注。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出于对年青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的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拚命。
若是为意气拚命，
为名利拚命，
为恋爱拚命，
问我们究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绝对是冒犯蓝苹之词。

于是，这首小诗便成为睚眦必报的江青必欲报复消恨的事由。

江青得知怨端前后

然而，这首发表在邹韬奋刚刚创办（1936 年 6 月 7 日）于香港《生活日报》上的小诗，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也不曾为江青所寓目。虽然在 7 月 10 日陶行知离港前夕，《送给唐纳先生》——

诗连同另外20余首同期所作诗，已汇编成《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当年11月出版。但是，剧烈动荡的时局几乎把人们的呼吸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业上去了，这一小小的诗集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

因此，在江青不知陶行知“诋毁”自身的情况下，她与陶行知及其学生继续保持比较良好的关系。

1936年11月下旬发生的“七君子事件”，把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一起推到了抗议当局消极抗日的政治斗争前列。陶行知因为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担任救国会领袖，与沈等7人作“同案犯”被当局通缉，并同被起诉。在持续半年有余的全国抗议浪潮中，终以当局公诉书的提出而达到高潮。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具状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时收审。爱国无罪则与沈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等同受处罚。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纷纷响应，顿时汇成一个爱国入狱运动。这种义无反顾、视狱如归的精神，确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风格。在此过程中，上海影剧界中的许多著名导演和演员，如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金山、王莹等均在具状要求入狱者之列，唐纳和江青也在报端公开亮出同一立场，尽管他们此时已经分离，但无论就国家民族的公谊，还是与沈、陶等的私情，他们的声援都不失为一种见义勇为的豪举。这一行动，与陶门弟子在教育界的声援抗议活动，与陶行知在美国组织推动爱国华侨和美国上层知识界如杜威等的救援活动，完全桴鼓相应，一致敌忾。

“七七事变”之后，在王洞若的帮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经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开始其生活中全新的一页，成为另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的表演者。待到陶行知再度与她相见，已是1946年春。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已非当

年沪上"阿苹"。她趁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前去医治龋齿病。到重庆后，她曾相约唐纳见面，但唐纳出于种种考虑有意回避了。陶行知则与她一度聚首在山城。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创办不久的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两路远方来客。一为刚从狱中释放的叶挺和廖承志，一为刚从延安来渝的邓颖超、滕代远和江青等。据当事人忆称，江青是日因到医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来专程到重庆管家巷28号陶行知住处相访，并邀请陶行知和王洞若随机同往延安。据此看来，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对他尚无恶感。笔者推测，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猝然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为了纪念他，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颇具规模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由大学出版公司印行问世，因陶氏新丧国人痛惜之故，诗集流传颇广，举凡与陶氏有交谊者莫不争相致之。江青极有可能是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由此怒不可遏。

同时，另一条消息也可能引起江青的极度不快。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追悼会曾引起海内外的注意，追悼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其人，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一时曾成为上海影剧圈中一桩很有影响

的事件。这一争角之败，曾被江青引为终生大辱之一，王莹也从此成为她切齿难忘的仇人。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难以逆料。

人世间恩怨相报和爱恨相替，始终是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恩其所恩，怨其所怨，也始终是除超凡人圣者外的肉身凡胎无从超越的一方欲界。为了鉴衡有关恩怨所施是否得宜，人们又铸造了公德和私德这两重社会道德尺度。持此度量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之间的恩怨公案，人们不难判断其德与不德。

（作者附记：陶夫人吴树琴先生和陶门弟子徐明清、方明、吴蕾生诸先生曾为本文提供情况，原陶行知研究会刘季平会长的夫人吴瀚先生热情鼓励，尤所感谢。）

（唐文权）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地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六十年代初，建树多、政绩卓著的曾希圣，却被撤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而长时期赋闲在家里。使我颓丧的是，正是由于他的创造性工作，使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对于一个极富事业心的人来说，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组成他的生命的时间；社会也因而慨叹，因为它少了一股强劲的推力。

我一向尊重曾希圣同志，和他的夫人余叔更是莫逆之交。但我之所以对他的遭遇感到惋惜，不仅是因为私交好，而且我还是他的老部属。

1944年，我参军到新四军七师时，他是七师的政委。是他使原来仅有三千人的部队，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这是皖江地区军民皆知的，所以他威望很高。但他的性格刚烈，爱发脾气；加之不修边幅，满脸的络腮胡子，更觉得威严可畏。我那时才十六七岁，一听说“曾胡子来了”，马上就躲藏起来，怕与他碰面。不

过，我很少看到他吹胡子瞪眼睛。听同志们传说，他对女同志从不发火；女同志有什么要求，只要抹几滴眼泪，他就会批准的。我当时还是个黄毛丫头，除了工作，无事可求，所以也不曾验证。他的夫人余叔原是上海的学生并做党的地下工作，因为暴露了，党才把她送到七师来。曾希圣一眼就把她看中了，又是书信，又是情诗，又是谈话，向她坦露一片爱心，总之不停顿地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相结合，他们终于结婚了。我到七师时，就听说不少他们恋爱的轶闻趣事。但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接触过，他们自然不会认识我。接着日寇投降，七师奉命调山东集中，我们徒步走了三个多月，经过皖、浙、苏、鲁四个省的艰苦行军，才到达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不久，为了开辟东北根据地，我又被调往辽东地区工作。

真正认识曾希圣夫妇是在15年后的1959年春。当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曾希圣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尚奎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又属同一个大区，所以都住在锦江饭店十八楼，而且是隔壁邻居。曾希圣比尚奎年长一岁，两人私交很好，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都是50岁的人，还“小曾、小杨”地开玩笑。当我知道他们夫妇都近在咫尺时，高兴极了。我先去“侦察”了一下，看看这位老首长现在什么样子。我故意经过他们房间，在门口细打量了一下，他不再是那个全副戎装、令人生畏的“曾胡子”了，但面目依旧，只是头上有了白发，额上多了皱纹，一身深咖啡色中山服，使他显得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

不一会儿，余叔回来了，尚奎带我到他们的房间里。谈起来，我曾同他们在一个部队，共同语言很多，一会儿我们就成了老朋友了。

“水静，你是七师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曾希圣说，“要是

当时认识了，我会对你很好的。”

“你是大首长，我是小兵，几万人，怎么能都认识呢？”我说，“我可早就认识胡子政委了。你跟余叔的风流艳史，我还捡了一箩筐呢。”

他嘿嘿一笑说：“是吗？你倒是说说看。”

“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扯那些事干什么？”余叔打断他的话，然后对我说：“说真的，水静，要是那时候我们认识了，那该多好！”

我开玩笑说：“他那么凶，我哪敢挨边呀！”

余叔解释说：“其实老曾对人心肠挺软的，特别怕女同志哭鼻子。”“我也听说胡子政委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我笑道，“不过，我那时还不了解，要不然也在他面前哭它一鼻子，说不定会哭出个一官半职来的。”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曾希圣笑着对尚奎说：“你这个水静呀，真够厉害的。”

我跟余叔更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她比我大两岁，当时是安徽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曾希圣的秘书。她出生在上海，自幼失去父母，寄人篱下，由于这种生活的锤炼，使她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倔犟的性格和富于正义感。我们的性格、兴趣、爱好都极相似。我们不顾非议喜欢穿着人时的西装、旗袍、连衣裙。喜欢“海派”打扮，等等。每次中央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只要碰到一起，业余时间就形影不离了。

和曾希圣接触多了，就觉得他的脾气暴躁的一面被夸大了。有时候，他还是很有耐性的。记得有年冬天，中央在上海开完会后，决定让各省负责同志到广州过春节，于是我们两家都把孩子带去了。过完春节，便安排我们到海南岛参观，而且是我们两家合乘一架飞机。我的女儿听说要飞过大海，便对我说：“妈妈，我

不去了，掉下来会淹死的。"任我们怎么解释，她就是不去。这样，我和尚奎就决定不带孩子们去。可是到了动身的那天早上，大家正准备上车去机场，我的小儿子新力却一声不吭地坐到司机座位旁边，要去海南岛。先是我劝他留下来和妹妹在一起，阿姨叔叔会带他们到公园里去玩的。接着尚奎又去说服他，还讲了很多道理，他就是不下车。父子俩谁也不让步，僵持了40多分钟。飞机快要起飞了，以脾气急躁闻名的曾希圣，却一点也不着急。他笑嘻嘻地等着，看着严肃得使人发笑的俩父子，还不时走过来开尚奎的玩笑："看这位大书记呀，连这么个小不点儿的儿子都说服不了。"

我和余叔都笑了。我说："我这个小家伙呀，像他父亲一样，不慌不忙，很有主见。这两天他从来没提要去海南岛，可是他心里想好了，到时候就非去不可。你看吧，最后他还是个胜利者。"余叔笑道："有种像种嘛！"

后来连我也不耐烦了，曾希圣还在那里嘿嘿地笑着。直到机场打电话来催促，尚奎才不得不同意小儿子去海南。

在飞机上，我悄悄对余叔说："老曾今天真不错，等了那么久也没有发火。"余叔说："他很多时候都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火爆火燎。要不然，谁受得了呀？"

话说回来，即使曾希圣有个坏脾气，也不妨碍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贞。

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曾希圣是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仍不少。有一次我和尚奎在他们住处聊天，尚奎提到中央苏区的一些事，不知怎么触发了曾希圣对他哥哥的怀念。他告诉我们，他的哥哥叫曾中生，比他大4岁。1925年，中生考进黄埔军校，结识了周恩来同志，不久党派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便到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很

受周总理的器重。1930年冬，他又受中央的派遣，主持鄂豫皖特委和军委的工作，使红军和苏区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张国焘到达鄂豫皖后，推行王明路线，疯狂排挤和打击原来的领导，撤销了曾中生的党内领导职务，调任红九军政委。曾中生和徐向前等同志在一起，不顾个人安危，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而遭到长期关押，1935年终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当中央命令张国焘保证曾中生同志安全的电报到达四方面军时，他已罹难半年多了……

曾希圣谈起来仍然很不好受，说明兄弟间的感情很深。他还说："周总理对中生的死非常惋惜，直到现在，还常提起中生的往事……"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尚奎说："我常听人家讲，周总理特别喜欢曾希圣，原来是首先喜欢他哥哥的缘故。"

"不，这不是主要原因。"尚奎摇摇头说，"曾希圣之所以为总理所看重，是因为他有突出的聪明才智、战功政绩。据我所知，他在中央苏区跟总理在中央军委工作时，他的一项特殊功绩就是参与创建了中央军委二局，并且担任了第一任局长。在1932年以前，红军和敌人作战，没有专门的军事情报机关。二局成立之后，在曾希圣的组织、领导下，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供了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红军之所以能在反围剿战争中以弱胜强，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来又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摆脱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跳出重围，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除了得到人民支持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之外，二局提供及时而准确的军事情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功劳是不小呀！"我说，"是呀，所以毛主席把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比做红军夜行军的灯笼，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是很高的

评论。""周总理则称赞曾希圣是我军军事情报工作创业人,他曾与朱总司令一起,给曾希圣颁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了,但又有点嗔怪地说,"可是他从来没提起这些事,余叔也没有跟我说过呀。"

"我知道这些,也不是他说的,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告诉我的。"尚奎说:"他立下的功绩知道的人不多。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七师的兵,对曾希圣如何开辟皖江根据地,如何创建第七师,如何以大量的财政、物资支援兄弟部队,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也知之甚少。他还当过二野的副参谋长哩。"接着尚奎又谈到曾希圣治理安徽这个饱受旱、涝灾害的农业省取得的政绩,比如曾希圣提出的具体治淮方针受到毛主席赞扬,取得良好的效果呀,又在两年间从上海迁进了一百多个工厂企业,为安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呀……

我算彻底明白了,像曾希圣这样一个屡建奇功且又不居功自傲的骁将,那个统帅不爱呢?!同时我也知道了尚奎对他如此尊重,如此契合的原因。

打这以后,我对曾希圣又多了一层尊敬。

庐山会议的后阶段,我和余叔依旧常在一起,但和曾希圣会面的机会却不多了。这并非他出了什么麻烦,而是会议本身开得紧张了起来。这时候,他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因为安徽在执行中是比较坚决的,一时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后果。我曾向他反映过我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他听不进去。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当时流行一种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凡属缺点错误,大多笼统地归于"个别问题","一个指头"的问题,即使问题已大大超过一个指头的范围。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现象,是无需多作解释的。

1960年春，山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大跃进”的问题暴露得够充分了，也引起了中央相应的重视。华东局在济南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解决山东的问题；中央派了谭震林前来参加。尚奎是华东局的书记之一，当然是要与会，所以我也跟他到了济南。会议开了几天之后，便派曾希圣随谭震林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余叔知道我还是刚解放时到过北京，便邀我同去看看首都新貌。

1949年的秋天，我随部队驻防丰台，北京和平解放之后，我们去参观了几天。那时城里乱糟糟的，地摊随意乱摆；房屋陈旧，道路肮脏，行人寥寥，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故宫也没有修整，斑斑驳驳，零乱不堪。总之，给人以破破烂烂的感觉。而11年后的北京已是焕然一新了。天安门雄伟庄严，长安街宽阔整洁，建国后的十大建筑巍然耸立，使这个古老的都城变得精神抖擞、光彩夺目。这使我对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满怀敬爱和信心，觉得在我们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许，这和曾希圣的情绪对我感染有很大的关系。从他自然流露出来的充满自信的微笑来看，他们的汇报显然很顺利。

三天之后，我随曾希圣夫妇回到济南，华东局的会议在继续进行。会议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免掉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由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原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现在又兼领山东，一身兼任这么多要职，在地方高级干部中是少有的，特别是同时担任两个省的第一把手的实职，更属罕见。这一方面说明他精明强干，能力超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党中央对他的充分信赖。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不但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呀！”的确，这是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他立即由合肥迁居济南，狠抓了山东的问题，使工作迅速走

上了正轨。直到新任书记到来,他才重返安徽。

这时,安徽的问题也显露出来了。其实,岂止安徽,我们整个国家由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在神州大地蔓延,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最严重的时期。安徽粮食短缺,人口大量外流,农村饥荒,饿死人已不是个别现象。后来在广州会议上他和尚奎作了一次恳切的长谈,他说当他了解到农村实际情况以后,他感到失职、内疚、痛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等等是那么严重,更没有想到它们使农村生产力遭到那么广泛的破坏。他在有关会议上主动作了深刻检查,对自己高高在上,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后亲自组织干部研究合作化的历史,解剖解放后的农村,一定要找到一条摆脱当前困境、连接今后坦途的出路。

他本来就是一个实干家,经验丰富、才智出众、善于思考,为探索一个问题答案,他可以坐在办公桌前半天甚至整天的纹丝不动。他是一把未老的宝刀,稍一擦拭,便寒光闪闪、锋芒显露。他从社会主义工业的按件计酬责任制,联想到为什么不可以搞社会主义农业的定产承包责任田呢?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形成了以户计工、多产多得、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等一整套设想,并提交到省委书记办公会上讨论。大家都赞成,但又觉得风险甚大。于是他又亲自带工作组到农村去试点,根据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经验,又亲自起草了一个文件:《定户到田、责任到人问题》,最后据以制定了"包工包产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简称"责任田"。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设想,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他搞试点。他还跟尚奎详细地介绍了"责任田"的一些细节,尚奎很欣赏他的创见;回江西后,又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通知,关于

"责任田"的问题,各省可以搞点试点……尚奎还亲自布置省里和各地区都要搞一个试点,并亲自到星子县搞了一个试点。赞同这种做法的。显然不只是江西一个省。

凡是试验"责任田"的生产队,毫不例外地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安徽在全省普遍实行"责任田"后,被广大群众誉之为"救命田",因为它神奇地迅速地恢复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丰富了市场供应,得到城乡人民一致的拥护。这种"责任田"和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八十年代初期完成的农业承包责任制相似,都是将生产效益和农民利益直接挂钩的办法,是和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在20年前我们就推行曾希圣所创造并为毛主席同意的"责任田",结果会怎样呢?我国的农业将推进20年!

遗憾的是,冷酷无情的历史,从来不给人们一个"如果"。失去的机遇就像飘过的风,是无法找回的。于是我们的农业在那20年里,便在原地徘徊、踏步,裹足不前。

一个生机勃勃、活蹦乱跳的"责任田",一个被证明有广阔的前景的"责任田",很快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尽管邓子恢、李富春和许多老同志、基层干部上书求情、高喊"刀下留人",也无济于事。在1962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视为"单干风"、"翻案风"和"方向路线性错误"而遭到错误的批判与取缔。而且,"责任田"还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两极分化的祸害"。毛主席批评了安徽,批评了支持安徽包产到户经验的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和其它一些部门;并严厉地指名批评曾希圣是"要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为天下中农谋福利"。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被免去,并且牵涉到相当一批干部。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加在谁的头上都不是一件

舒服的事，但他更为受他连累的同志而担心。他多次向中央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来的，也是根据我的意见推行的，一切由我个人负责，与别的同志没有关系。”在那时候，这能起多大作用，很难说。一个领导干部一旦出了“路线”之类的问题，总是要株连一些人的，至于株连面的大小，大致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大小成正比。

余叔很难过，她对我说：“老曾搞责任田，是主席同意了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主席不说话，别人也不说话呢？”我思想上也想不通，总觉得这不公平，一则搞“责任田”并没有错，再则，即使错了，也不能让曾希圣一个当灾。可是不通也得通，谁敢站出来评这个理呀？尚奎是个厚道人，他不好说什么，只是讲要多劝劝曾希圣，宽宽他的心。所以在曾希圣受批判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两家是在一起过的。尽管这也无法驱逐他胸中的压抑，但有朋友在一起，多少可以冲淡一些心头的愁云。

曾希圣突然从“大红人”、“大忙人”的峰巅上摔了下来，成了一个大闲人。他移家上海，因为他还有个“华东局第二书记”的空头衔。过去听人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以为是对旧社会而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同志间的阶级感情高于一切，是不会发生那种现象的，至少也不会在有觉悟的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中发生。可是自从曾希圣的事情发生以后，我的天真、理想主义的彩图，便成了一堆灰烬。他得意时，人们用最美好的词汇来赞扬他，用最佳幅度的笑脸来看望他，门庭若市，似乎多跟他接近一点，身上就会沾一点瑞气。今天他失意了，便门前冷落，车马寥寥，一些人像避瘟神一样地避开他。如果他真的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倒也罢了，可是谁都知道他是做了一件好事，立了一个殊功而“犯错误”的呀！使人不解的是，就连柯庆施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如此，他原来对曾希圣是何等地信任呀，可以

说是言听计从的。现在呢？那态度简直判若两人。把人家往那儿一放，不理不睬，不给工作，不让开会。可是，不管怎么说，老曾的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并没有撤掉呀？

当然，好同志还是很多的，他们在和尚奎的谈话中，经常或明朗或含蓄地为曾希圣抱不平，有的还常去看他。至于尚奎和我，仍和往常一样与老曾过从密切，只要是到上海开会，或者到北京时途经上海，就一定要去看望他，或者接来饭店一聚。有一回尚奎看到曾希圣居闲太久，胸中压抑，便邀请他来南昌散散心。尚奎亲自陪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晚上，我们便和他在一起看看戏或者打打麻将。这回他在江西转了一个多月，跑了吉安、赣州、抚州几个地区，情绪颇好，身体也好多了。有一次我随尚奎去北京开会，特地在上海停留一天，为的是看曾希圣夫妇。我们到他家时，发现屋里有一台插秧机和一台播种机的模型，便问余叔是谁把它搬到这儿来的。

余叔笑道："老曾做的呀！他把家里的瓶瓶罐罐都种上秧苗了。"

"什么？老曾会做插秧机、播种机？"我奇怪地问。

她告诉我，老曾是个闲不住的人，不给他工作，他就自己到郊区去走走。在和农民的交谈中，觉得用人力播种插秧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速度慢，往往误了季节。他对农村本来就很熟悉，只不过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罢了。于是他参考有关的机械原理，自己动手绘制图纸，然后请来木工做成模型，再来试用、修改。"老曾这一段时间可忙了。"她说，"常往乡下跑，和农民商量用机械播种插秧的事，有时饭都顾不上吃。"

"他闲得难受呀！"我说，"让他活动活动也好。"

"就是呀！"余叔说，"我开始也烦，后来一想，这总比成天闷坐着好些。"

我俩相视一笑，我觉得她笑得颇为凄凉，而我的笑意里，想必也有许多苦涩。

两个男人却谈得很高兴。曾希圣颇为自豪地介绍自己的作品，谈机械原理，谈每个零件的作用，显得兴致勃勃。尚奎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个问题，或者提条修改意见。这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呀，简直成了两位工人老师傅了。我为他们间的真正友谊而深感欣慰。

然而，我心里却感到阵阵疼痛。研制播种插秧机，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曾希圣在被剥夺工作权利后，做任何有益的事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让这样一位久经考验、忠心耿耿、才华横溢、屡建功绩的老干部、省委第一书记一闲数年，不得不"自谋职业"，去摆弄他根本不熟悉的机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用迫击炮打麻雀，是浪费？是滑稽？抑或是一种悲哀？

他设计的那两台机械的命运如何，无需追究，因为直到今天，仍没有一台适于南方水田的手推插秧机得到推广使用。1965年8月，中央调他到西南大区任职，于是举家移居成都。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能见到曾希圣了。不久"文革"爆发，他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便结束了在西南的使命。实际上，从1962年他58岁开始，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四川是"文革"中打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曾希圣的被揪斗、被摧残是可想而知的。一个铁骨铮铮、秉性刚烈的伟丈夫，受了长时间的思想压抑，继而又受到难以忍受的迫害，不久就患了血液病，住进医院。正被"造反有理"的口号闹得天翻地覆的医院，医护人员忙着"革命"，哪有几多时间为一个"走资派"供氧，输血？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68年7月15日便带着一腔委屈、愤懑和遗憾与世长辞。身后留下了余叔和5个孩子，以及一片清凄。

这时，我还在蹲“牛棚”，直到1969年秋天，我被“解放”回南昌，看到余叔给我的一封信，才知道曾希圣已去世一年多了，顿时悲痛不已。随即含泪给余叔复信，希望她珍重身体，带好孩子，不要过于伤心。一个多月之后，我进京探望尚奎，马上给余叔拍了一个电报。当我抵达北京车站时，她已在那里等我多时了。大难不死，好友重逢，悲喜交加，我们笑一阵，哭一阵，好久好久都无法平静下来。

在中直招待所余叔的住处，我仔细打量我的友好余叔，发现她又黄又瘦，面色憔悴，容颜苍老，算一下她的年龄，40才出头呀！心里一酸，泪如泉涌。

余叔知道我在为她伤心，便马上把话题岔开：“水静，你知道吗，老杨就住在这后院呀！”接着，她详细地谈了发现老杨他们的戏剧性的经过。原来，这中直招待所有三幢楼房。余叔住的是第一栋，中间一栋是空的，不住人，而后面一栋虽然住了人，却不让进去。她感到好生奇怪。有一次，她的小儿子“小猴子”在院里到处乱钻着玩耍，无意中竟钻到后楼去了，回来告诉她：“里面有好多老头子。”她猜想可能是被总理保护起来的那些领导干部。于是叫“小猴子”进去打听一下，并要他告诉他们说：“我是曾希圣的儿子。”精灵的“小猴子”很快就搞清楚了，杨尚奎、江华等人都在里面。此后，“小猴子”就成了“联络员”，他们的衣服需要缝缝补补的，由“小猴子”拿出来，她弄了些吃的东西，也由“小猴子”送进去，因为孩子小，没有人注意。

我在中直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便因病住院了，但仍和余叔作了几次长谈，了解了老曾去世前后的详情，老曾的后事是周恩来总理派专人料理的，并对他的家属给以照顾。我回南昌后，还是没有多少自由，但可以写信。我们俩书信不断，互相倾吐友情，交流思想，也算是苦中乐事。我工作之后，借出差机会去北

京时，还在她家住了好几天。我们同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经常聊到深夜，从早上一道去菜市场买菜，到晚上没事闲聊，我们都在一起骂“四人帮”那伙贼子。1974年，尚奎重新担任省委书记，我去北京的机会就多了，每次都要到她家小住几天，陪她说说话儿，为她赶赶寂寞。这时她也担任了北京市二轻局副局长，总算有了个工作。1979年秋，她写信告诉我身体不适。从她的描述看，我发现了一种不祥预感。不久我到北京，找到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得知她果然患了结肠癌。我非常难过，并立即搬到她家陪她住几天，我装着高兴的样子和她谈天，可一个人在背后却暗暗流泪，我的好友显然不久于人世了。半年之后，我们在上海重逢，还遇到王光美和她的孩子。十年动乱后，第一次见到光美，又是伤心，又是高兴，别有一种滋味，后来我又和光美的儿子源源陪余叔到苏州去玩了一趟。我们照了很多相片，回到上海，待照片洗出来时，我吓了一跳，我和余叔竟照了这么多照片，难道是最后一次合影了吗？我好哭了一阵。果然，她一回北京，病情就恶化了，手术后便一病不起，她的孩子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妈妈非常想念水静阿姨。”我决定独自去北京看望她。可是，由于心脏病发作，医生和家人都不让我走。我只好在书信、电话中给她以安慰，打算自己病情稍稍好转便赴京一趟。

我终未能和情同骨肉的姐姐余叔见上最后一面。1981年6月13日，海军司令员叶飞的夫人王于同志打来电话，她声音颤抖的告诉我：“余叔逝世了。”我扶着桌子，几乎昏倒，心绞痛随即发作。我知道这一天很快会到来，而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是如此突然。我为没有和她见上最后一面而深感内疚，更为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而谴责自己。

后来孩子们告诉我，余叔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薄一波那么大年纪，还冒着酷暑参加了向余叔遗体告别仪式。这多少给了

我一点慰藉，但也引发了我对故友的深切思念。

半年后我的心脏基本平复，便随尚奎去北京开会。我到北京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余叔的几个孩子陪我去八宝山看他们的爸爸妈妈。到了八宝山骨灰堂，我一把将余叔的骨灰盒抢在怀里，放声痛哭：啊、余叔呀，余叔！从50年代末以来，我们有多少愉快的聚会哟！我们情同手足。你虽然比我大两岁，却是那么年轻漂亮，那么富于光泽，内心又是那么真挚，热情，那么纯正善良。每次来北京，你总有说不完的话，可现在，你怎么不说话呢……我哭得泪涕交流，不能自制。

接着我又去看望曾希圣的英灵。我对着他的骨灰盒鞠躬致哀。他的相片如同生前，戴着那副我熟悉的金丝眼镜，带着我熟悉的坦诚的微笑，似乎向我点头打招呼。对于这位为人民革命事业立过汗马功劳的英雄人物，对于这位为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昔日领导，我更多地是把他看做是一位老朋友，一位老大哥，而他也乐意担任这个角色。我常跟他开玩笑，他则说我在七师一定是个"调皮捣蛋的兵"。我多么希望再听到他的声音啊！在他的周围，还聚集着陈毅元帅、陈赓大将、曾山、陈正人部长等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风流。我和他们都非常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可现在都成了一把冷灰。我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一种彻骨的悲哀浸透我的心身。我突然觉得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空幻，想到《红楼梦》的《好了歌》……

我再看一眼曾希圣的遗像，似乎他收敛了笑容，变得严肃起来，这位生前从来不曾批评过我的老领导，似乎要批评我了！我蓦地从哀伤中苏醒过来，正因为生命短暂，才应该格外珍惜，才应该对人生对祖国有所作为，使人生变得充实。曾希圣就是这样，他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热情奔放，都在革新创造，纵然遭到罢黜，而长期赋闲，也丝毫不影响这种创造的意义。他在20年

前所推行的“责任田”，即今天所说的农业承包责任制，不是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吗？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人们，听过这次传达的人们，以及安徽的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他们会记忆那个被斥责为“刮单干风”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吗？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全国曾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因为万里在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时，率先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使安徽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缺粮省成为最早解决粮食问题的省份之一。这是否和曾希圣一度推行责任田打下的基础有关呢？

尽管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得很不痛快，但他的生命非常充实，很有意义，以至同志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水 静）

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

编者按：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控制人口理论，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在今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平常道理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已经接受了马寅初的意见，彻底纠正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错误批判马寅初，也早已成为一段过去的不可挽回的历史了。此文沉痛地叙述了这段历史，借此提醒今人后人，牢牢记取经验教训，再不要重复这类错误。

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由此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人口多少好的争论却延延续续了40多年，至今中国人仍深深感受到由于这场争论造成的余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像一轮旭日升起在亚洲大陆的东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率领着开国功臣们从容地走上天安门城楼，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类四分之一"的概念，按当时世界总人口计算，就是近六亿人。六万万中国人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本身就显示出他有何等巨大的能量和威力。所以，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湘音，无比自豪、无比自信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新中国刚刚成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解放胜利的狂欢之中，生产和社会秩序从长期战争的混乱状态中逐步得到恢复，人民

安居乐业。可是，伴随而来的人口生育率提高，而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国力承受力，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焦虑。1950年，年近古稀的政务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邵力子就怀着担忧的心情，发表了他的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他认为，新中国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生产落后，基础薄弱的烂摊子，建国后正有待振兴发展，而人口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对人口加以控制，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影响民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是凭着自己多年的从政经验，提出了上述颇有见地的主张。可是，此意一出，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和非议。

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千分之三十九，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呢？为了证明他的看法，他从七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假设：第一，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就业率高，结婚人数增加，生育机会多；第二，解放前婴儿死亡率很高，解放后，社会福利和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新生儿存活率大大提高；第三，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鳏寡孤独皆有所善，人均寿命延长；第四，战争消弭，天灾损失降低，社会安定，人民死于非命者少；第五，尼姑还俗，娼妓从良，组成新的家庭，创造生育机会；第六，封建残余观念，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五世其昌

等等，推动着早婚多生；第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无形中变成多生有奖的政府行为。

马寅初之所以把人口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发现："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如果让中国人口像过去和现在这样无限制地发展下去，那么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就必将受到极大阻碍。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图之。"为了证实这个结论是对的，马寅初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有趣的是，马寅初不仅同第一个提出节育主张的邵力子是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而且还是1882年同年生，又同时先后提出节制人口的主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马寅初和邵力子发言时提出："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这个建议虽然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赞扬，但在当时，不少人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是我们的优势，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因素。

邵力子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深信自己提出的节制生育的主张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切实可行的。但鉴于当时人们的科学知识匮乏，同时又片面认识人口和强大的关系等现实，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之后，邵力子于同年12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文章。他认为，要

计划生育,就必须普及避孕常识,人们一旦掌握了避孕手段,就可以减少盲目生产,减轻妇女的痛苦。故避孕是节育的第一步。

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的负责同志开了一个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会后,刘少奇做了总结发言:"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2月,中共卫生部党组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正是在此时,马寅初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的增长率不是每年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千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在这次会上，邵力子也正式提交了一份《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的提案。可是提案一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温州市政府的一位要人说："邵某代表哪一界人民的利益？我们人民将要求把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撤销。"由此可见，推行节育工作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其实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本身还有很大的区别，节制生育只是适当地加以限制，计划生育则是有硬性的指标规定，可就是适当的加以限制，当时也为一些人无法接受。

1956年1月，第一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邵力子补充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重申了节育的重大意义。并写信给温州市政府中提出非议的那位领导，请他从国家的前途考虑问题。随后，邵力子取得生理工作者赵以炳等人的科学论证结果，并得到卫生部长李德全等人的支持，于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节育办法和避孕药品。之后，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印发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也再次提出了控制人口问题，得到在场科学家们的赞成。

9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

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个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口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上“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发言，立即得到医学专家钟惠澜的支持。同时也得到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决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作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

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邵力子对这篇文章极表赞成。他在发言中说：“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人口控制论，他从多方面说明我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邵力子之所以不说完全赞成马寅初的意见，是因为他不能接受马寅初认为的人工流产就是杀生的带有基督精神的观点。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之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诚然，这些指责并不能代表毛泽东的看法。在9月至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由毛泽东主持修改并通过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中，还明确地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做会议总结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四年普

及推广，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8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也不要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争论一下，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这时的毛泽东仍表明他是赞成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的。

但是，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人口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却一直是矛盾的。这在毛泽东的批驳艾奇逊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心迹。

毛泽东批驳艾奇逊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写道：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了艾奇逊的人口观，他以革命理论家所特有的那种犀利的口吻质问艾奇逊：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

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5年,在毛泽东发动下,中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即合作化运动。他面对这场波澜壮阔的高潮自信而豪迈地说:"合作化以后,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毛泽东还认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因此,他以为当然还要靠增加人口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他又不无矛盾地说:"我国有6亿人口,……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呢?3月20

日，他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2200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3600多亿斤粮食，增加了1400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是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1949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人多一些好"的主张。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尽管他谈到了节育问题，但仍念念不忘那个曾经令他极度兴奋过的命题："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他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再增加几倍，我们也不愁没饭吃。可是，就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第二十九条又明确规定了节制生育的政策。很显然，毛泽东的讲话与上述政策发生了冲突，他本人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于是，又补充说："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的。"

莫斯科大会上，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如果打原子战争，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1957年11月2日8时，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登上苏联派来迎接的"图104"客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两次都是去苏联），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都云集在莫斯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国际共运中最盛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聚会。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被当做贵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包括有许多重要内容的讲话,如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为首,反对赫鲁晓夫把和平过渡写入《莫斯科宣言》,以及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在他多次的讲话中,详尽地阐述了他对未来战争和与战争相联的人口问题的看法。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还有一半,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就多次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这一思想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他甚至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什么要早打呢?他认为我国刚刚从战争走过来,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一支训练有素、斗志高昂的军队;同时我国底子差,还没有搞什么建设,国民党留下的只是一个烂摊子,再打也还是一个烂摊子,打完了,可以全心全意地去建设。为什么要大打、打核战争呢?因为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牺牲越大换取的果实就越大:"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毛泽东对党的高级干部曾说过这样的话:"6亿人口,动不动就毁灭,哪有的事?何必说得这样严重嘛!就是原子弹大战,顶多会毁灭我们一半,我们还有3亿人,怕什么?……过去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打了4年,现在是原子战,可能只要3年,打了再建设,索性把帝国主义搞了再建设也好。"

作为战略家，可以说毛泽东最在行的就是打仗，因此，对于战争他比任何人都敏感，他要求全党全国都纳入他的战争思想的轨道。“人多一些好”的思想也正是基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考虑。

“大跃进”开始了，粮食卫星飞上天。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听赫鲁晓夫说，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马上表态：“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苏美两国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可能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但中国与英国相比，在产品总量方面超过英国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当时英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10倍以上才能真正超过英国。

限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较低，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产品总量有较大的增加，就必须增加劳动总量和提高劳动效率，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靠人力来实现，要么加大劳动强度，要么增加劳动人口。从近期效益来看，只能选择加大劳动强度，搞群众运动，打人海大战，而要解决长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是要增加劳动人口。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嘛！恐怕将来搞到7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但同时他又表示：“我是赞成节育的。”

马寅初和邵力子是否出席了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笔者不清楚，但他们对毛泽东多次说到的“赞成节育”的话，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2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一届五次会议上，他们

仍然把节制生育问题作为发言的中心议题提了出来。

马寅初的发言中重点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节制生育，第二是文化技术下乡。他说："关于节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

直接者还可说是措施，间接者根本与措施无关，纯粹是由于将大量的强劳力集中于水利工地，减少了夫妻接触而产生的负效应。

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使节育工作有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城市，晚婚问题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中国的主要人口在农村，关键的问题还是农民问题。马寅初对节制生育工作在农村中取得的进展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收获。……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尽管这种情况在当时农村还是极个别的现象，但马寅初由此已看到了节育的光明前途。

在第二个问题中，马寅初通过说明"文化技术下乡"和"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的种种好处，以证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主要是靠提高人口质量和劳动效率而非增加人口。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作用。他说，知识分子下乡，一方面可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可以将现代科学文化与技术传授给农民。马寅初讲这番话时确确实实是在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下乡的号召，但由于他的思路与毛泽东考虑的不同，因此，他过分强调了知识分子作用的一面。他说："毛主席曾经

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而写作(指帮助农民总结经验——撰写者注)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他表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其实，毛泽东所讲的"锻炼"是专指体力劳动而言，而马寅初过分强调了脑力劳动的作用，这本是曲解了毛泽东的本意。果然3个月后，毛泽东就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讲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将中国引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在这次会上，他不断地发挥他对人口是多了好还是要少一些好的看法。当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笳谈到人地矛盾引起吃饭难的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5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7亿5至8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

4月15日，毛泽东在批示《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时，又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5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继续发挥他的"人多是好事"的观点："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现在是6亿人口，再过十几年是8亿人口，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科学技术这一套，在这些方面赶上一切国家。"

"8亿人口，10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100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就会节育了。"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

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作检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的错误。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机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8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毛泽东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而此时的马寅初面对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却变得越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于5月9日和7月24—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文;但马寅初也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十全十美,所以,从8月起,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外地搞调查,以求证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一次有位与马寅初非常熟悉的党员学者,听说马老来视察,执意要请马老吃一顿便饭,马寅初应邀而来,没想到这位学者没说几句话,就劝马寅初说:“现在大跃进,粮食吃不完,不是不够吃,您的人口论恐怕要重新考虑考虑。”马寅初当即起身告辞,连筷子都未曾动。其实此人只是为马寅初的处境担忧而说的这番话的。而刚正不阿的马寅初自有他的信念和准则,在没有证实自己的理论有错误时,是决不会因压力而放弃他的观点的。

1959年,马寅初曾对当时对他人口论的论战有过一个小结,并申明自己的做人准则:“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

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敢言。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总理对马寅初的处境非常担心,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总理劝马寅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抗日战争中,马寅初来到大后方重庆,鉴于他的学识和声望,被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因对国民党政治腐败不满,写了不少揭露四大家族在国难当头大

发国难财的文章，触怒了蒋家王朝。蒋介石派人游说马寅初，企图用封以高官来收买他，但马寅初愤而拒绝。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自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在去年 8 月讲过"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10 月 24 日，康生召集理论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的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为了掩盖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11 月初《新建设》全文刊登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12 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

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工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了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报刊上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主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12月23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面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适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1960年1

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被当做资产阶级学者而遭到批斗的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

正当康生挥舞着权杖向马寅初大举进攻的时候，中国的某些地区由于"大跃进"的疯狂带来的负作用，出现了粮荒、浮肿病和出外逃荒等等不应有的现象。促使问题向严重方向发展的是，这时的报纸上还是一个劲的宣传"形势大好"，农业到处放"高产卫星"。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难道共产主义就是解决一个吃饭问题吗？当时已被当做资产阶级学者而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说："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

面对天真，马寅初可以装聋做哑；但是面对无知，马寅初就要有所理论。只要还给他说话的权利，他绝不会将这个权利就着米饭吃下去。

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全国再度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浮夸作风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学毛著出现了形式主义和庸俗化的倾向，

马寅初对此感到忧虑。在全国政协组织的一次学习小组会上，有位委员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后也是对的。"马寅初听后说："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革命实践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同志，他们的话或著作，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管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在百年、千年之后，或永远都是有用的。我相信毛泽东本人如果听了你的发言，也肯定不会赞成！"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大跃进"虽然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它产生的负效应，却为暂时的控制人口出生率提供了一个机遇，尽管这个代价是多么巨大。以 1955 年到 1958 年的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计算，1959 年到 1961 年人口实增长比前四年少生了 4600 万人，全国人口总数实际上维持在"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上。

可是，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由于开始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中国前进的路线又重新拨上正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口出生率也随之上升了，这个现象再次引起了有识之士们的大声疾呼，要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一次座谈坐上，邵力子听了著名妇科专家严仁英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讲话后，不胜感慨地说："让我讲真心话，假如这几年内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多困难了。我建议，医药卫生组在宣传计划生育方面应该多做些工作。"

在批判了马寅初和三年大跃进的折腾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提计划生育的问题，此时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人口与吃饭的矛盾。尽管没有人敢提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计划生育问题还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3年,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国务院关于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决定,使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经过6年的挣扎之后正式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宣传讲解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具体要求。1965年3月,全国政协第四届的一次常委会上,周恩来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协助搞好计划生育工作,他对与会的人士讲:"这件事,邵力子有一功。"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指出:"我们要搞计划生育,来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

毛泽东重复了马寅初曾经大声疾呼过的"人口非控制不可"这句话。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全国顿时又陷入无政府状态,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又被停顿了下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有如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据统计,从1965年至1973年的9年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除两年略低于2000万外,平均每年都要增加2000万人,使总人口数急速地向9亿冲刺。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加上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全国城乡人民又面临着一场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人口增长的矛盾,人口与吃穿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个严峻的形势,不得不又引起中央决策人的重视。1968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号召,试图通过"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来缓和这个矛盾。而此时的中国,又一次不是按正常的轨道在运行,即使是伟大领袖的号召,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而

已。但毛泽东毕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70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呼吁：七十年代要注意计划生育。同年，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对卫生部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批评他们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1年7月，周恩来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个别特殊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1972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会议。1974年，毛泽东重复了马寅初当年大声疾呼过的那句话："人口非控制不可"。这句话引起了全党的重视，为脱缰的难以控制的人口膨胀这匹野马戴上了笼头。遗憾的是，这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9亿大关，如此庞大的基数，为中国控制人口带来了无比艰巨的使命，同时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一个时时引发阵痛的隐患。

1965年1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华访问，毛泽东单独约见了他。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斯诺问："主席先生，在中国自己这个联合国里，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你能根据最近的调查，给我一个人口数字吗？"

毛泽东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有人说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对于这个数字我不太相信，中国哪有这么多人？"

可是，1970年12月，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又谈到了人口问题。斯诺说："人类已经在一些事情上改变了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者10年以前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这一次不再回避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了。他坦率地

说:"没有。你受人欺骗了。在乡下,妇女仍然想要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一个。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这位母亲还想再生。很快就生了9个。这位母亲已四十五岁左右了,他最后只好决定就这样算了。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需要时间。"

自从毛泽东指示"人口非控制不可"之后,中国的人口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80年,已降至千分之十一点九二。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这时的人口总数已经接近10亿,中国人口仍以每年新增上千万人的速度递增。假如毛泽东当年支持了马寅初等人的意见,中国人口可能就被控制在7亿多。然而,任何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必须面向未来,中国人还将为庞大的人口付出代价。

(辛 平)

"文革"前夕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十年动乱的过来人都会记得,"文革"一开始就向全国通报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恶毒攻击"林彪和叶群的"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

严慰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夫人。她1938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后,一度经常接触叶群,对其品质作风一直很厌恶。50年代后期林彪权势增长,叶群更加骄横跋扈,到60年代越发不可一世。嫉恶如仇的严慰冰决心写信警告和刺刺他们,结果却给自己及其全家尤其是陆定一带来了坍天大祸!

林彪在其著名的"(1966)5.18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又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于是,就在林彪夫妇的直接导演下,圣洁的中南海内外,演出了以下的一幕幕人间悲剧、惨剧和政治闹剧、丑剧。

增福堂惊梦

4月的北京,正是风和日丽的阳春时节。原来是皇家内苑

的中南海，更是一片桃红柳绿，到处鸟语花香。陆定一家所住的院中院“增福堂”，也正群芳吐蕊，生气盎然。那纷纷扬扬的柳絮，吹不尽拂不开，引发了“增福堂”女主人严慰冰的诗兴文思，感到它很像漫天飞雪。现在恰是农历闰三月，真是艳阳三月飞白雪，不知怎么，她由三月雪，忽然联想到“六月雪”——也就是我国古代著名悲剧《窦娥冤》，这部悲剧以违反自然规律的六月飞雪作为象征，为一个贤惠女性的横遭诬陷蒙受奇冤发出了悲愤的控诉……。严慰冰一扬头，似乎要甩掉这个与眼前景色极不协调的不愉快的联想。谁知这个联想没有闪开，又想起了昨夜二妹严昭的一件事，觉得这简直是个不吉之兆或是难解之谜。

中年丧夫的二妹严昭，由于就在中南海工作，身边又无所依，大姐严慰冰就让她来增福堂同住，一来上班近些，二来相互有个照应。多年来倒也平平静静，安生自在。谁知昨夜(4月27日深夜)，已睡下的严昭，忽然起床出屋，打开院子里所有路灯，到处寻找着什么。什么也没找到以后，又一个人呆在外头，凄凄切切地唱开了一首不知名的悲歌。本来没有睡着的严慰冰，连忙起来拉住严昭，用自己早年给她取的名号叫道：“二木头，你又发什么傻劲，半夜三更，跑出来唱什么哭调?”

严昭一见她，竟越发动情地哭起来。严慰冰更着急了，连着追问她怎么回事，她这才恍恍惚惚地说：“晚上躺下后，似梦非梦地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哭，声音很清楚，哭得真伤心。我自恃一向胆子大，又想知道到底谁在哭，便独自起来查看。可是满院子都转到了，却什么也没有见到，心里纳闷，睡意全跑了，就坐在外间，好安定一下自己，同时再听听那哭声会不会再出现。坐着坐着，只见冷月寒星，浮云若梦，不由想起自己的孤寂和不幸，便随口唱起一首悲歌，以寄托和宣泄自己的伤情忧思，结果却惊动了大姐。”严昭又说，最近她回到增福堂，总是有点心神不定。院子

里有一棵梨树，平时她常为它除草培土和浇水，这几天那棵树正满树银花。轻风一来，素净花瓣纷纷飘落，满院都是一股清香。可是她今天下班回来，见到那棵树，突然产生了一种可能再也见不到它的感觉。

严慰冰道："你别神神道道地说胡话了，自己活见鬼，还要吓别人，回屋睡你的大头觉去吧！"

严昭还是固执地说："说不定真有第六感觉。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好像要出什么事！"

大姐道："能有什么事？有事也碍不着你，只要有我在，就没你的事，什么事也没有！"

她这话是安慰严昭的，也是给自己宽心的，因为她心里也感到有"什么事"了！

去年入冬以来，她总是摆脱不了一种郁闷烦躁以致想大喊大叫或痛骂什么人来发泄一下的心情，她曾暗自找过原因，发现这种反常情绪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形势引起的。自己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丈夫陆定一又是我国宣传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直接间接知道不少情况，从去年 11 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来，全国思想文化界都被搅得人心惶惶。到了 1966 年 4 月，政治气温直线上升，本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的《解放军报》，突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全国的所谓大革命问题，气势汹汹地指手划脚甚至发号施令起来，耸人听闻地宣传党和国家已被什么"黑线"、"黑帮"专了政。那个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明星"江青，正和自己一向嗤之以鼻的林彪、叶群打得火热。他们你唱我和，互相吹拍已令人恶心了，而毛泽东主席又公开首肯了他们合伙搞的一个什么《座谈纪要》。这个所谓"纪要"虽以"部队文艺工作"为名，内容却与部队风马牛不相及，说的全是党和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文化战线大事，并且又是陆定一所管的

事。《解放军报》登的那些火药味特浓的文章、社论等等，大都与这个“纪要”有关。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军报和它后面的人，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严慰冰焦虑的问题之一。

使她心烦的问题之二是自家的事。老伴陆定一在2月间招呼也不打就去了外地，并且一去无消息。不仅没写过一封信，连电话都没有给家里打过，以至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作为妻子的严慰冰都一无所知。这太反常也太蹊跷了！她虽然无意涉足政坛，却感到政治之“足”，正在往她家里“涉”。就在这个月，陆定一和她一直尊重也比较亲近的彭真，突然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原来由他主持的有陆定一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宣告撤销，他们在2月初一起讨论议定的向毛泽东作的“汇报提纲”，当时已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也通令撤销并收回。加之《解放军报》和它后边的林彪、江青等人的所言所行，无不使她感到，正有股股阴影甚至是魔影，向她的头上以至家里，越来越近越沉重地袭来！

严慰冰心想，二妹严昭梦魇似的幻觉，是否也是由此而起的呢？她想不清，更没法说，只得连自己带别人一起糊弄着，连哄带劝地拉着严昭回屋睡觉去了。

她们一觉醒来，已经是4月28日。就在这一天，比她们幻觉和梦魇更可怕的事，果然发生了！

白日被绑架

严昭一早就上班去了。严慰冰所在的中宣部，因为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形势，搅得人无法安心工作，不上班反而眼不见为净，严慰冰也就没去。过两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严慰冰想利用时间把家里收拾一下，准备全家人都回来过节。孩子们要回来，离家两个多月的陆定一，如果回来过“五·一”，这一两

天就该到家了，她想好好安排一下，享受一次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稍稍冲淡心头的愁云。谁知这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她所渴望的天伦之乐，再也不会出现了！

将近上午11点，严慰冰正忙着整理家务，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放下手里的事，过去抓起听筒问道："喂，哪里？"

"我是×××。"对方答。

"哦，×副部长，我是慰冰。"×××是××部管人事的副部长，严慰冰对他比较熟悉和尊重。他知道陆定一不在家，这个电话显然是找严慰冰自己的，就又问道："有事吗？×副部长。"

"是这样，严慰冰同——"不知为什么，×副部长随口而出的对对方的称呼，却咽回了后一个字，"同志"不同"志"了。不过严慰冰并未在意，只听对方又说："是这样，我要去看你，你不要出去。"

严慰冰忙说："要是有事，还是我去吧，您别亲自来，太不敢当了。"

"不，不，你不要动，哦，你不要来！"平时说话办事都很稳重的×副部长，今天似乎很急，刚才竟脱口说出"不要动"！似乎下一句就是"举起手来！"严慰冰也没细想，听见对方在电话里似乎尽量用平静的口气继续说："你不要出去，不要来，就在家等着，我马上就到。"

不等严慰冰回话，那头就把电话挂断了。她奇怪地瞅瞅手里的电话耳机，这位×副部长，今天怎么啦，往日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为什么忽然要来"看"自己？如果有事可以让自己去，他却要亲自出马，电话里声音又那么急，这都为什么？她本来想自己去一趟，对方却把电话放下了，只得遵命在家等着。她无可奈何地淡淡一笑，搁回了耳机。无心再干别的。随手一一拉平了沙发巾和茶几上的桌布，又端来了接待客人用的一套紫砂茶具，

静候着×副部长的光临。

才过了十几分钟，增福堂院外就响起车声，严慰冰听出不止一辆车。一会就见×副部出现在院门口，却见他又回头向什么招呼了一下，才一个人走了进来。严慰冰慌忙上前招呼道："×副部长，欢迎您来，让您亲自来，真是不敢当。"边说边把手向客人伸了过去。

谁知×副部长却似乎没有看见她伸过来的手，连通常的问好寒暄也没有，更没有接受她的热情邀请入座品茶。劈头就冷冷地说："中央组织部找你去谈话。"

"找我？"严慰冰疑惑地问，又暗自想道，就这么点事，电话中也可以说，×副部长何必亲自来，不过既已来了，还得依礼接待，就点点头答应道："好吧！"又说："我马上骑自行车去。"

×副部长说："不，你现在就去！外边有车——接你去。"

"哦？"严慰冰奇怪了，中组部这么近，干嘛还要用车接？愣了一下又问道："谈什么，您知道吗？"

"不清楚，哦，不大清楚。"

"怎么这么急，还现在就去？"

"这也，不清楚。"

"到底什么事呢？"

×副部长回头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小声吐出半句话："好像是，你和叶群……"

"和叶群什么？"

"你们——不和的事——吧！"

严慰冰同叶群在特供门市部"吵架"的事，早已风闻中南海和中宣部等中央机关，组织上要正式了解一下这事，是可能也是必要的，但是×副部长却在本来可以肯定的半句话后面，加了一个"吧"字，不由使问题又玄妙了。严慰冰还是没有再细想，却因

为×副部长提到叶群，又引起了自己的一股气，是需要和中组部谈谈，他们也应该管管这事。就对×副部长说："好吧，我这就去。"她本想进屋换件外衣，见×副部长一直站着等她，便只掠了一下头发，拉平了衣服下襟，就穿着家常布鞋，向门口让出一步，对客人伸手示意，想请他先走。谁知客人却反过来退到后边。严慰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心想走就走，反正公事公办，不必太客套，她领先迈出了客厅。

严慰冰一出增福堂院门，就见迎面上来两个彪形大汉，很不礼貌地一边一个夹住了她，并且紧紧抓住她的双臂，她正想问×副部长这是怎么回事，却见他低着头连忙闪开，快步一溜烟走了。自己连想什么都没来得及，就被那两个人连推带拽地押向正停在墙根下的一辆黑色小车，她扫了一眼汽车牌号，发现是公安部的车，正想问什么，就被人一下塞进车里，抓她的两个人，一左一右挟紧了她。她突然陷人恶梦中似的，很想挣脱和清醒一下，却听那两个低声喝道：

"不准说话，不准动！"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诱捕"或"绑架"了。虽然她身处全国安全系数最高的中南海红墙以内。

她当时没有想到，那位奉命诱捕她的×副部长同样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么认真其事、尽心尽责地完成任务以后，事隔二三个月，他自己也被揪了出来。

严慰冰出增福堂时，没注意院外还停着另一辆车，等她一被"请"走，那车里立刻下来几个人，冲进了增福堂，对陆、严全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由于他们是公安部的人，较之稍后被称为"打砸抢"的抄家，还是很讲政策的。可是，尽管搜查的专业水平很高，这次却没抄出他们想象中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任何"罪证材料"或"作案工具"，更没有什么"秘密电台"之类。只发现这家

最富有的是塞满所有书柜的各种中外古今和文史经哲书刊资料，此外有陆定一手抄自赏的毛泽东诗词，其中一幅《沁园春·雪》还精裱成中堂式挂轴，不仅显示了书写者的文采爱好，也表明了他对自己领袖的敬爱深情。这次是对陆家的第一次“洗礼”，随后而来的就不再是“洗礼”，而是彻头彻尾的“洗劫”了。不过，这一切严慰冰都不知道了，增福堂的女主人，再也管不了这个家，连她自己的生死安危，都管不了！

打掉“臭架子”

绑架严慰冰的汽车，堂而皇之地驶出了中南海饰有庄严国徽的西门，只拐了一个弯，就进了一个外观毫不起眼的院子。

她被押下车来，一定神就认出这是中南海西门斜对过的××胡同×号，距离那高大威赫的红色高墙，只有一百多米，陆家所在增福堂，离这里也只有常说的“一箭之遥”。严慰冰平时经常路过这院外，只是从未进来过，也根本不想进去。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个“好地方”，而是一个设在中南海墙下的秘密监狱，或者叫拘留所。严慰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里的“客人”。似梦非梦，半清醒半迷糊的严慰冰，没来得及表示惊诧和发出呼喊，目光却被院子里盛开的夹竹桃吸引过去。她是个热爱生活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女诗人，是个充满热情、柔情和温情的女主人。而对耀眼的艳红“桃”花和青翠欲滴的修长“竹”叶，刹那间竟似忘记了这处所在，甚至自己的处境以至存在……

“走！”一声怒喝声把严慰冰一下惊醒，她被推进里院一间大房子里，一进门只听一声怒喝：

“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你被逮捕了。”声音带着浓重的河北腔，出自一个五十上下干部模样的汉子之口。

“笑话！”严慰冰一抬被按着的头，生气地说：“谁是反革命？

凭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那河北口音的汉子又说，“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什么？”严慰冰真的觉得好笑，可这又不是开玩笑，便半是申辩半是自语地说：“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又蹦出一个女人憋着嗓子的厉声斥喝。“你，猖狂迫害，阴谋杀害林彪副主席和他的全家，你知罪不知罪？”

“我不知——”没等严慰冰答完这一句，就听那河北汉子一声令下：“搜身”！

几乎同时，一下子跳出四个汉子似的女人，这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至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了三角裤叉，汗背心。这四条女汉子对严慰冰仅差开膛破肚的搜查，使她被侮辱得想哭，想喊，想骂人！一股从内到外的透心凉，使她迅速冷静下来，不作任何反抗地咬紧牙关，似乎麻木地任凭那几个好像是女人的人，搜遍了她的全身，又把她身上剥下的衣服裤子等等，一件又一件，一寸又一寸地摸捏探寻着，连穿来的布鞋底子也撕开作了全面深入和广泛持久的彻底搜索。严慰冰默默地看着她们，连自己都希望她们真能搜出点什么来，以免辜负他们的“辛勤劳动”。可惜，她们什么也没查出。

到底才是四月天，不少人毛衣还没脱，赤裸裸站着的严慰冰，只觉凉气逼人，不由阵阵寒噤，她见身边一张床上有条旧毯子，就顺手拉过，想裹在身上挡挡风寒。谁知没等她将毯子披到身上，忽听那河北汉子一声怒喝：“放下！”

毯子被一下子扯去，摔到地上，严慰冰被拽得一个踉跄双手连划拉几下才保持住平衡，没有摔倒。

那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严慰冰轻蔑地看了对方几眼,此时此地的她,明明精赤条条,毫无体面可言,竟被认为是在“摆臭架子。”

严慰冰从这一天开始接受连日带夜无休无止的逼供审讯。审讯人员和看守差役分为每天四班,轮番连续作战。审讯人员的每次交替时间只有五六分钟空隙,严慰冰连上厕所都来不及,只能抓紧时间啃几口扔过来的冷窝头,不等吞完,下一轮审讯又开始了。她最初还听审讯者的问话,后来慢慢听之任之,以至根本不听也不理了。这一是因为自己又累又困又饿又渴,由无力作出反应发展成脑子完全晕眩了;二是发现他们问来问去几乎毫无新内容,只翻来覆去地追问她一件事,如何“疯狂迫害”和“阴谋杀害”他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和夫人叶群同志”。同义反复,周而复始,这一拨逼她交待,那一伙追她招供,审到后来,她连白天黑夜,天上地下,更别说左东右西,什么都迷糊、混淆和颠倒了。

终于她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朝着水泥墙,一头撞去……

“血溅”政治局

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正在安徽合肥作“调查研究”时,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给他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回北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北京来的电话对他说:

“你是坐火车回来,还是派飞机接你,由你自己定。”

受宠若惊的陆定一,不由热血沸腾,哦,中央要请我回去了,我又可以讲话了,便一扫他几个月来沉闷和压抑的心情,慨然答道:

"如果很急，就请派飞机来，不急的话，也可以坐火车回去。"

结果，还是给他派来了飞机，说明他回京的"任务"确实"很急"。

专程来迎接陆定一回京的飞机升空时，他的情绪不由也随之升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走到了顶端。北京等待着他的，不是五月的鲜花和节日的欢笑，而是他根本不会想到的自己"政治的死刑"！他那温馨的家所在的美丽的中南海，对于他来说，已像一首唐诗所描述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虽有丰富的想象力，陆定一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熟悉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中南海及其院中院增福堂里，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的事。他的妻子严慰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从中南海和增福堂"此门中"诱捕和绑架走了；连姨妹子严昭，也忽然失踪，正在某个"云深不知处"被"隔离"着。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在增福堂的那个家，已经被彻底砸烂，完全解体，自己回不去了。

陆定一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了飞机，就得到通知："毛主席要你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那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林彪突然大爆"冷门"，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大"奇闻"：会议一开始，到会者奉命传阅一份特别"文件"。

他们正在传阅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亲笔写的一份"庄严声明"。

"文件"全文如下：

我证明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 彪

1966年5月14日

就是这样一份亘古未闻的“历史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传阅,并严肃认真地进行讨论。这种奇事大概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次。



导演这场反革命案的林彪

林彪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呢?就在严慰冰姐妹已经被“揪”走以后,叶群几次向他放刁撒泼,逼着林彪要郑重地声明、辟谣,消除影响。林彪于是就给政治局写了那份“庄严声明”。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赶到政治局的会场,到达时会已开始了。他的视力本来欠佳,进会场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往常之点。例如他外出“调查研究”前代表中央和他谈话的彭真今天就不在;不该在这里出现的本是他下属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等人却在场。他更没有注意到,过去开会常常因病或在外地请假不来的人,例如林彪和康生,今天却端坐在会场的中心位置,并且虎视眈眈又居高临下地盯着他,而

自己的位置恰恰被排在他们的对面。这些他都没有在意，只是在与先到的同志招呼时，感到反应不够热烈，缺少通常必有的握手问好和亲切寒暄，更缺少一种必要的活泼愉快的气氛。对此他都视而不见，没往别处更没往坏处想，安然地坐在位置上，想静听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会议在过分沉重的气氛中静默了好一会，坐在陆定一对面的林彪，突然对他气势汹汹又怒气冲冲地，直呼其名喊道：

"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一惊，茫然地抬起头，林彪正怒目而视地瞪着他，由于气得咬牙切齿，把后面的话也给"咬"住"切"断了。隔了好长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

"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嘀咕道："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声色俱厉道："你讲，你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整个会场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住了。林彪由于说得过分激动和用力，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陆定一，吃惊地看着这位发难者，又看看周围的莅会者，只见有的人忙扭头他顾，有的人似乎在低头沉思，也有的人抬头看着他，只是其目光又明显地分为几种，一种是惊异和不安，一种是关切以至同情，还有一种是学着林彪样子作出的气愤状。只是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一声不吭。

陆定一虽然是一位书生，可又是一名长征老兵，革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乃至急风暴雨，也经过了不少，他很快使自己从林彪突然袭击中镇定下来。他发现对方"火力急袭"的"弹着点"，

只在严慰冰写过信这一个“突破口”上，便尽可能冷静地用平静语气解释申辩说：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他抬头示意了一下林彪，接着说道：“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他本来还想再说明一点什么，却听林彪突然又尖声嚷道：

“你，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虽也能言却并不善辩的陆定一，随口说了一句。面对这位不顾体面欺人太甚的中央副主席，他不慌不忙地补充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说完还直愣愣地看着林彪。

常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的陆定一，出人意料地冒出了这么一句看似平常却颇有针对性，且又极富幽默感的话，使全体莅会者一齐愣住了。不断传闻的严慰冰匿名信中说的事，加上传阅的林彪亲笔写的“处女证明”，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窃窃私议的笑料，陆定一这句颇为幽默的话大大刺伤了这位副主席。

果然，只见林彪的脸，先是气得煞白，接着又因极度愤怒，好像被人迎面扇了一个大耳光似地胀得通红，嘴巴张了好几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像电影“定格”似的，足足僵住了几分钟，然后突然跺着双脚，抬起右手，直指陆定一道：

“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他的右手食指，还应着骂声，勾手枪扳机似地曲了一下。将他意念中的满怀仇恨的“子弹”，全部射进了对方的“脑门”……

人们不由庆幸，亏得中央早有规定，凡是进中南海参加党的

高级会议的人，都不准携带武器。不然的话，今天一定可以看到一部惊心动魄的活剧《血溅政治局》。

好在当时林彪手里不仅没有真枪，并且有枪也似乎只有一颗"子弹"。他刚才打出了那一"枪"以后，又卡壳似的哑火了，虽然怒目而视得憋出了一头大汗，那本来"瞄准"着陆定一脑门的手，却抖抖索索地软瘫着垂了下来。而他的仇人陆定一，却若无其事的纹丝不动，似乎正在回味和欣赏着自己刚才那句幽默的回答。双方正僵持对峙进行"冷战"时，半腰又杀出个"救驾来也"的"程咬金"。只听一个山东侉腔的男中音吼道：

"陆定一，你是个特务！"

被指为"特务"的陆定一，头也没抬，只凭声音就听出此言出自何人之口。他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谁是你同志？"那山东腔又吼道。

陆定一又淡淡地说："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1942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

延安整风本来是毛泽东倡导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普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康生却节外生枝地借口审查干部，利用整风运动将大批干部特别是来自白区的知识青年，诬为"国民党特务""汪精卫特务"和"日本特务"等等，冤屈和伤害了许多同志。此事后来由中央作了纠正，但康生当时的所作所为，却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恶劣印象。

"文革"中，康生又故伎重演，不断毫无根据地随口定人为"特务"、"叛徒"等等，以压制和打倒反对者。这时见林彪敌不过陆定一，慌忙祭起他的传统"法宝"，不想陆定一也是过来人，不理他这一套，他便又祭起另一更厉害的"法宝"，重新厉声叫道：

"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

他还要继续"伟大"下去，会议却已经"全场活跃"，无法再开了，康生见自己的"法宝"治不了对方，压不住人，连忙提高嗓音，挥开了似能置人死地的"尚方宝剑"："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这次会议也赶紧收场，中止了这场"严肃"的闹剧。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林彪，在康生等"军师"的掩护下收兵回朝了。原是书生的陆定一，虽然仅以轻声慢语就初战告捷，连连挫强敌，却终于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容分辩就被推出了会场。

陆定一是严慰冰的丈夫，当然就是"反革命黑后台"；他是中宣部部长，而中宣部在此之前已定性为"阎王殿"，当然是非打倒不可的"活阎王"了。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又被列为一个新的"反党阴谋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其第一号竟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的彭真，第二号是与自己很少交往的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第四号是仅有工作接触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陆定一不清楚他们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更不知自己列名其间的这个所谓"反党阴谋集团"是怎么"反党"的，有过什么"阴谋"，何时"集"为一"团"，自己又何以列为第三号人物，俱一无所知。5 月 23 日，当时的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关于陆定一的决定中断言："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密切牵连的"。9 月 30 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并与已经成立的以"502"为代号的严慰冰反革命案的专案组，正式开始进行"横向联系"，至此，陆定一被彻底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就在彭真、陆定一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批从来不务正业甚至不干人事的"党棍"、"文痞"和"投机家",一齐挤上了我国最高政治舞台,成为红极一时以至主宰一切的政治暴发户。

大半年以后的12月16日,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小组长"兼"小小的老百姓"陈伯达,于百忙之中查问了陆定一的情况,当即对专案组发出指示道:

1.要降低陆定一的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一概撤掉。

2.要他们写逐日活动。

3.考虑交红卫兵审判。

上列几项"指示"中,可以看出陆定一在被"隔离"的头几个月,还是颇受"优待"的,这是由于执行者的疏忽还是恻隐之心,就不得而知。但上列"指示"的第3条却早在陈伯达"考虑"此事之前,陆定一等人已经被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揪斗批判得死去活来了,叶群就曾亲临现场"欣赏"过陆定一等被批斗时的"丑态"。

就像林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那样,陈伯达也念念不忘陆定一。1967年3月16日,他又进一步指示专案组说:"不能让陆定一在卫戍区那里反省,那是德国人盖的房子,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在那里休养。"接着又酸溜溜地说:"陆定一这些人,一活就是七十八十,比我们活的时间还长。"因此,决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地活下去。尽管此人自称"小小的老百姓",又说着一口不知哪国的中国话,却一字千斤重,陆定一马上由"隔离反省"升格为"正式逮捕"。那位"小小老百姓"又进一步指

示道："对陆定一要戴上铐子，要连续审讯。"这样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把陆定一、严慰冰的儿子也给抓起来，逼他们交代问题。当他将这些"革命措施"呈报"副统帅"请功时，林彪破例地没有让秘书代劳，立即亲笔御批："同意"。

于是，陆定一全家，旁及严慰冰满门，至少几代几十口人全部陷入了灭顶之灾！

"陈尸"中宣部

怪事新闻年年有，唯有"文革"期间多。

就在林彪、叶群和陈伯达等"开心之日"，陆、严全家"难受之时"，远在陆定一和严慰冰共同故乡的江苏无锡，一个当地驻军政治部的首长，凭着自己高度的"政治嗅觉"，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副统帅"的无限忠诚，忽然主动上书帅府夫人叶群说，他们搞到了一批陆定一、严慰冰在无锡的"罪行材料"，信中还附了这些"罪证"的照片、复制件和说明。写信者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将这批"罪证"实物，立即亲自送来北京，请"副统帅"及其夫人过目。叶群见信喜出望外，当下就降旨其晋京献"宝"。

这位"首长"到底献的是什么"宝"呢？原来此人所在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就在无锡，过去也因当地出过陆定一这样的中央首长而津津乐道，后来风云突变，陆定一出了问题，他的同是无锡老乡的老婆严慰冰，还是"阴谋暗害"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陆严二人与"副统帅"全家，已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便灵机一动，利用红卫兵正到处抄家破"四旧"之机，组织人闯进陆定一、严慰冰两家祖籍旧宅及所属七户亲属之家，进行了全面、深入和彻底的大搜查。他们兴师动众地查了个天翻地覆，只找到些旧日的破烂衣物，仅有几件东西似乎有点价值，一是陆定一父亲生前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有的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

朝服马蹄袖的清代官员；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陆氏家谱》，也多少算是反动遗物；最最重大的收获，是从陆家的破烂家什中，发现了一顶不知哪个年代用过的青布小轿，这都说明陆家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但是仅仅这些还分量不够，又从县政府所存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这才算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这批“罪证材料”被集中起来以后，又加进了一些据说也是陆严两家剥削来的“金银细软”以至锅碗瓢盆之类，一一拍成照片，编成目录，由他上书帅府报告，果然一“箭”中标，正投帅府所好。这位首长就带着他的“好马快刀”，用飞机捎带加火车托运着那批“赫赫战果”，奉旨进京投靠林彪来了。叶群对来人表示了热烈欢迎，亲自安排作了高规格接待，请这位首长在北京第一流招待所洗尘下榻。在听取汇报后，又将所带来的“罪证”照片及其目录，命人放大复制几十份，然后一一分送中央文革诸要人及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协助，促其更快、更狠、更彻底地将陆定一、严慰冰及其家族，全部斗倒、斗垮、斗臭！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老家横受查抄，他们在北京中南海内的住家，更是在劫难逃，从严慰冰被绑架走的4月28日起，连续经受了五次掘地三尺的彻底搜查。应该说由公安部执行的第一次抄家，是最为“文明礼貌”的，后来就一次比一次更不“温良恭俭让”了。一批又一批可爱的革命小将们，一趟又一趟地冲进增福堂来，见书籍就撕，据说那全是“封资修大毒草”，虽然其中既有李白、杜甫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反动家伙”写的，又有鲁迅、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写的，却都沦为同样货色，享受同样待遇。陆定一是个文人，也收藏了几件虽不名贵却也珍爱的陶瓷工艺美术品和古砚之类，“无产阶级”岂能搞这一套，乒哩乓啷，嘁哩喀喳，全部给砸摔碎了！最令陆家心疼的，是他们多年来购买搜集到

的几百张京剧名角唱片，也都成为“毒草”“四旧”毁于一旦。这些小将们有的真不知道，有的装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最最“无产阶级化”的康生和江青，用强取豪夺和诈骗偷盗等手段，搞到了大批也属“封资修”的古玩、文物和国宝，以及更多的老京剧唱片等等，据为己有独自赏玩。但是他是他，你是你，他们怎么都行，你陆定一就不行，就得“打翻在地彻底砸烂”不可！

叶群、陈伯达等人得到报告，在陆定一的北京住家，也查抄出不少东西，这触动他们，不妨将这几批东西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看看，以便接受现实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几经磋商，拍板成交，他们决定将无锡送来的“罪证”材料，加上在增福堂抄家所得的各色“封资修”物品，合起来办一个《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于是，“史无前例”期间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的原北大红楼后院，以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命名的“孑民堂”揭幕开张了！

在展览筹办过程中有关人员把各种“罪证”材料摆出以后，发现除了重新整个加工过的青布小轿和几纸地契以外，有许多展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仅不能揭露陆、严二人如何“反动透顶”，相反还透露出他们生活相当简朴，不失一个革命干部的优良家风，这样如实展出，岂不是作了反宣传。当他们向帅府及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后，竟获得了完全意外的解决办法，批准他们从国库中借出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绸缎布疋之类一起充实进原有的展品之中。这一高招果然取得了强烈效果，展览开幕以后，许多观众看到展柜中陈列的巨额钱钞，特别是那些皇家才有的金光灿灿的元宝，还有整匹整匹的绫罗绸缎，据说其长度可由中南海一直铺到颐和园。人们看后无不对陆定一、严慰冰这对“反革命”及其“反动家庭”，竟如此“骄奢淫欲”和“穷凶极恶”，纷纷表示出自己的强烈

愤慨和深刻仇恨。叶群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看到中宣部大院内的展览会场中，每天挤着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来的观众，连外地"无命派"也都派来了参观学习的代表，不由心花怒放，拍手称快，说这个办法等于进一步宣判了陆定一、严慰冰"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从此更是两个"政治僵尸"，展览就是将他们来一次陈"尸"示众，这是举办这一展览的重大政治意义。

不过叶群没有注意到，这次展览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对于许多"无命派"来说，还有十分实惠和经济收益。原来在展览结束以后，除了那些成捆人民币和金元宝应该归还国库，整匹的绸缎布和大件展品也应"统一处理"，其余全部展品凡是尚有实用价值的，都用内部处理办法折价出售，一件皮大衣"卖"10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细瓷花瓶，标价仅为5角。这使一批"无命派"战友大捞"洋落"，发了一次货真价不实的"国难"财。这一政治、经济双丰收的"革命运动"，很快就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到处都竞相效法办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罪行展览会"。

上述一切，只是林彪、叶群亲手导演的系列悲剧、丑剧的序幕，以后的部分，许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陆、严全家及其亲属一一被打人黑牢，分别遭受了多年以至十几年的摧残折磨，严慰冰的老母亲、老共产党员过瑛同志惨死狱中……光明必将取代黑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林彪、叶群一伙终于自取灭亡，葬身荒漠，与他们狼狈为奸并继承其衣钵的"四人帮"也相继垮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陆定一、严慰冰等同志这才大难不死，重见天日。陆老当选为党的中顾委常委，严慰冰也重新工作并出版了著作。可惜，严慰冰同志因为身心受伤过重，于1986年3月不幸早逝。但是，她及全家人亲历过的那些惨痛往事，似乎不该随之湮没。发生在那个不

正常年代和不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事件，不是可以让人们看到、感到和想到些什么吗？

（卢　弘）

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部历史剧，却为自己及全家以至成千上万人造成了人间悲剧，更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堪回首的历史活剧。尽管“导演”这部悲剧的人大都入土了，但是染手此事及热衷此道者都已绝迹和不会再生了吗？这位史学家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再看看这面“镜子”吧！

史学文才两绝俦，
十年京北擅风流。
无端试笔清官戏，
纱帽一丢成秃头。

这是历史和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为其同窗好友知交吴晗写的一首绝句。只是其最末一句似可改为“丢了纱帽复丢头”，甚至是“丢了一家三颗头”。为了一部清官戏，吴晗一家三个人死于非命。这是“史无前例”期间史有前例的历史悲剧！

11月11日的闷雷

1965年11月11日，北京城和往日没什么异样，可是这一天对吴晗和他周围的人却是一声沉重的闷雷。

这一天吴晗带着工作后的兴奋，回到他位于紫禁城西侧北

长街的寓所。这是一处四合院，书房设在西厢房。庭院中砖铺的十字甬路，两侧各植一株海棠。幽静古朴，甚合主人的性格和情趣。

吴晗每天回家总是先进书房，放下公文包，脱掉外衣，翻检一遍堆在书桌上的报纸杂志和信函文件之后，到北屋和夫人儿女说笑一番等待吃饭。今天也不例外，只是刚把手伸向书桌，夫人袁震就出现在门口。吴晗侧脸扫了她了一眼，只觉神色有异，抬头问道："怎么？身体不舒服？"他的目光从眼镜片后面担心地投向袁震。

袁震的嘴唇微微颤动着想说什么却似无从说起，指指桌上的《文汇报》就走了出去。

吴晗急忙拿起报纸，这是昨天11月11日上海出版的《文汇报》。一条通栏标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冲进眼帘，直穿眼底，震颤吴晗：

"唔？果然……"他急忙逐行逐段地看起来。为什么吴晗对此文如此敏感？又为什么首先想到"果然"一词？且从去年即1964年冬天说起。

这天，吴晗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周恩来总理叫住他，让他上了自己的车，轻声说："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

吴晗愣住了："没有哇！没有没有……"说了一串"没有"又郑重补充一句："绝对没有！"

"嗯！"周恩来轻轻答应一声。

"我为什么写《海瑞罢官》和怎样写的，大家都很清楚，市委的同志也都了解……"吴晗极想把事说清，只是实在太突然，一下子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周恩来已轻轻"嗯！"了一声，沉吟了一阵："你写个报告把情

况讲一讲好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海瑞罢官

吴晗编剧的《海瑞罢官》上演于1961年冬,为什么事隔三年,国务院总理关心起此事来呢?原来,《海瑞罢官》上演不久,1962年江青就找到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此戏,并称:“舞台上、银幕上……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时四位正副部长并没把此事看成某种信号而搁置一边。1964年,江青又直接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颇有锣鼓日紧之势,尽管这次又无人肯写,却传入周恩来耳中,才向吴晗了解此事。吴晗遵嘱把写作《海瑞罢官》的始末原由写成报告呈交以后,认为此事也就了结。不料到了1965年春,又耳闻上海有人正在撰写批判文章。这使吴晗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他敲响北京市市长彭真办公室的门。

“请进!”彭真正埋头于一大摞待批的文件、报告之中,抬头

望了一下进来的吴晗："请坐，教授！"目光仍在面前的公文上。

"教授"是彭真平时对吴晗的亲切称呼，只有在严肃郑重的场合才称他"吴副市长"或"吴晗同志"。

吴晗见彭真忙到这般程度，站在门边迟疑了。

"你坐呀！"彭真没注意吴晗的神情，眼睛盯着公文，随后拿起香烟盒举在半空："抽烟。"多年共事互相已不讲客套。

吴晗接烟点上，默默地坐下。

彭真把处理完的一份报告放到已办的一摞上，从未办的一摞又取下一份。借此空档向吴晗笑了笑："没办法，都要在上午处理完。"语气之中稍稍带点对吴的歉意。

吴晗会意地点点头，站立起来："你忙吧！"

"有事？教授！"这次彭真看出吴晗有话要说，他知道吴晗不是有闲暇"串门儿"的人。

"你太忙，不打扰你了！"

"来来！有事谈了再走。"他发现吴晗没有这么低沉过，索性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离开办公桌，示意吴晗回来坐下。

吴晗不再迟疑了："好！我长话短说，听说有人要批判我。"

"批判你什么呀？我怎么不知道，不会吧！"

吴晗把去年周总理如何过问此事，如何写了报告，今年又如何听说上海有人正在撰写文章等等，扼要讲了一遍。彭真听后反而笑了起来。在他看来只是一出戏的事情，又经总理作了了结，时过半载，不会再生枝节。再说，《海瑞罢官》演出以后，许多人赞扬，虽然也引出一些有关历史剧的探讨与争论，都属于学术讨论，"批判"二字从何谈起呢！更重要的是，批判一位副市长，自己作为市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怎能一无所闻？这种事是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研究的，怎么会谁想批就批呢！所以他笑了：

"别听有些人瞎传，批判你，我能不知道？"

吴晗的心理负担减轻了许多，他完全信赖面前这位领导，反而觉得自己未免有点幼稚，解嘲地笑了笑："这几天搞得思想包袱很大！"

"把心放在肚子里，教授，搞你那些学术大作吧！"

吴晗在文教副市长任内工作之外，又主持了几项重要的学术活动。例如：出版《国榷》、标点《资治通鉴》、主编周总理决定出版的《历史小丛书》等等。

吴晗起身告辞，临出门又被彭真叫住："回家不要对袁震讲这些事。"

吴晗感谢地点点头，轻轻闭上门，脚步轻快了许多。

彭真的思绪却并未终止，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事情不一定像自己说的那么简单。拨通邓拓的电话："邓拓同志吗？今晚我到你家去如何？"他想听听这位更熟悉文化界的市委书记有何看法或消息。

事情不仅证实了，而且从邓拓处得知，此事一直由江青在操持。

"又是她！"彭真流露出厌恶的神情。

这几年彭真被江青缠得的确够呛！特别是她搞的那个为展示戏曲改革"成果"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以来，经常纠缠着彭真不得不把北京市许多重要事情放下，为她的会演服务。江青的骄横跋扈，虚伪乖张，早已引起人们的反感和厌恶。

现在批判文章终于发表了，所以吴晗首先想到"果然"这个词。

他把《文汇报》重重地拍在桌上，双手有些颤抖："岂有此理！"

"这个姚文元是什么人？"不知何时，袁震又回到书房，站在吴晗身后。

“不知道！大概是上海的。”吴晗说着就提笔展纸。

“写什么？”

“两千字就把他驳得体无完肤。”

“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袁震把吴晗的笔轻轻抽了出来。

“简直是血口喷人嘛！”他无法平静。

当然，此时的吴晗万万想不到，1965年11月11日这一声闷雷，就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场锣！

《海瑞罢官》始末

许多人曾经不解，吴晗是位史学家，建国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对戏剧是位外行，为什么突然写起戏来呢？

此事似有很大的偶然性。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看了湘剧《生死牌》之后（剧中有海瑞出场），针对1958年前后，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的状况，提倡学习海瑞的敢于直言，并讲述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提议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同志根据这一指示，通过钱俊瑞鼓励明史专家吴晗撰写海瑞文章。吴晗深深理解这一指示的重要意义，不久就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海瑞与皇帝》，随后又陆续发表《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等文。由于吴晗文笔生动，这些文章引起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注意。马连良晓得了毛泽东主席号召发扬海瑞精神之后，极想把海瑞编成戏演，于是在1959年9月登门求吴晗写戏。

“不行不行，我都没看过几出戏，怎么能写戏呢！”的确，吴晗一直难得看上一次戏。所以，不要说写戏，看戏时也属外行观

众。但是居然有人登门约他写戏。他终于在马连良的盛情相邀下，答应试一试。这一试，就使他欲罢而不能了。想打退堂鼓又不好意思，硬着头皮写出个稿，自己看着都不是个戏！推翻重写，写到第四稿还是有史无戏，演员们说："您这剧本能唱，不能演！"最后还是戏剧家们建议单写海瑞除霸安民一段。直到1960年秋天才七易其稿定下来。定稿的剧本写徐阶之子徐瑛，依仗权势霸田占女无恶不作，知县庇护徐家，制造冤狱，海瑞微服上任，了解冤情，斩徐瑛、平冤狱、退民田，却因除霸而罢官。

当时吴晗兼职颇多，时间极少，写戏只能"见缝插针"。汽车上、床头旁，想起几句写几句；赶上参加大会，就像中学生上课偷看小说那样写起来。开始剧名为《海瑞》，后来才改叫《海瑞罢官》。此间另有一段原由。

吴晗的老友蔡希陶，是位很有文才的植物学家。一次，出国考察途经北京，吴晗请他吃饭，闲谈及吴晗有何新作。吴晗不无自嘲的告诉蔡："我居然写了一出京戏！"引起老友极大兴趣，一定要看看历史学家写的戏是什么样。因为蔡希陶第二天就要登机出国，就把剧本带回下榻处连夜看完，读后认为此剧并非写海瑞的一生，只是写其除霸罢官一段，提笔在"海瑞"后面加上"罢官"二字。第二天清晨起身前，急忙让秘书到邮局寄还吴晗，还在信封里装进补偿那一餐的半斤粮票。《海瑞罢官》剧名就是如此而来，这是1960年底，戏已经在彩排了。

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偶然。不料5年之后竟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别有用心"，那么"反动透顶"呢！蔡希陶如果知道他加的"罢官"二字，后来竟置自己老友于死地，成为该剧罪状的"要害"，是绝不会"多此一举"的。

“奇文”出笼前后

江青在北京两次找人写批判文章都没达到目的，还是老谋深算的康生指点迷津：“张春桥不是在上海嘛！”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江青顿开茅塞，立刻秘密乘专机赴沪。

一辆黑色轿车旋风般开到舷梯跟前，车里钻出一人，黑影里只看到两团反射着光点的眼镜片。“眼镜片”把匆匆走下舷梯的江青让进轿车，又旋风般地开向上海京剧院，名义上是首长来看看，实际是物色批判吴晗的人选。张春桥推荐姚文元执笔。从此姚文元执笔，张春桥修改，江青审查，“三点一线”，上海——北京，北京——上海，频繁往来，十易其稿。从起草到发表严格保密了七八个月，每次都是张春桥带着稿子，以请首长审听《智取威虎山》的音乐为名，审完就走，从不在京久留。江青也一再叮嘱：“不要给周恩来看。”

一声闷雷不仅打蒙了吴晗，震动了北京市委，全国的知识界也“开了锅”。上到白发苍苍的专家学者，下到风华正茂的学子、职工和中学生，纷纷写文写信质问《文汇报》，指责姚文元，人们谴责此文已“超出学术范围”；是“故意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扯在一起，企图用政治帽子压服对方”；是“全盘否定中国的历史”；如此“断章取义的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则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在不长的时间里，《文汇报》就收到这类来稿来信3000多件，足见此文民愤之大。当然，这些呼声在张、姚把持下难以和读者见面，可是江青却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说：“他们（指北京市委）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一口咬定“这是有组织、有步骤的阴谋”。结果激怒了毛泽东，让上海把这篇“奇文”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其实，千百万张《文汇报》已飞进北京千家万户，谁也没封锁它，只是谁也没有转载它，难道这就是“封锁”吗？

11月11日这天，彭真仍和往常一样，按时到北京市政府上班，到办公室后才听说这篇“奇文”。急忙找来报纸，看后非常气愤。如果说这是一篇学术讨论，全篇却是一副学阀、恶棍的嘴脸，毫无半点学术气味；如果说这是一篇政治批判文章，又是毫无根据的扣帽子。更使彭真气愤的是在历次政治局会议上从没提到过批判吴晗，今天发表此文对北京市委连个招呼也不打，纯粹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他知道这是江青搞的。

“叮铃……”《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来电话请示应如何对待此文。

“这样的文章我们不登，我们听政治局的，不是看哪个人的脸色行事！”

按照常规，转载这样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那才叫更不伦不类呢！

10天后，上海新华书店向北京发出征订通知。

彭真仍然是那句话：“我们听中央的，不跟着哪个地方跑。”一本也没订。

11月28日，也就是“奇文”发表后的18天，周恩来总理来电话了，要北京市研究转载此文。彭真请示总理本人有何看法。周恩来总理明确回答：“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这个决定。”

既然是决定还有什么好说的。11月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奉命分别转载了此文。《人民日报》转载在《学术研究》版。两报都在文前加了编者按，都强调了“百家争鸣”、“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两个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亲自定稿。

但是，与文化和学术界不太相关的《解放军报》在转载此文时，却在按语中独此一家和极其武断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一锤定音”定得不同凡响和大有来头。

事情出人意料，“好戏”刚刚开始，那些为吴晗遭此诬陷而抱不平的人，开始被江青以“争鸣”为幌子“引上地面”、“围而不歼”。后来成千上万人因《海瑞罢官》受到了残酷迫害。

1965年12月，北京和各地报纸陆续发表一些文章。这些善良的作者都是围绕学术进行讨论。吴晗认为党和人民还是相信自己的，于是在12月27日写出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首先表示对学术讨论和批评的欢迎，表示“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文中还列了个时间表，说明研究海瑞、写海瑞是1959年和1960年，而“单干风”、“翻案风”则是1961年的事，意思是研究海瑞，写海瑞并无影射之意，作者不可能去影射尚未发生的事情。又说明《海瑞罢官》的剧作是由写海瑞文章引起的，虽然演出于庐山会议之后，而开始写作却在会议之前。这种时序上的排列对历史学家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野心家们不仅没有丝毫“价值”，反而是攻击的缺口。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弄清是非而在于打倒某些人。果然，一篇“自我批评”引来了规模更大、调门儿更高的轰击，吴晗的“罪状”也从为“单干风”、“翻案风”摇旗呐喊，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上升成了“骂皇帝”。攻击的目标也扩大到了“三家村”，把与吴晗一起合写过杂文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放进一口“锅”里“煮”了起来。在此期间，那些以革命面貌出现的“风向专家”们，在江青的指挥下一窝蜂似的一个比一个嗓门儿大，一个比一个调门儿高，大有争夺“极左”冠军，不“左”到极端誓不罢休之势，直到《“五·一六”通知》把吴晗

正式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为什么揪住《海瑞罢官》不放?

《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京剧,不过是写海瑞铲除恶霸、平反冤案、将被霸占的田地归还农民的故事。在京剧舞台上这种除暴安良的戏不止一出,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也不止一个,为什么单单《海瑞罢官》如此十恶不赦?事情要从农业合作化说起。

1956、1957年成立了高级社以后,农业就存在一个如何发展、如何管理的问题。具体的说是"一大二公"还是"包产到户"的矛盾。有的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中,强行成立人民公社,实行大跃进,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农业生产规律。加之农村官僚主义和瞎指挥较严重,给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失误,又主观认定"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二者是不可调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导致了1959年的"反右倾"。不料1959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度荒成了首要问题,一度被否定了的"包产到户",又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管理形式,使农民积极性得到发挥。这些地方粮食收成较好,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此也采取支持态度,此即所谓1961年刮起的"单干风"。到了1962年经济困难初步克服,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单干风"被认定是关系到所有制的大是大非问题。"翻案风"则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向党反攻倒算,中央领导人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些"左"的做法,为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可乘之机。"阶级斗争"被人为地引伸到各个领域。此时正值《海瑞罢官》上演,江青就把此剧与"单干风"、"翻案风"硬扯到一起要进行批判。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批判《海》剧的意思。此

剧上演后不久，毛泽东曾把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家中便饭，并请他唱了剧中的唱段，边听边称赞："海瑞好"，"《海瑞罢官》也好"。所以这时江青想批却没批成。到了1964年，"阶级斗争"不断延伸，"左"的思想也日益泛滥，情况就变化了。

1964年农村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发起"革命"。这又成了野心家、阴谋家们的大好时机。

康生先在文化、知识界兴风作浪，策动了关于对李秀成的评价、合二而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有鬼无害论、道德继承论……等等批判，把学术问题都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围攻。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江青当然不甘落后。60年代初突然跑出来搞京剧改革，意欲借京剧舞台跳向政治舞台，并把批判《海瑞罢官》作为她的"试跳"。

当时京剧改革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以田汉为主的"新编历史剧"的改革方法。江青则认为只有"现代戏"才是京剧改革。这本来也只是写什么题材、演什么剧目更便于和利于改革京剧的方法问题，两种见解本可以讨论和并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江青，却把"新编历史剧"视为她的障碍，在戏改中开展什么"两条道路斗争"，作为她通向政治舞台的捷径，咬牙切齿地把阶级斗争延伸到戏剧舞台上。一方面组织"京剧现代戏会演"来展示现代戏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就是要把"新编历史剧"揪出来示众，请看那篇"奇文"之所以标题名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不叫"评《海瑞罢官》"，其意就在于此。另一出新编历史剧《谢瑶环》也被打翻在地。这次江青不仅亲自出马，而且是一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1962年要批的只是单干、翻案和清官，而这次把1961年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蒋介石反攻大陆"都扯在了一起。《海瑞罢官》不止是"内容反动"的"毒草"，而

是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行动了，吴晗也就不仅是“毒草的炮制者”，而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吴晗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在“文革”初期的各种文章、标语、大字报中，吴晗是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其实，他是个对党极其忠诚的共产党员，爱憎分明、坦荡无畏的民主斗士；工作勤奋、很有建树的副市长；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出语生动、文采飞扬的多产作家；立论准确、讲解精到的教授；性格爽朗、平易近人的社会活动家。在家里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也说过违心的话，作过一些违心的事，不过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又有几个人没说过违心话、作过违心事呢！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浙江义乌县吴店苦竹塘人。家庭是个日渐衰落的中小地主（在苦竹塘则算富户），父亲是个读书人。他6岁入小学，12岁入中学，25岁（1934）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先留校任教，28岁任昆明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后任西南联大教授。34岁（1943）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翌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八·一五”后复员回北平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通史》，39岁（1948）到解放区，40岁以解放军北平军管会副主任身份，接管清华大学并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同年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48岁（1957）加入中国共产党，60岁（1969）被迫害致死。一生著书和文集20余部，另有论文、杂文110多篇。人们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这就是吴晗一生的梗概。现在再撷取他生平若干片段以表其人。

“蛀书虫”和“太史公”

他从小爱读书，尤爱读历史小说，家里的书看完了就去借，有时跑几里、十几里去借书。借不走的就坐在人家门口看，有时十几里路借回一本书，沿途边走边看，到家了，书也看完了，转身再往回送。小小年纪就成了苦竹塘内外闻名的“蛀书虫”。

一条小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行李，活像随公子进京赶考的书童，只不过挑担子的不是书童是吴晗。足蹬家做布鞋，上穿对襟小褂，长衫搭在担上，颤颤悠悠走进清华园，这与以“洋”、“贵”为特点的清华大学，显得不大协调。吴晗从苦竹塘带出来的这条小扁担，一直保存在身边，直到“文革”抄家才不知去向。

吴晗最初进的不是清华。当时北平三所一流大学——清华、燕京和北大，有个同样的规定：凡考生有一门为零即不录取。而吴晗先考北大，数学为零，落榜；又考燕京，数学仍为零；再考清华，数学还是零。但清华主考者慧眼识才，鉴于他文史成绩格外优秀，就打破成规，破格录取了他，并且插班进了二年级。清华此举震动了燕京、北大。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法学院长周炳琳，深感原规定不妥拟议修改，而燕京的文科教授洪煨莲、顾颉刚则找到吴晗，希望他回燕京就读。破格录取一个土学生怎么会引起如此震动呢？其中事出有因。

吴晗读中学时因家道中衰，16岁就在村里当小学教员自立并养家，但求学之心仍很强烈。想投考不交学费的黄埔军校，卧病的父亲不同意；想考普通学校，家里又没钱。后来母亲变卖了仅有的陪嫁首饰，使他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又去了上海中国公学。除偶尔得到朋友接济，全靠写稿挣钱上学。在中国公学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很受胡适赏识，得稿费80元，就以此为盘缠来北平考北大，没考上。胡适拜托顾颉刚为他在燕京图

书馆暂谋一工作。在燕京图书馆时，吴晗不失时机地完成了一份《胡应麟年谱》，其中纠正了顾颉刚的某项考证错误，也证实了胡适对此的假定。此文一出颇受学者们重视，这才使清华于次年破格录取了他。

然而吴晗虽被录取却不敢入学，他的经济力量无法支撑他走进这座学府。胡适又托清华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又为吴晗在清华谋一工读生的位子，并把《胡应麟年谱》送来证明其才华。这样吴晗在清华图书馆每天两小时整理清室大内档案，月薪25元。当时的生活水平是一人一个月有四五元钱就能保持中等平民生活。这一来在校的学、杂、膳费一应解决。吴晗与胡适的关系也就是由此而来。

吴晗当年每天除去两小时工作之外，全部生活只有一个"学"字，三年里不知娱乐为何物，笔记、杂记、卡片箱……须臾不离身。学有心得就撰稿成文，入学一年就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燕京学报》发表文章近20篇。第二年就被聘为《清华周报》文史部主任，写出了一批有史有据有创见的重要文章。第三年又受请于郑振铎，与巴金、冰心、朱自清等名流作家在《文学季刊》共事，又写出了纠正某些错误记载的学术论文。



吴　晗

这个没毕业就已小有名气的大学生，当时就被人们称为"太史公"。可是也有人叫他为"腐儒"，因为他穿得土里土气，终日神情专注，一副近视眼镜不时滑到鼻尖上，很像乡下土学究。

"难为斗米折腰"

抗日战争时吴晗在昆明任教。由于物价飞涨，人不敷出，由开始时租住的小楼，搬到一座破木楼中。这座新居从瓦缝间望得见天空，楼上的灰尘能掉进楼下的饭碗里。全家已不知肉味，只能在星期天买点牛骨头回来炖汤"享受"一番。母亲为了不挤在一起挨饿，已带女儿返回老家。夫人袁震长年有病，又患了子宫出血，吴晗把自己的血输给她。没有医药费，学生们要为他发起募捐，吴晗谢绝，卖掉了一批珍藏的书。为此，蔡希陶（就是在"海瑞"后面加上"罢官"二字的植物学家）书赠吴晗对联一幅："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辛酸，谐谑，愤怒不平，尽在其中！吴晗只能以写稿弥补日用。但是卖稿也不那么容易。

中央编译馆的编辑，挟着吴晗写的《明史》稿走进吴家。

"吴先生，您的《明史》考据精到，独有创见，主编决定出版。只是有一个字请吴先生斟酌一下，"编辑笑容可掬地接着说道，"书中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一段，有'红军之起'一句，是否可把'红'字改为'民'字，以下照改。"

一向虚心的吴晗愕然了："这是不是说把'红军'一律改为'民军'？"

"一字之差，一字之差。"编辑迂回地肯定着。

"这可不是一字之差，原因有二：当时农民起义以红巾裹头，红旗为号，故名红军，并非指今日共产党的红军；二、当时也确有'民军'一词，但那是专门镇压起义农民的地主武装，二者不能混淆。这是历史，并非我吴晗杜撰，也不是谁可以随意改变的。"

编辑还想劝说，吴晗却说："这样吧！请贵主编去和朱元璋商量，他同意，我照改不误。"

话已至此，编辑只好掏出支票放在桌上，说明只要改了这个

字，稿费从优，说着把支票推向吴晗。

吴晗不等对方说完即把支票推回："我也只好请贵馆原谅，吴某难为斗米折腰，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的稿费鄙人不敢领受。"

书稿留下来，支票带走了。吴晗呢？只好再翻箱倒柜寻找可以典当换钱的东西。

他愤怒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被困，急待搬往大后方，行政院长孔祥熙却强占飞机抢运家私和洋狗。

吴晗在课堂上愤然谴责："昔日南宋亡国之前有个蟋蟀宰相，今日抗战之中又出了个飞狗院长。"

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吴晗目睹了种种黑暗景象。"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让他困惑，让他愤怒，他开始抨击现实了："这叫什么抗战？官僚中饱肥私，奸商囤积居奇，而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保卫国土失去双腿的士兵竟落得沿街乞讨，那么他撇下的妻儿老小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吴晗愤怒地在课堂上引晚唐诗人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痛斥偏安一隅，卖官鬻爵，横征暴敛，让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让百姓辗转反侧于刀枪之下的反动统治者。他说："想想三百年前的弘光小朝庭，一千年前晚唐的腐朽衰败和一千三百年前陈后主的亡国，再看看今天的抗战大后方有什么两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

吴晗那句名言"历史是一面镜子"就是那时产生的。

有学生问：难道历史的教训总要如此周而复始的重演下去吧？吴晗沉默后沉痛地答道：

"问的好！同学们，我不懂政治，只是稍通历史，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史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华民国，不仅是一次次重复着民族的悲剧，而在近百年来又一次次蒙受着民族的耻辱。几千

年来民众只有一个愿望，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为什么这个起码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呢？几千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又为什么直到号称‘民国’的今天，仍是如此渺茫呢？我只能惭愧的告诉大家，我也没有弄明白。”

吴晗的历史研究也就从这时起与现实结合起来。

昆明的“吴晗诺夫”

1943年国民党声称“准备实行宪政”，各地民主人士召开了一系列的宪政促进会。张奚若等教授也在昆明发动了一个宪政促进运动。但由于缺乏组织，活动处于分散状态。周恩来、董必武及时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到昆明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开展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李文宜是袁震堂姐袁溥之的同学。当吴晗从李文宜处了解民盟是爱国民主党派，反蒋抗日，成员中又有许多名教授，便欣然参加，并被选为民盟昆明支部青年部长。

吴晗本身是名教授，在知识分子中有信誉，在青年学生中有威望，在中共与昆明民主运动的联系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本人由于有了党的指导，认识逐步提高。特别是他和袁震到重庆拜访了董必武以后，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了进一步了解，认识上产生飞跃：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使他充满力量，开始向旧制度投枪了。后来1959年，他把从1943年到1948年写的几十篇杂文汇编成集，取名就叫《投枪集》，前言中说自己“只有一枝笔，真刀真枪比不上，比他一杆木头枪吧！木头枪伤不了人，不能说放……投它一下如何，管他三七二十一，要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

这一时期的吴晗，一是撰文著书和演说，以古讽今，旁敲侧击地把矛头直指反动当局；二是积极协助党的昆明组织民主青

年同盟(简称“民青”),筹建地下印刷厂,创办《时代评论》等等,他已成为人民敬仰,敌人痛恨的民主斗士。

每有集会,他都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八年来内部腐烂的结果,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危机,保证抗战胜利唯一的方法还是民主政治。”揭露黑暗,谴责独裁,召唤民主,呼号救国是他这一时期一切言论的中心。“八·一五”胜利后则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直到1945年震惊世界的“一二·一”惨案,他一直和闻一多、李公朴并肩走在前列,特务机关则把他们诬蔑为“领取了卢布的吴晗诺夫、闻一多夫”。黑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如果不是因为正巧送袁震赴上海治病,继李、闻被刺之后,第三个就将是他——“吴晗诺夫”。谁知他从敌人枪下逃生了,最后却死在……

最后的路程

1966年5月16日至1969年10月10日,是吴晗最后的一段人生历程。这三年四个月零四天,吴晗是在无休止的挂牌子、“喷气式”、谩骂污辱、拳打脚踢的批斗中捱过的,是在“审讯逼供”和“交代认罪”的车轮战中结束的。

他的夫人袁震比他提前半年从苦难中超脱,可是他的女儿吴小彦一直熬到距离粉碎“四人帮”还只剩13天时,再熬不过去而含冤死去!

1976年10月,是人们永不会忘的月份。就在全国人民举杯砸蟹,普天同庆的时候,一个19岁的青年,把载有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报纸焚化成灰,放进酒杯点燃,告慰三位亲人的在天之灵。这个青年就是吴晗的小儿子,吴家唯一的幸存者吴彰。此时吴晗离世已近六年。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尚未公布时,吴晗在周恩来授意

北京市委、由副市长万里具体安排下，去北京昌平县参加“四清”。他化名李明光，由吴的秘书郭星华陪同，来到大东流村。这时高音喇叭里终日响着“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棵藤上仨毒瓜”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喊声。村里的人只知吴晗是市里来参加“四清”的干部老李，每逢开大批判会，总把吴晗请到主席台上一起喊“打倒吴晗”。这段时间对吴晗来讲，仍不失为“‘市’外桃园”。可惜好景不长，《“五·一六”通知》一下，郭星华突然找不见吴晗了，打电话向市政府询问，市府业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连彭真也在批斗会上低头弯腰呢，还有谁管这些事！

吴晗被一辆吉普车拉走，到北京师范学院去挨斗了。

北京师范学院，是50年代吴晗一手操办起来的。他决不会想到正是从这里开始对他的第一场批斗。

北平刚刚解放时，全市是个大烂摊子，最烂的一摊就是学校。北京市委、市政府拟定了改善教育的计划并逐步实施。这一重任自然由文教副市长为主承担。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吴晗就像当年挑着扁担进北平那样，终于将北京师范学院创办起来。他还担任历史系的名誉教授，不断到学校来讲课或作报告。他又跑遍西山八大处，利用第六处香界寺创办了教师休养所。另外，教师进修学院、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少年宫、北海少年科技馆的小水电站、工读学校等等，都由他亲自跑、实地看，因陋就简创办成了。若干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对他的第一场批斗中，这一切都成了“罪行”，从而开始了越批越烈、越斗越凶的折磨和摧残！

北京的七、八月，是烈日当空、柏油路面晒化的气候，红卫兵们在晒化的路面铺上七楞八角的砂石，不久砂石也烤得滚烫。人们把吴晗按跪在砂石上，上烤下烫地“交代罪行”。动辄被拳

打脚踢、皮带抽打，抓起滚烫的砂子往衣领里灌……头打破了，膝盖出血了，人昏过去了！

但是，这样的批斗整不出江青一伙所需要的“材料”。他们需要从吴晗身上挖出纵深射击的“炮弹”。吴晗一家又被赶出寓所，把他送进市委党校内的“学习班”。

专案组对他“帮助”了几个月仍然没有挖出需要的材料，又在1968年3月把他投入监狱。

这天夜里吴晗被叫醒。由于夜间被揪去批斗的事经常有，吴晗起身就去摘挂在墙上的牌子——挨斗的必有的道具。

“不用那个！”吴晗被喝住，又被推出房门，戴上手铐，一块黑布蒙上眼睛，推上吉普车，进了秦城监狱。

“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吴晗大声吼了起来。

“这里不许问为什么！”背后一拳将吴晗打进牢房。

谁知吴晗入狱一年，竟罗织不到一条可以作为逮捕理由的罪状。这不能不使江青一伙感到头痛。正巧“军师”来也。1969年3月7日，康生在一份揭发材料中看到：“吴晗是1934年上海社联的吴小甫，是党员，以后不知去向。因此怀疑吴晗是叛徒。”材料来源据说是湖北某人。康生不仅立即派人外调取证，又在路过武汉时亲自去要“吴晗的一段材料”。可是事与愿违，材料证明：吴小甫本人还活着，过去也没加入共产党，不是党员何谈叛变？另外，从1930年到1937年，吴晗一直在清华大学读书和任教，既没有再去过上海，更不是什么“社联”。吴晗、吴小甫同时都活在中国大地上，根本不是什么叛徒，好容易捞到的一根稻草又没了。足智多谋的康生又大笔一挥：“我记得吴晗不是叛徒，也是特务！”

原来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苏联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通过地下党向吴晗了解过当时北平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情况。

吴晗又经常担负往解放区输送知识分子的工作。解放后的中苏友好期间，苏联大使馆曾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在解放战争中曾经帮助我们工作的人名录》，其中就有吴晗。康生就是根据这份人名录，判定吴晗是"苏修特务"。

吴晗被投人监狱一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的4月，袁震也被关进"学习班"，想以"双管齐下"的方法来罗织吴晗的罪名。袁震一进"学习班"就被关在一间废弃的厕所里。她是一个病了30年的危重病号，夏天都脱不掉棉衣，睡在水泥地上不久，两条腿就瘫了。

袁震被关起来，家里就剩下14岁的吴小彦和10岁的弟弟吴彰，姐弟二人相依为命，企盼着爸、妈归来。他们原是吴晗的养子养女，50年代时康克清见袁震不能生育，先后帮她抱养了小彦和吴彰。吴晗非常喜爱孩子。加之小彦聪明懂事，吴晗视如掌上明珠，经常把小彦驮在脖子上在庭院跑来跑去。抱来吴彰以后，吴晗更是乐得合不上嘴："我这是一儿一女一支花呀！"

吴小彦是个个性鲜明的姑娘，在吴晗挨斗的日子里，她曾有两次惊人之举。

1967年4月某夜，一群红卫兵冲进吴家抓住吴晗就打，睡梦中的吴小彦听见爸爸挨打，跳出被窝，光着脚冲到跪在地上挨打的吴晗身边，用身体护住爸爸，大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迫使其中还有人性者向小彦保证："把你爸带走批判，不再打他。"斗完放回来后，吴晗搂着女儿道："彦儿！爸没挨打，亏了我女儿。"

又一次是当年一个白天，红卫后又砸开了门。小彦躲到了海棠树上，当人们对吴晗又连打带骂的时候，小彦气得两眼冒火，"蹭"地由树上跳下来，朝一个正在踢吴晗的人的小腿猛踢一脚，怒斥对方："回家打你爸去！"当时她才只有13岁，一群比她

高出半身的人被镇住了。就是她，在被抄家赶出寓所以后，就挑起了照顾有病的妈妈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的担子。病重的袁震实在不忍心让两个孩子跟着他们受罪，把小彦小彰叫到床前，告诉他们不是自己生的，是抱来的，让他们到派出所去改回原姓名并迁出吴家。小彦一听，瞪着妈妈，脸色变青了，像炸药爆炸般吼道："你骗人！"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我的病不能生孩子你是知道的呀！"袁震哀求心爱的女儿相信自己。

"不！抱来的也是亲生的！"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扑进妈妈的怀里，母亲也把儿、女紧紧搂在怀里，三个非血缘的骨肉亲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小彦14岁就带着11岁的弟弟，过着人所共知的"狗崽子"生活！

年月再不好，总也有好人；江青一伙再疯狂，也无法将8亿人都拴在她的裤腰带上。小彦得到好人帮助见到了妈妈，妈妈的腿瘫了，她又买来针灸的书，照着书在自己腿上扎。每天往返30里路去护理袁震，一来二去竟然把妈妈的腿扎好了。奇迹吗？感天动地了吗？回答不出，只是袁震流着泪，抚摸着女儿那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小腿："不是女儿的医术高，是女儿的心诚！"

周恩来总理得知了吴晗、袁震的消息，坚决让江青一伙允许他们夫妇治病，可是只放了袁震一人。

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高兴兴接妈妈回来。当晚，万里听说袁震放出来了，悄悄送来一锅红豆粥。不料，袁震又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大声喘着气。小彦连夜背起妈妈就去医院。袁震的个子比较高，小彦没那么大力气，小彰在身后托着，踉踉跄跄地冲进医院。到了医院却没人管，因为她是

吴晗的"老婆"。小彦求他们,小彰求他们,勉强答应抢救,却又不给必要的药。拖到凌晨,袁震从昏迷中睁开眼睛望着一儿一女,止不住泪如雨下。女儿问妈妈想不想吃点什么,妈妈说:"就想喝点稀饭!"女儿忙去找,儿子也去找,到哪去找呀!妈妈至死没有闭上含泪的双眼!

3月18日清晨,袁震被推进太平间,姐弟二人带着哭得红肿的眼睛去照了一张像,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吴晗在狱里也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叛徒不能成立,就逼吴晗承认特务。审讯在加紧,吴晗在吐血,大口的喷血。他望着喷在牢房墙上变成黑色的鲜血,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逼自己。专案组的人唯恐吴晗死去,只好把他送进阜外医院抢救,因为吴晗的生死,反而能决定他们的命运与"前途"了。吴晗躺在病床上大概已经明白自己必死无疑,也反而平静下来一语不发了。

吊针在输液,审讯在突击。几个人围着吴晗喊叫,吴晗静静地望着天花板。他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也许是他看到袁震领着小彦、小彰向他走来?也许是想起李公朴、闻一多?也许是在讥笑床边的几个人?讥笑他们:"你们喊什么,怕我死吗?你们不是一心要置我于死地吗?我怀着美好的理想死去,你们留着丑恶的灵魂活着。喊什么!……"终于默默地停止了呼吸。这天是1969年10月10日。

吴晗、袁震就这样"走"了。可是身后还留下了小彦和小彰。

又是这位小姑娘,她不服,她要弄明白。她到处上访求告,几乎跑遍了北京的有关单位。万里为她安排了一个工作,她供着弟弟上学。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复出,上访办的态度有了变化,但也只能嘱咐她"要有耐心"。刚刚看到一点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她陷入无望的深渊。周总理去世了,她痛哭,她

觉得再也没有希望把爸、妈的事情弄清。弟弟已经19岁，长成了比自己还高的小伙了，能自立了。她感到无比疲倦，难以承受无尽的磨难，再也无力挣扎，她终究只有一副稚嫩的肩膀呵！望着父母的遗像，一心想再去享受父母的爱，她服毒了，她去和父母团聚了！可是，活着的人该多么遗憾，1976年9月23日她死去了，距离粉碎"四人帮"只差13天，如果再稍稍坚持一下，就能享受到今天的阳光……

（宋　严）

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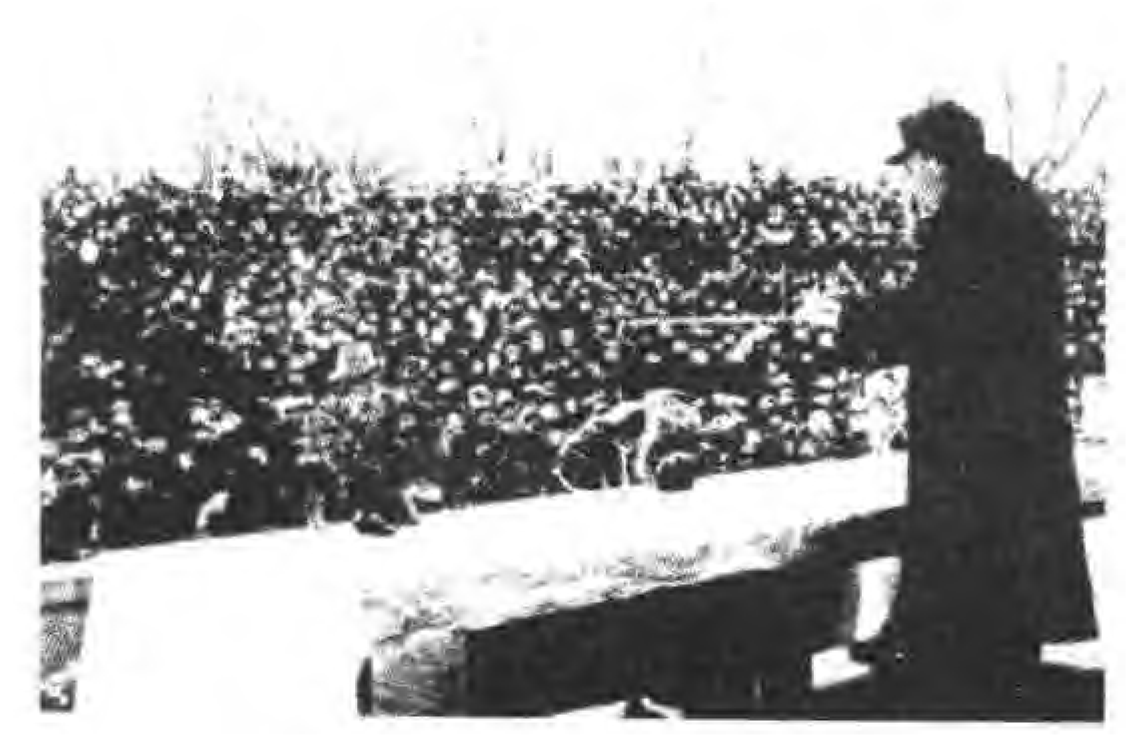
林彪对罗瑞卿的"迂回包抄"

1965年初，患晚期肝癌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春节过后，林彪夫妇也来到上海休养，并常到医院找刘亚楼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脏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后来，罗瑞卿回忆一次同林彪的谈话时，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比武，肯定了要用罗瑞卿；又说1961年冲罗瑞卿发脾气不过是一场误会，如此等等。对于林彪这番话，罗瑞卿很难表示赞同，因此听完没有表态。显然，罗瑞卿这种表现进一步引起了林彪的忌恨。

1965年4月3日，罗瑞卿应解放军某部邀请，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什么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的讲话。讲话在对突出政治作了具体解释后指出："怎样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对于任何事物、任何一种思想，要正确地认识，全面深刻地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后来，在整罗瑞卿时，这个讲话也成为"罪话"之一。

当罗瑞卿仍在外地时，听到总政反映，有许多单位建议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印成大张，张贴到连队。林彪已同意。罗瑞卿考虑再三，感到这个“指示”第一段提到叶群的名字不妥。因为叶群只不过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军内并无重要职务，不宜过分突出。林彪知道后很不高兴，决定不印大张了。罗瑞卿得知这一消息，连忙表示：“那就照原样，不改。”林的答复是：“不改也不印了。”罗瑞卿知道此事又引起了林彪不满。



公安部长罗瑞卿作镇压反革命的动员报告

5月2日，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到达上海。罗瑞卿立即到林彪处，林彪让罗瑞卿坐下后，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说完后，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有关加强请示报告的章节，接着又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章节，并提出加强通气的五条规定。林彪的口气比较缓和，但气氛十分森严，罗瑞卿在沙发上如坐针毡预感到林彪还

会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

1965年，《解放军报》社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见过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或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都不好，于是便到另一个房间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同时也由于他尚未开始同林彪勾结，于是表示：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6月29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写上了"最高最活"。罗瑞卿又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很深的田家英，回来后对大家传达田家英的话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

由于罗瑞卿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见，"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而在用这一条整罗瑞卿时，康生保持

着深不可测的沉默，田家英已含冤去世。

1965年8月，罗瑞卿到大连去了一趟后，却认为林彪对他还算好。他回到北京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包括精心修改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文章修改好后，罗瑞卿将其分送给中央常委审阅。周恩来对此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对原稿中“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仇恨搞得深深的”进行了修改，使文字更加简炼、明确。罗瑞卿对周恩来说：“这几句是用的林副主席的原话。”周恩来立即说：“既然是他的原话，那就再改回来。”

正当罗瑞卿在北京字斟句酌地为林彪精心修改文章的时候，林彪对罗瑞卿又采取了新的步骤。为了稳住罗瑞卿，一面由叶群通过打电话对罗瑞卿嘘寒问暖，一面在一些单位设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等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这一手段加紧了对一些人的拉拢，经营自己的山头。同时，就整罗瑞卿问题进行个别谈心、交底。而罗瑞卿仍然蒙在鼓里。

10月25日，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一份材料，前面有一封信，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

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8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叵测的人……

在林彪、叶群授意下，×××把他自己说成是对罗瑞卿观察了6年，早就并独立发现了罗瑞卿问题的人。

然而，就在10月初，×××写这份材料以前不到1个月，林彪已经发话了："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的反对我了。"对比林彪所言可以看出，×××总比林彪晚半拍。这只能说明，没有林彪、叶群打招呼，×××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发现"。

这一年5月11日已以罗瑞卿署名发了一篇文章，而在9月3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后，紧接着又于4日全文发表了罗瑞卿在首都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大会上所作题为《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稿。2∶1，这显然已引起了林彪的不快，然而林彪又不便因此而发作，因为发表文章、讲话都是中央决定的，并非罗瑞卿个人的主张。拿这件事指责罗瑞卿，罗瑞卿只要稍作解释便会不攻自破。就在这个时候，×××送来了这个报告，说由三

座门编写组拟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稿的水平高于钓鱼台稿，乃至只要把三座门稿中未用到林彪文章中的下脚料往罗瑞卿的讲稿中一加，便会立刻使罗的讲话水平超过林彪的文章。罗瑞卿所以主张用钓鱼台的稿子，目的就是要把水平高于钓鱼台稿的三座门稿保留起来，据为己有，以便超过林彪。为了阻止罗的“阴谋”，×××便决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讲演稿中去”。显然，×××这样说并非真的要这么做，而只是向林彪表明一种姿态。

罗瑞卿同毛泽东、林彪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5年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这时，上海报纸正围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展开热烈的争论。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来一本刊登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

11月26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接见了柬埔寨副首相朗诺。这是罗瑞卿在“文革”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在朗诺来到之前，罗瑞卿对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来了一本，还没有来得及看。毛泽东一笑，未说什么。

接见朗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汇报完后，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周恩来也要求罗瑞卿把他向主席的汇报向林彪报告一下。当罗瑞卿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习惯

性的朝他挥了挥手。罗瑞卿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罗瑞卿一到苏州便向林彪报到。林彪秘书马上回电话说，林总要你马上就来。

罗瑞卿到林彪的住处，一进门秘书就告诉他，林彪还未吃午饭。罗瑞卿点点头，便来到林彪的会客室。林彪见到他照例握手、让座，又拿出糖盒请罗瑞卿吃糖。叶群未露面，而在附近一间屋子里偷听。罗瑞卿知道林彪尚未吃饭，谈话中几次声明，明天还可以留一天，再谈一次。林彪要求他一次谈完。罗瑞卿说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了在两广看地形及沿途部队情况，以及北京批判萧向荣的情况。罗瑞卿认为萧向荣的问题看得过重，林彪未置可否。罗瑞卿在汇报中还谈到最近空军一飞行员驾机投敌的事，并对林彪说："听说吴法宪为这件事急得满脸大汗。"林彪立即点点头说："这个人就是责任心强。"林彪接着又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当时林彪自己也决不会料到，不到6年后，他这个革命不离口的人竟然同叶群、林立果等人一道，也乘飞机叛逃了。

罗瑞卿汇报完后，问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林彪说："没有了，谈完了。"罗瑞卿站起身要走，林彪又问罗瑞卿身体如何，罗瑞卿回答："还好，只是最近牙经常疼。"林彪说："牙疼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就是林彪最后一次见罗瑞卿的临别赠言。

叶群杭州之行和上海会议

罗瑞卿以为这次同林彪谈得很好，然而这只是一个错觉。林彪夫妇在给罗瑞卿以平安无事的错觉后便要开始动手了。但

总攻击却迟迟未发起，原因是因为林彪尚未准备好，还缺乏过硬的致罗瑞卿于死地的材料。罗瑞卿这次苏州之行促使林彪把发动总攻的时间提前。他知道罗瑞卿刚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怕夜长梦多，于是，也不管材料是否够用，决定立即发起总攻。

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　彪

11 月 30 日

这封信从头到尾一个字没有提到罗瑞卿的“罪行”，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写上。但是，随信附去的 11 份材料，除 1 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11 月 30 日，叶群携带着这一批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由于这一汇报只有毛泽东和叶群两人在场，其内容已无从知晓。

叶群汇报完后，毛泽东收下了她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进行了批复，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毛泽东信中指的"人们"，既包括了罗瑞卿，又不仅仅指罗瑞卿。这说明林彪的状告准了。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

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批准林彪夫妇的告状？后来，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英明领袖。罗瑞卿又是他非常信任也非常熟悉的干部。罗瑞卿对毛泽东可以说是一片赤诚，忠心耿耿。叶群一番话再加上十几份材料为什么就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了他几十年对罗瑞卿的认识？现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限的材料，对此作一些粗线的分析和推测。

当时，由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主观主义的"左"的错误日益严重，他和处于中央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日益加剧。至于罗瑞卿虽然也在第一线，但由于他在军队工作，不似其他处理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那样同毛泽东有那么多分歧，他仍然绝对信赖毛泽东。对他来说，不存在对毛泽东的指示有任何抵制的现象。因此，到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还对林彪说："罗瑞卿反

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毛泽东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误认为是保卫马列主义纯洁性,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和分歧误认为是路线斗争,并担心苏联赫鲁晓夫事件在中国重演,因此他对党中央第一线的一些干部已不再信任。认为已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企图依靠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防修反修的问题,并更换接班人。他认为林彪是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发动"文革"角度还是从选定接班人角度看,毛泽东都需要林彪也信任林彪。可是林彪却在这时告了罗瑞卿的恶状,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厉指责,说罗瑞卿伸手要夺权。如果对林彪告状不予认可,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他只有相信林彪的指责,罗瑞卿便被推上了被告席。

上海会议于12月8日在上海召开,即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有许多不正常之处: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作了3次共约10小时的发言,内容可能也是她在杭州向毛泽东所告罗瑞卿的"御状"的一部分。现还存有记录,摘要如下:

过去(我)对罗是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和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不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叶群这个讲话充满了谎言,但这"四怕"中的第二怕是真话。从林彪送给毛泽东的11份材料看,用以打倒罗瑞卿确实"不够"、"不过硬",需要叶群在这一讲话中来编造。

叶群在叙述了5月间林彪不让罗瑞卿作总结发言后说：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帽子有了，证据呢？叶群在喋喋不休地叙述了林彪对罗瑞卿几次发脾气的过程后说：

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待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望林多活20年，因有点马列主义。

这是借揭发罗瑞卿来抬高林彪。叶群接着说：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叶群这一讲话中最耸人听闻的是下一段：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的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一会儿是上台，一会儿又是下台，这反映了叶群当时的心态。既要告罗瑞卿逼林彪下台，又要给林彪上台造舆论，因此说起来便忽上忽下，语无伦次。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我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唉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

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

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叶群的指责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然而，这全部是凭空捏造的。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朱德在参加上海会议后，心情十分沉重。康克清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显然还需要听听被告说一些什么。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

就在叶群鼓其如簧之舌，对罗瑞卿进行造谣之时，罗瑞卿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

又过了一两天，罗瑞卿便听到中央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他打电话问在北京的彭真。彭真也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只听说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会，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罗瑞卿听后仍然没有想到会是自己。随后，周恩来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在11号赶到上海开会，内容电话上不好讲。

12月11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赴上海。周恩来讲了此次会议的内容，随后便转述了叶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瑞卿所作的指责。周恩来也传达了毛泽东所说，"反对林，还有没有反对我"的话。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即：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

听了周恩来、邓小平所传达的内容,对毫无精神准备的罗瑞卿来说,不啻是一个睛天霹雳。林彪的指责犹如狂风骤雨,一阵阵无情地抽打着他。他立即起而争辩。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而林彪所说的那些材料不是已被歪曲得与事实面目全非,就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罗瑞卿感到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解释、争辩。他激动地说:“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罗瑞卿要求面见林彪或同林彪通电话,当面说清林彪对他的指责。周恩来立即很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幼稚?”听周恩来这样讲,罗瑞卿稍稍冷静了一点。他开始明白,林彪既然已经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这已经不是可以当面对质能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看到罗瑞卿不说话了,便劝他冷静,不要激动。他要求罗瑞卿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他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他还说:“我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这种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又找郝治平,也劝她冷静,不要激动,并要求她多劝劝罗瑞卿,冷静对待。

谈话结束,周恩来、邓小平离去。罗瑞卿送他们上车,等车走远才回屋。罗瑞卿要上楼,守候在楼梯附近的上海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去扶他,罗瑞卿摆摆手,拒绝了。但他自己却怎么也没有力气上楼。此时赶到楼下的郝治平走上一步,搀扶着罗瑞卿进入二楼的房间。郝治平已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两人坐下,停了好一会儿,郝治平问罗瑞卿:

“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罗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

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罗瑞卿越说越激动，止不住流了泪。郝治平看到罗瑞卿那痛苦的样子，也不禁痛哭起来。

后来，罗瑞卿在狱中痛定思痛时写道：当时，“我实在感到对我很异样。不让我见主席，不让我见到林副主席，不让我参加会，不让我外出……我想，对彭、黄，当时在庐山，也没有这样呀！所以怎样也控制不住自己。”

在这一连串的“不让”之中，罗瑞卿感到最伤感的莫过于不让见毛泽东。

罗瑞卿自从参加革命以来，还没经历过这样的事，而此时“文革”的风暴尚在酝酿之中，罗瑞卿是头一批挨整者之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仍属屈指可数，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对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对于挨整，明显地缺乏承受能力。

叶群伙同吴法宪制造伪证

在上海会议开始“背靠背”揭发罗瑞卿以来，发言的内容大量的是这种会议必不可少的表态。也有些人揭发了罗瑞卿工作作风中的问题，主要是说他揽事太多，锋芒太露，得罪了一些人。对于这些意见，罗瑞卿都接受了下来。但是，无论是揽事多、露锋芒还是得罪人，都不能置罗瑞卿于死地。因此，叶群抛出了所谓刘亚楼的四条和所谓逼林彪让贤这两枚重磅炸弹。然而，前者是死无对证，后者是无可对证，现在罗瑞卿又不承认。于是，毛泽东决定休会。16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讲话，连罗瑞卿的名字也未提，说了一句“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则宣布散会。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们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

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罗瑞卿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曾回忆道：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她)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

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在这五内俱焚的悲愤心情中，罗瑞卿继续就三个问题向中央申诉。在这一年年底，他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

中央常委的信中写道：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待。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拨)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说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果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我才听说。

对叶群“揭发”的这两条，罗瑞卿最为愤慨。他写道：入党三十多年，大小错误犯过很多，还没犯过什么伸手的错误。多么重，多么委曲的罪名啊！至于说我气焰很凶，大有逼他之势，这简直不可想象！

把罗瑞卿“挂起来”，罗瑞卿不满意，林彪、叶群也不满意。

林彪、叶群要的是把罗瑞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此，他们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制造伪证。谁来干？他们选中了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当过刘亚楼的政委，而且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也在他管辖之下，制造假证要方便一些。而当时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也正是做假证的合适人选。

经过下了两场“毛毛雨”之后，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叶群向吴法宪摊牌。她把脸一抹，很严厉地对吴说：“刘亚楼和你同罗长子的关系都很密切。今后有两条路，是靠林总还是靠罗长子，你可以选择。”吴法宪吓得连忙站起身，连连点头哈腰地说：“我当然靠林副主席，请观后效，请观后效。”

开上海会议时，叶群曾让吴法宪在小组会上发言，然而，吴法宪除了重复罗瑞卿去苏州看林彪是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搞折衷主义；不抓“四个第一”，到处提倡比武，军训搞花架子外，没有什么新鲜玩艺。

上海会议快结束时，叶群又找吴法宪，要他为她所编造的刘亚楼的四条找旁证。叶群要求吴法宪用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作突破口，逼迫翟云英作证。吴法宪一回北京立即去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亚楼临死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回答从未听说过。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又来了，采取迂回战术，问翟云英：“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喜欢用手势吗？”翟云英回答：“他讲话确实常用手势。”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他那4个短而粗的手指说：“他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点点头：“我没有注意。”吴法宪又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如此反反复复，一点儿一点儿地磨。最后，吴法宪让翟云英写材料，被拒绝。吴法宪磨几次无效，便说：“你身体不好，我去请别人写，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于是吴法宪又去找秘书，

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材料，叫翟云英签名。材料写道：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饭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翟云英一看，这样写有些穿凿附会，拒绝签字。吴法宪又怏怏而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央求翟云英道："今天是叶主任(指叶群)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帐。"翟云英不签，吴法宪就磨。已经折腾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再看看那材料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便签了一个名。此时，她对上海会议整罗瑞卿一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吴法宪所提"四点"是怎么一回事。

吴法宪于12月21日把由他授意，由他的秘书执笔写成，通过欺诈手段骗得翟云英签名的材料呈送给林彪，但并未得到林彪、叶群的青睐。因为，这份材料空空洞洞，起不到给叶群制造的谣言作假证的作用。于是，吴法宪只得给不听招呼的翟云英记上一笔帐，同时亲自出马作假证。12月25日，他打小报告给林彪，全文如下：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

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需要经常向林彪同志请示,也不要到处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谈来编去,仍然是死无对证。1965年4月,罗瑞卿确实给刘亚楼有一封信,我们现在已无从知其内容,但刘亚楼的回信仍在,并已作为11份材料中的一份由叶群呈送给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印发了。现将刘亚楼的复信抄录如下:

总长:

4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以后,使我既感动,

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刘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了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收，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 4月15日

林彪、叶群所以要将这一封信作为罗瑞卿的“罪证”，是因为他们拿不出所谓刘亚楼讲的四条的证据，只好拿这封信充数，用以说明，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而罗瑞卿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然而，这完全是罗织罪名。现在，我们虽然无从看到罗瑞卿的原信，但从刘亚楼的这封复信可以看出，罗瑞卿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刘亚楼配合治疗，安心养病，不要灰心。从刘亚楼的复信看，他对罗瑞卿的关怀表示了感激之情。他的情绪是较激动，而这对于一位已患了晚期肝癌的病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信中根本没有所谓受了侮辱的意思。

对此，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后，于狱中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已经给予痛斥。他愤慨地写道：

……至于说我四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吴还说：刘接我信后不久就死了，好像刘是因我的信致死的，这完全是恶意攻击和加罪。刘因何致死？这有科学作证。我还是要请问吴，刘为什么不留一个文字证据呢？刘同我有勾结，有阴谋，又被林彪教育觉悟了，我去“摧命”，又那样痛恨我，这当然会更促使他揭发我，为什么还是没有留下揭发的证据？要知道，刘那时还是完全清醒的，写下一个揭发我的证据是完全可能的呀！就算他已经不能写了，为什么不请你吴法宪或者叶群或者×××代写一个，他签一个名呢？就算刘亚楼没有想到这样，你们吹捧的“英明”“伟大”的林彪，为什么也没有想到呢？

从京西会议到“三·一八”

上海会议开过之后，在军队总部机关和军以上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罗瑞卿的集中揭发。吴法宪制造伪证说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是这次揭发高潮中的重点和核心。此外，揭发材料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一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为了说明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林彪、叶群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

“三稿对照”所以不把林彪原来的指示原封不动地作为“第一次稿”，是因为这个指示原文逻辑混乱，语病很多。一点不动，拿不出手。因此对于罗瑞卿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仍然保留若干。



林彪及其亲信在江西九江机场合影
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但是这么一来,"第一次稿"便不成其为原稿,对照云云也成了一篇糊涂帐。

不过,"三稿对照"有一点是对的,罗瑞卿确实对林彪指示作了修改,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在林彪所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补充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另一处是在估价1964年成绩、提出1965年任务时,加了一句"气可鼓,不可泄"。

罗瑞卿同志的三次讲话,共同主题是对林彪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将林彪的指示往正确的方面解释,以力图减轻其在部队贯彻时会产生的消极作用。罗瑞卿这样做完全是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形象。但摘录的整理者却认为罗瑞卿这三次讲话歪曲了林彪的指示。

"三稿对照"旨在说罗瑞卿"篡改","三次讲话摘录"旨在说罗瑞卿"歪曲"。一个"篡改",一个"歪曲",总的帽子就是反对突

出政治。

在上海会议之后揭发罗瑞卿的高潮中，对罗瑞卿提出的更严厉的指责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还没有反对我”，因此，会议没有给罗瑞卿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已经在说罗瑞卿反对提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了。朱德在会上明确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他也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上海会议之后，为了给罗瑞卿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揭发材料提供的罗瑞卿这方面的“罪证”主要是：

一、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二、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学习30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第一、第二两条是对林彪的提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那荒诞的年代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3月4日下午召开的京西宾馆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如此等等大得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帽子，一顶顶往罗瑞卿头上扣，它对罗瑞卿的灵魂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有时更甚于遭受皮肉之苦。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啊！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

着我，太难受了！”

在批斗罗瑞卿的积极分子中，吴法宪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交代说：

1966年3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稿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吴法宪这颗“原子弹”一放，罗瑞卿再严酷地责备自己搞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一些老帅、骄傲自满，爱揽事等等，都无济于事了。他3月12日就上述问题作了长篇检讨后，会议上的几个积极分子说，这些都是“小鬼”，他们要求罗瑞卿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重新检讨。

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以后又听了两三天发言，发言稿都是当场发，牵涉的问题，所举的材料不少，但我手中又无材料，实在听不下去，但又无法申辩。要我作第二次检讨。我感到检讨实在写不出来。我写一个正式报告给七人小组，请求会议发言结束后，停开若干天，给我写检讨的时间。很快就给我一个书面答复，说不行。并说会议一定要在两个礼拜左右结束，要我一边听会，一边准备检讨提纲。晚上在家里还可准备等等。可是，这我哪能办到？真是忧

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4个月来，罗瑞卿的脊背上已经承受了太大压力，随时都可能倒下。他尽力支撑着。此时，种种屈辱、冤枉统统涌上心头，他有口难辩，感到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他突然想到了死，想求得永久的解脱。

3月18日上午，郝治平正在室内陪伴他。她手边有一本小说，她想让罗瑞卿转移转移注意力，松松心，便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罗瑞卿便说："你觉得好，你就去看吧，我要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他托词要郝治平拿着书到另一个房间去以后，在一张字条上写道：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此时，罗瑞卿尽管受到了林彪致命的精神折磨，但对党、对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罗瑞卿写完字条，便到公务员房中取安眠药，尚未将药片从药瓶中倒出，公务员回来看到了，他又把药瓶放回原处。他想，公务员要是反映上去，更不得了。于是又回去。此时郝治平还在看书，他深情地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便走进卧室，脱去外衣，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然后轻轻地走上了通往这座三层楼顶层的楼梯。顶楼是储藏室，很少有人来，到处都积满了灰尘，有一扇窗户通往顶楼的平台，他推小窗、

高大的身躯费力地钻了过去……

对于这惨痛的一幕，他的女儿点点在事过21年以后写道：

21年前的这一幕，至今使我想起来就热泪盈盈。21年前重压在你心头的惨烈的痛苦，至今使我不堪回顾。这是我心灵中一个永远不堪触抚的伤痛。死亡本身就是阴冷的。这种追求死亡的特殊方式更是阴冷可怕和不自然的。自戕，就是骨肉迸裂，就是心灵破碎，就是生命毁灭，就是万念俱灰！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自欺，更不能欺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有那么多中国人民中的杰出人物都先后走上这条可悲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那个毛骨悚然的时代。可悲之处恰恰在于，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缺乏准备。如果他们（父亲和老舍先生）当年果真有那么冷静的分析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去死。以他们对生的热爱来说，死亡，尤其是自戕，是最残酷的苦刑。

（黄　瑶）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编者按:本文以真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详尽地展示了50年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冤案的内情。

作者李之琏同志,任中宣部秘书长时,是处理这一案件的负责人之一。可贵的是,作者将自己摆进去,作了诚恳的反思;可悲的是,由于作者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同当时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出现了一个案中案。20多年后,这两个冤案终于平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50年代,中国文艺界出了一个“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曾经大肆宣传,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案子在1955年—1957年间有过三次大的起落,即: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责任将内情公之于众,留之后世,吸取教训。

为什么批判丁、陈?

批判丁玲、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70人。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

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

我是1954年12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任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三位秘书长（胡绳、熊复、石西民）先后调走，我改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为什么要批判丁、陈，当初我并不清楚。我同丁玲过去只有一面之识，同陈企霞则从未见过面。他们在文艺界的活动情况和影响我也不了解。机关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参加对丁、陈的批判会。不过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使我产生了许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二：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并多次被派出国访问。这说明从延安整风以来，她在创作上工作上可以说大有建树，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对丁玲的作品，周扬曾誉为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还称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

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优秀的作品。"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他颂扬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因为什么呢?

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报告中说:批判丁玲旨在"整顿文艺队伍"、"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报告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并说在周扬"帮助丁玲准备检讨发言稿时……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两人的"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首者,为

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组有这种职权，而应该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去办，允许本人有申述的机会，不应该把人关起来后，不让本人知道就宣布开除其党籍。

但当时我对丁玲、陈企霞的情况并不了解，又是在这样的场合讨论，我当然无法多说什么意见，但是，作为机关党委书记，对所属两个党员开除党籍，我应该坚持按组织手续办理。我讲了我的看法，我说："关于报告中'决定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一点，应把'决定'改为'建议'。因为所揭发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核查后处理，也避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在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时，陆定一部长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对报告的"批语"就这样通过了。

陈企霞、李又然问题的曲折

这次中宣部部务会议开过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受命写出了"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送机关党委审批。我和机关党委的同志认为，在肃反运动高潮中，对于在政治上还没有弄清楚的党员急于开除党籍，会对运动的正常开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部务会同意了，但还应听听多方面的意见，提议同机关肃反五人小组联合起来，共同讨论这个决定。中宣部机关肃反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兼任。他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由他主持五人小组成员和党委成员开联席会议，讨论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李二人党籍的决定。决定中对开除陈企霞党籍的根据有两条：一是他是"丁、陈反党小集团"的

成员；二是，他历史上有托派嫌疑。对开除李又然党籍的根据是：他在历史上有托派嫌疑，还说他在思想上腐朽得不成样子等等。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作为托派嫌疑而开除他们的党籍不妥，因嫌疑是不肯定的。如果作为“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那么“小集团”的为首者丁玲尚未处理，先开除陈企霞也不适当。因为在党组的上述报告中，对陈企霞反党的事实写得很不具体；“反党小集团”成员，本来是三个人。另一人由于承认了错误并站在主持人一边揭发丁玲、陈企霞，领导就豁免了他，而变成揭发小集团的积极分子。这说明，“反党”或“不反党”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很不严肃。而李又然又并不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况且这两个人在作协党组的要求下，已由中央肃反三人小组批准实行了“隔离审查”，他们已不能参加任何党的活动，开除只是一个手续问题了。联席会议最后确定：作协党总支起草的开除陈企霞、李又然党籍的决定根据不充分，要他们回去再研究重写。

改写的“决定”没有送来。到 1955 年 12 月 15 日，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有“我们决定，根据会议的提议开除(陈企霞、李又然)二人的党籍”的话，因而开除党籍也就随着对整个报告的批准而成既成事实。

接到中央的批示后，部长立即召开中央各部门的骨干大会，传达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报告。

1956 年 5 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5 月 22 日他们恢复了自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这两个人的党籍如何处理？是释放后立即告知其已被开除，还是另向他们作出交代？由张际春副部长主持讨论后，认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整个案件

尚未处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作为其中的问题之一,仍可作为还在处理过程中,不必立即宣布他们已被开除。"

陈企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5月24日,由我主持的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对他的"政治迫害"。谈话以后,陈企霞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机关党委。这些材料照例也都印发给各领导和有关同志参阅(包括周扬本人)。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了他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这种谈话,当时机关党委也只是听听,向领导反映反映而已。对反映周扬这样的领导人的任何意见,机关党委无权处理。

但对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问题如何处理,这关系到如何对待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宣部部务会已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的批准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又提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

1956年6月28日,由部长主持的部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关于陈企霞等问题)今后的作法,确定由张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党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等)继续参加党的生活。

会后,张际春为此事向中央总书记请示报告。小平同志同意。

机关党委为了进一步落实上述决定,"由杨雨民、郭小川、阮

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汇报时由际春同志主持,并吸收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时由苏一萍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根据查对事实的结果,作协党组起草了《关于陈企霞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上述查对结果,对陈企霞同志的错误结论如下:

"一、陈企霞同志,主要在他主持《文艺报》工作的期间,作了不少工作,在有一段时间内,工作也比较积极,同时由于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文艺报》的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陈企霞同志却因此骄傲自满,因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犯了拒绝党的领导监督,向党闹独立性的严重错误。

"二、陈企霞同志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两人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他们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作为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结论(草稿)由邵荃麟等送部长审阅同意后,找陈企霞谈话征求意见。陈企霞根本不接受,而要求"彻底平反"。

对丁玲是非的调查

丁玲在 1955 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

1956 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

进行。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 年 5 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 1936 年 9 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我同张海受命将通过的结论同丁玲见面时，她对否定了"自

首"一点感到满意。但对结论定为"有变节性行为"不能接受。于是她又写了声明。我们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和结论一起报送中央审批。在我们和丁玲谈她的历史问题后,她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她说:1955 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

但我同张海只是代表专门小组和她谈历史问题,没有要我们谈反党错误,我就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任务,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同志去谈。"丁玲表示为难,认为找他们很不容易,于是她哭了起来……

我说:"你觉得找他们困难,写出意见来交他们看也可以。"

专门小组对丁玲的历史审查结论报送中央以后,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专门小组的成员有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林默涵和我共五人,在小组以下建立了工作组,由干部处长张海负责,刘白羽、杨雨民参加,并抽调中宣部干部处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干部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

小组该如何进行工作,在小组内部争论很大。有的同志认为,1955 年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定案作出组织处理。我和张海则认为,1955 年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作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

这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同意我和张海的意见。他认为,核实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较容易接受。

于是张海负责的工作组就根据这种精神,按照作协党组上述报告中揭发的丁玲反党问题的事实,逐项作了调查(有的人由

我直接谈话调查),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印发各有关的人参阅。

丁玲本人写了一批申辩材料,提出对她批判的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

丁玲在送交这些材料时,附有一信给我。丁玲的这些材料同其他调查材料一样,印发给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

周扬对于把丁玲写的材料里有对他的意见印发给有关人员看,十分恼火。他找部长出来制止此事。有一次在部长家中谈话时,他当着部长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我:"你们把反党分子对别人的诬蔑广为散发这是什么意思?!"

对周扬这种指责,部长并不表示异议;我作为下级,只能看做是领导的决定来执行。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就只好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原先人们以为丁玲问题早已定案,现在又来调查必然还有问题。人们又看到,作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也已无条件释放。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又不是以周扬为领导,而是由张际春任组长……这一切在人们思想中产生一个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

这种情况,同1955年"反胡风"、"批丁、陈"和肃反初期形成周扬是"绝对权威"已大不相同了。于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时作为积极分子揭发问题的,现在被调查时却声明:他过去对丁玲的揭发、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样说的,要求更正他过去所讲的情况。于是,我们又一个一个的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调查落实的情况和原来报告所罗列的事实既不相符，就必然牵涉到原来的定性是否正确也值得考虑。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落实的问题定性呢？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只好又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部长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部长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部长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现在在这个会上来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这次部务会以后，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但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1957年5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整风中的变化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

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

这种情况,引起了部长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

周扬为什么在这时候率先这样表态？从他原来的态度来说，已有了根本的转变，这比他主持修改的结论（草稿）又有很大的变化。但从组织上来说，"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中央宣传部讨论同意了的，中央批准的；现在作协党组的几位同志这样宣布是否请示了中央？……我对这种转变感到高兴，但对这种做法则有怀疑。于是，我向张际春作了汇报，问他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这种作法？他说："谁知道怎么搞的哟！他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

在"反右"中加码

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当天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

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部长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 1956 年 12 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重要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部长既然认为张际春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部长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

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部长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部长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

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理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那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部长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这次会议后，有些参加会议的处长们认为我太软弱，应争的未争，说我“涵养性大，能忍事”。对他们这种批评我理解。这也正是我的弱点。如果我能像张际春那样揭露周扬，结果也许会不一样。我只是从组织上考虑到我当时的地位，注意了上下级的关系，而没有从政治原则上力争是非，揭露这种无理反复。

1957年7月，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斗争全面开展。中宣部又进一步研究作协党组如何继续讨论丁玲等问题。

部长首先提出，作协党组讨论丁玲等问题的扩大会议要很快复会。他仍主张由周扬主持（这时作协党组书记已由邵荃麟

担任),并要他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讲一次话。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一个多月后复会。周扬讲话的内容同6月6日的讲话根本不同,他首先按照陆定一的指示,肯定了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并表明这个批判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周扬的讲话,就给人一种暗示,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周扬的讲话,为作协党组扩大会定了新的调子,改变了原来的性质。原来是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讨论会,现在变成对丁、陈进一步"反击"的斗争会。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这样丁玲等在前一段时间趁整风之机追问1955年批判她的原因,成了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于是就把她同陈企霞等人的个人联系和意见的一致性等等一系列行为都说成反党活动。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如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七人。

作协党组"反击丁、陈"大会从7月25日开始,至9月17日结束,周扬在16日的会上讲了话。周扬先说了他一贯忠于党,一贯坚持斗争的光荣事迹,然后指名"揭露批判"了丁玲、冯雪峰等十几位著名新老作家,戴上了多种政治帽子……其中说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这个讲话,会后加以"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

是的,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周扬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历史就这样打了一个句号,周扬成为文艺界正确领导和权威的化身;而丁玲、陈企霞……开始了为期22年的流放,受尽了屈辱、苦难、尝遍了人间的苦辛。

拨乱反正总澄清

当党从“左”的阴影走出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重新审理千千万万件冤案时，阳光终于照到丁玲、陈企霞头上。河清了，天蓝了，历史终于按事实写了。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

“……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1980年1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同志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应予撤销，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六、……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并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陈企霞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这

样写：

"一、关于'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问题。

陈企霞在作协召开的总结肃反工作和提意见的会上，以及向中宣部党委和作协党组部分负责同志陈述意见时，确曾讲过一些意见，是针对1955年至1956年作协肃反工作而言，并非攻击肃反运动，不属于右派言论。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陈虽曾与人谈论过文艺界一些问题（包括丁、陈事件），但不属反党性质。

……

综上所述，陈企霞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他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0级），适当安排工作。"

同丁、陈一起错定为右派的其他五人，也都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有人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人们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工作的。错批、错斗、错划、错定等等都是左倾思想的必然产物；也有的人说，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群众一发动起来，必然产生过火的批、过火的斗和过火的处理。还有的人说，过去每次群众运动都规定运动对象的数字，然后分配到各部门去寻找，数字不够就把批判对象升格、拼凑数字，必然造成错误。等等。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些说法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一切错误处理的案件造成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左倾思想往往说不清具体是非。比如，对揭发的问题无限上纲是"左"；无中生有的，捏造事实的，颠倒是非的就不只是"左"了。因为处理每个案件都是由一定的人主持的。对

错误事实的认定、对处理人的方式方法，对当事人的各种要求等等都由主持人规定的。这个主持人的思想作风，他对人、对事、对党的政策的态度，政治和思想水平的高低等等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个主持人如果经常说了不算，或朝秦暮楚，毫无定见，或以个人好恶来认定是非，或感情冲动、看风使舵、随风倒，……他就不可能正确处理人的是非曲直。这个主持人如果只是思想认识上"左"，但能听取群众意见，尊重多数，也不致错得出格，黑白不分。这个主持人如果实事求是精神很强，能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也能够避免夸大和捏造就能做到防"左"；这个主持人如果不存成见，能客观地对人对事，不媚上，不压下，不个人决定一切，也能做到公正处理。

往事已矣！但愿我们能从以往的失误中吸取教训，清醒起来，别再干这种既害同志又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蠢事！

（李之琏）

我因胡风蹲大狱

抗战初期，本文作者孙钿还是个爱好文学的革命青年。他结识了胡风，常到胡风门下讨教。1955年，全国突然发起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一下把他和一大批与胡风有过接触的人，大都划为反革命分子，关进了大狱。现在孙钿已到了75岁高龄，他回忆起昨天那场浩劫，仍令人怵目惊心。——编者

一

1938年8月，我刚从大别山来到武汉，住在大和街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招待所里，想到在这儿就可见到胡风了，我满怀喜悦，忘记了炎热，按照信上的地址，四处打听他的住处。

在"两个口号"争论中，尽管我还在日本，我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抗战爆发，我立即回国，在上海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持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我在新四军投入了战斗，也写稿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这次我从前方回到武汉，给胡风写了信，想不到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信约我见面。

我终于摸到了江汉路的一条小巷，那是一幢旧屋，大门敞开着，我走进去，在右厢房见到一个头发稀落的高个子，穿着白色短袖汗衫，我自报了姓名，他立即站起来，满脸笑容，伸出手来紧握我的汗涔涔的手。他就是胡风。他的眼睛炯亮，凝视着我，嘴角边溢出了欢笑。我说这次是来领取冬天军服和饷银，已经办

好了。我的近视眼镜在战斗中丢失了，我在这里配镜片需要半个月，得等些天。他说日军已经包围武汉，战事逼近，他准备撤到重庆去出版《七月》。他斟给我的一杯凉开水，早已喝光，我接连又喝了三杯。他递给我一把芭蕉扇，我扇了几下，就起身告辞，因晚上办事处召开会议必须参加。他送我到大门口。

二

战争局势一天天紧张，日寇包围了武汉，我取到所配的眼镜，准备回大别山，但因交通情况不明，又没有人护送，组织上不让我走。过了几天，给了我一张搭船的护照和路费，决定我去重庆。

抵达重庆已经是1938年12月下旬，我在一家包吃包住的旅店暂住。重庆的灰蒙蒙的天空和嘈杂的市街，使我倍觉苦恼。我懒得上街，就坐在床沿边读高尔基的《萨木金的一生》。我有时伏在破烂的小板桌上写小说。袁勃来看我，联系我和组织的关系。他告诉我：胡风已到重庆，住在磁器街的一家旅店里。我便按照他说的地址，找到了胡风。他住的旅店也很嘈杂，房间很小，梅志躺在床上，听说生了孩子没几天，我在房门口跟她打了个招呼。我同胡风坐在房门口的走廊上喝茶谈心。我谈了些撤离汉口后的经过，胡风谈了筹备《七月》出版的情况，要我写些文章给《七月》，我把诗给了他，同时还留下了我写的长篇小说两章请他提意见。突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我不敢久坐，临走时，胡风说："明天我们谈你的这篇小说好吗？"

想不到第二天清早，胡风到我的旅店在楼下大声喊我。我赶忙奔下楼去，见到他，梅志抱着婴儿。胡风说："今天要到医院去，改天再谈吧。"原来他们的婴儿躺在摇篮里，晚上给老鼠咬伤了脸部，他们急急忙忙走了。

文协召开的诗歌座谈会上，又见到了胡风。会议由老舍主持。座谈会上有很多人发言，我并不熟识，我只认识袁勃、姚蓬子和坐在我旁边的冯玉祥。我并没有把冯玉祥当做将军，他从草绿色的布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他写的诗，他说："这些丘八诗，你看看怎样？"我喜欢他的直爽的性格和他爱诗。胡风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抗战诗歌的综合性的发言。


胡风在监外执行时留影于北京

此后，我去胡风住的旅店，他忙着出版《七月》的筹备工作。他在我给他看的小说里有些文字上面画了"○"有些文字上面画了"×"。他说："○"的记号说明这段文字写得动人的，"×"的记号是表示应该修改的。他说作者不能代人物说话，应该是这个人物在他的环境中的描述。他介绍我读契诃夫的作品。

过了几天，我又去打扰胡风，送去我写的诗稿。我们坐着对谈，突然他问我怎样写作的？我如实以告。我说我的心在大别山的战火中，我时常怀念亲密的战友，我写作的时候，仿佛又回到战斗生活中去了，有一种激情推动我写，使我听不到周围的嘈杂，使我忘掉了自己的烦闷。

胡风听着听着，大声地笑着说："是呵，需要激情，需要真正

的激情，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必须在生活中感受，同时，生活也不断提高磨练作者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机能。……”

这次见面以后，我得到通知，说是有一辆运送侨胞捐赠医药用品的卡车自西安来，空车明天早晨出发，要我搭车去南方接任党办的书店和刊物的工作。

我去胡风那里，向胡风、梅志告别。我把我写的诗稿全部留给了胡风，自己只带走了一部尚未写完的小说稿。

那时，我，21岁，一头初生之犊。

三

两个半年头过去了。我去到香港，廖承志告诉我，胡风到香港了，派我去接待。我按地址找到一家小旅馆，与胡风、梅志和他们的孩子晓谷又见面了。好高兴。那时，大批文化人自重庆撤退，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投降的倒行逆施。有些文化人来了，组织上总是派我去接待的。胡风一家人住的旅店，是娼妓吸毒者出入的地方。胡风大概是考虑经济节省才找了这么个临时住所。胡风穿着一件乡下人穿褪了色的长衫，吸着香港的人力车夫都不吸的最劣等的香烟，像是落荒而来的。我随即陪同胡风到西环一带的旧衣店里挑了一套适合他的略微肥胖身材的淡灰色薄呢西装，还买了衬衫领带。回到旅店，换上西装，梅志笑着说：“像个教授了。”晓谷睁大了眼睛，仰头对爸爸说：“你是个洋人了。”梅志在长途旅程中照顾两个孩子，身体的疲累似乎还没有恢复过来。我说：“我去九龙找个清静的旅馆，你们暂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再找住房。”

胡风一家搬到九龙新旅馆后，廖承志立即去探望他们。

过了几天，我带胡风去看了几处住房，最后决定租用西洋菜街楼上的一间。没有家具，租了大床和书桌椅子。由党内同志

开设的西药房作担保。

他们来香港没住多久，总是听到梅志说打算带着孩子回上海去，我把这一情况向廖承志说了。

廖承志同我几乎每天碰头，他去看望胡风后对我说："梅志要回上海，就让她回去吧。她对鸽子笼般的住房一下子难以习惯，吃菜吃不惯，说话听不懂，带孩子闷在一间房里，就想念她的母亲了，从这里到上海只要坐上船就可到达，回去一次也好。"

胡风那时 40 岁，梅志大约 25 岁，都还年轻。胡风受鲁迅的影响很深，家庭生活夫妻之间以及对待儿女的态度或多或少也受到鲁迅的影响。一个人热闹久了，就羡慕清静，一旦太清静了就会感到寂寞。梅志带了两个孩子去了上海，我走上胡风的蜗楼，顿时感到他的房间空荡荡冷清清。我邀他一起去探望叶以群，我们搭上公共汽车到太子道，以群同戈宝权住在一起，还有两位女记者高姓姊妹似乎也住在那里。我跟以群有工作联系，一个月至少要跟他碰面一两次。有时，我找胡风去宋之的夫妇那里，高士其也住在那里。胡风同宋之的看样子他们亲密无间，谈笑自若。胡风写了些诗给盛家伦谱曲，盛家伦是一个豪爽的人，他住的房子比较宽敞。那时，我住在香港跑马地利舞台附近一条僻静小街的一幢楼房里，对外不公开，我不得不经常去看望我所联系的一些文化人，我每次到九龙办完事，总要去看望胡风。时间多就多谈或者一起到附近散步，时间少便在他那里转一转就走了。胡风的房间门总是不上闩的，每次我去，明明见到他坐在书桌前看书，我还是叩几下门，听到他的回音："请进"，我才推门而入。

一次，胡风对我说："我们为了抗议国民党的投降路线，大家来到香港，应该团结一致做些事出来。"胡风的意见是正确的。当一个香港的知名电影剧作家向我反映了一些重庆来的文化人

排挤本地剧作家的情况后，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组织内部作了汇报，廖承志决定我去参加电影厂的组织生活，要我传达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我去处理好香港当地电影剧作家和外地来的电影剧作家的关系。

我和夏衍并无来往，我读过他的剧作和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高尔基的《母亲》。我知道三十年代他虽受到过鲁迅的指责，但我对他还是景仰的。不知怎的，我接触的文化人都对夏衍有意见，以群对我谈了夏衍，说他没有担负起领导香港文化界的重任，在搞小圈子。以群是党员，我对他的意见特别重视。我也听到胡风、宋之的、盛家伦对夏衍的意见。我过去曾经读过鲁迅有关周扬以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文章，冷静分析思考，觉得胡风他们的意见都是对事不是对人的。所以对当时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我对以群、胡风曾表示过我的看法。我认为夏衍作为一个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应该照顾到当时文化界的大局，应该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能利用党给他的领导地位来谋取小圈子内某些人的出版书籍和剧本上演的便利。我在组织会议上提出了这些问题，经过讨论，廖承志表示要召开一次文艺界的座谈会，希望大家在会上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后来以群得到了召开座谈会的通知，我同他一起去找胡风。我认为大家的意见应坦陈于座谈会，在背后乱说，或在背后搞些小动作都是要不得的。抗战为重，革命事业为重。

座谈会召开了。我因工作关系不便在公开场合露面，没有参加。事后遇到胡风，他涨红了脸，气冲冲地对我说："背后大家都有意见，座谈会上大家都不吭声，好像没有意见了。我刺了他们一下，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

我问："以群也没有说话吗？"

胡风说："以群胆子小，只会背地里嘀咕，有什么用呢！我不

是为我自己，鲁迅有一句话：‘我以我血荐轩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年轻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有一个下午，我去九龙办完事，便弯到胡风的蜗楼，他正伏案在写什么，见到我就说：“鲁迅逝世五年了，我正在写一篇纪念文。难写呀，你看怎么写？”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怎样呢？”我说。

“鲁迅的爱和憎是非常强烈的，他活着的时候，他不能不横站着战斗。他相信党，但不迷信。”接着，我们的谈话又转到了诗。

天色渐暗，便邀胡风到外面吃晚饭。叫了几盘菜，买了一瓶莲花白。胡风大口大口吃菜，好有劲。

梅志回来了，我从香港过海到九龙去看望她，胡风的房间变得热闹了，充满团聚的欢乐。我说：“应该换个地方。”

想不到没几天，战争爆发了。那天是1941年12月8日，香港陷入一片混乱。面对这突然发生的事件，我们大忙起来。廖承志大清早到我住所，连贯也来了，为了安全，决定将住在九龙的文化人全部撤到香港居住，原居住在香港的文化人另行搬迁住所。我们分工后立即各自行动起来。这时，街上电车公共汽车已停止行驶，只得步行，街道上来来往往全是步行的人了。我在中环一带的人海中遇见廖承志，相互暗暗点一下头，一下子又在人海中隐没了。一颗炮弹突然飞来，行人急忙奔人附近大楼躲避，我蹿进了一家银行的大门，炮弹在市街爆炸，等到平静时我走上街，只见周围尸体多具浸在血泊中。

我搭渡船到尖嘴，先去太子道向叶以群交代了一切，我又赶到胡风那里告诉他赶快整理行装，以群会去找他们的。我还请胡风就近去宋之的、高士其住所关照他们作好搬家准备，以群会

去联系的。我立即搭渡轮回到住所。烧毁无用的文件信件，整理了衣衫书稿。把党内文件装进了衣箱，转移出去。到了晚上，停电，环顾客厅，空荡荡乱糟糟，炮声时断时猛。我很累，躺在床上，才记起一天只喝了几杯水。

整整一夜都在飞机声炮弹声和高射炮声的骚乱中度过。早晨，想到自己的住所还没确定，我先去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然后找到胡风那里，我说我为还没有找到住所而焦急。梅志说她的友人有一层住房空着，我和梅志去湾仔看房，经过房主人同意，再经过组织同意我们就搬去临时避难。好在那一大间房中间隔了木板可以分为前后房间，家具齐备。胡风一家住前房，我和南非华侨姊弟住后房，前后房各有一张床铺，后房的床铺由我和华侨男孩合睡，华桥姑娘睡地铺，胡风一家三人睡的内房有衣橱、梳妆台、大床、沙发等，显然是原主人的住房。在那兵荒马乱中能找到这样的住房多么幸运。

我告诉胡风，除了躲进防空洞，他们不要外出。我上街购买食物，买了大米面粉食品罐头，估计可能断水，买了啤酒桔子水汽水等饮料，还买了香烟柴炭。惶惶不安的气氛弥漫市街。

我们组织成了一个商人家庭，彼此改名换姓，编造了相互关系，以防万一。战争一天一天激烈起来，12月的深夜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轰响了，敌机在上空盘旋，我们大大小小摸黑躲到楼梯底下。有几个夜晚，大家要从被窝里爬起来摸黑下楼两三回。白昼，在三楼前房，我们隔着玻璃窗观望远远的山麓，英军日军沿着山路短兵交战，英军的后面扯着一面红十字旗，听不到枪声，只见射击时枪口的火光闪闪，显然，日军早已登陆了。胡风每天抽烟解闷，他喷着烟，吐出了一个一个小烟圈儿，逗得几个孩子好欢喜。自来水早断了，我们用完了积聚的水，连抽水马桶水箱里的水也用空了，只得用桔子水、汽水煮饭。我们憋在屋

里，哪有心思谈什么，我经常同胡风下棋，有时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玩扑克。梅志安排三餐，大家在战火中苦挨日子。

圣诞节前两天的晚上，街上偶尔传来奔跑声、零星枪声和叫喊声。战争进入了市街。12月24日早晨，我们从三楼沿街窗户望见了对面跑马场上有许多军马，还看到了日本旗和日本士兵，香港沦陷矣。

我征求胡风的意见，胡风说要回内地去。我立即把胡风的意见转告给组织。

四

1947年的某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了胡风的信，知道他和梅志都迁到上海定居，很想见到我。

胡风的住所是雷米路文安坊6号。我利用到雷米路附近一家电影院旁边小里弄去办事时，见了他。他身体仍然胖胖的，看来很棒。

胡风跟我谈了些分别以后去东江的事，我告诉他："我在香港同你们分别以后，忙着剧团人员的撤离，还有茅盾一家撤离也是我去通知的。"

胡风要我吃早点，我的肚子还很饱，我拿了一只面饼吃。胡风吃得很痛快，边吃边谈。从桂林谈到重庆，从重庆谈到上海。谈到了桂林的南天出版社，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

我手里翻着我的《旗》这本诗集，又翻看了绿原、冀汸、艾青、田间等人的诗集，还有一本胡风编的《我是初来的》诗合集，还有胡风自己的《在混乱里面》。我感到当前文坛上只有胡风呕心沥血关心写诗的年轻人。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前辈文学家能如此关心和扶植我们，也只有胡风能够不辞劳苦办了《七月》和《希望》刊物。他一个人奔走印刷所，校对，他一个人看稿、定稿。我又

想起鲁迅，在那白色恐怖年代，也曾为青年作家叶紫、萧军、萧红编了一套“奴隶丛书”。

一年匆匆过去了。夏天刚刚开始，胡风来信，约我抽出一天时间去他那里谈谈。

依旧是梅志带我上楼，胡风告诉我，他们要他去香港，他并不想去。我说：“暂时离开这里比较安全，国民党特务是杀人不眨眼的。你长期在党领导下搞文学工作，你的知名度、你的立场，国民党特务不会不入他们的册。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已经进入了顶峰时期。”

梅志搬来了午饭，还有一个清蒸鸡，一盆炒冬菇。

我和胡风坐在日本式的矮方桌边的草席垫子上吃起来。一边吃，我们一边谈到战争的发展趋势，大家都很乐观。又谈到了宗派主义，胡风说：“过去说‘胡风派’，现在说我在拉拢人搞宗派。我搞宗派有啥用？鲁迅也从来不搞什么宗派，他爱憎分明，公正而已。”

吃罢午饭，继续谈《论现实主义的路》。谈到了偶然性不一定是唯心主义，谈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违背了规律就会损害艺术。话题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对党对毛泽东是无限敬重的，他称毛泽东是思想巨人，是革命巨人。他也提到人民，他说：“人民力量是强大的，谱写历史的是人民！”

傍晚时分，我留下一些诗稿，向胡风、梅志告辞。此后长别多年。

五

1955年5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揭露胡风”的信件，而且在按语中称作“胡风反党集团”。看了按语，我感到牵强、武断。

当时,我正在浙江省嘉兴视察一所专业学校。有人通知我杭州有电话来要我回去。我匆匆上车。车厢里坐着一个陪送我的人。说是陪送实际上是押送。

回到杭州,见到厅长,他满面笑容:“你看了最近一段时期的报纸了吧?”

我点点头。

“想请你写些材料。”

“是不是写胡风的材料?”

“是的,是的。写些你们过去来往的情况,有信件要交出来,你还年轻,还有前途,应当同他划清界限。”

我说:“我同他来往的日子里,我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反党的行为,他是跟着党走的,他在文艺论点方面跟周扬有分歧,这不过是文艺理论问题,根本谈不上反党。”

“你要站在党的立场,好好想一想,不要很早关门。”

他站起来叫人派一辆小车送我。我赶回招待所,开始写我与胡风往来的经过情况,只写了一张半纸。第二天早晨就交给了厅长。

翌日,厅里派人来招待所找我。我到厅长那里,他说:

“你写的材料看过了,还不够。”

我说:“我同胡风的往来,就是这么些,没有什么可写了。”

他说:“你应该揭露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很早关门,对你没有好处,彻底揭露胡风,才是出路!”

这时,厅长把人事处处长找来,那个处长沉着脸说:“你应该认真对待你的问题。”

“我已经把我同胡风往来经过全部写出来了,还有什么可写呢?我不能乱写。”

那个处长阴险地冷笑了一下:“谁叫你乱写?只有交待清

楚,才能争取人民对你的宽大!”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对我说“宽大”这个词儿,顿时冒出了一阵汗水。对于文艺问题怎么也谈宽大不宽大呢?

就这样,写了再写,写来写去写不出什么,厅长、处长都火了,叫我搬到厅里住,并且向我宣布只准三件事:一是送写好的交代材料,二是到饭厅吃饭,三是上厕所。除这三件事之外,只准呆在小房间里。我失去自由了!

这6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搭着睡铺,一只小桌和一只小椅子,小桌的抽屉里放着我的怀表和钢笔,桌子上是墨水瓶和一只水杯,毛巾搁在椅背上。其他,什么也没有。

整个6月过去了。7月初的一个阳光四射的上午,突然有三个汉子闯进我的小房间。他们拿出逮捕证要我签字,我签了我的名字,立即给我戴上手铐。我锒铛入狱矣。我为了什么?!

我睁大眼睛,半夜里突然醒来,监狱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我的躯体给锁在黑暗中,一群蚊虫向我扑来,我失去了扑蚊虫侵袭的本能。

我一直呆站在木栅门边,见不到阳光,似梦非梦。我回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死囚室手记》,回想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回想谭嗣同、秋瑾、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可是,我生活着的社会跟他们所处的封建法西斯的社会根本不同。难道天地倒置了吗?我躺下搔着蚊虫叮咬的皮肤,又昏昏睡去。……突然,从木栅门外响起一声吆喝:

“站起来!”

我猛的睁开眼睛,见到一个军人在木栅门外。

“叫你站着,怎么躺下了?你这个反革命,反抗吗?找死吗?站着,不许动!”又是一阵吆喝:

“把脸孔转过来!两只手伸直!头不准低下。”

我的身子转向木栅门，抬起头直伸双手，我面对着木栅门外的军人，他睁着一对凶悍的大眼珠。我站着，吃饭也站着。那个武装的皮靴声一直在门外笃笃地响来响去，经过我的木栅门，他总要探视一下我是否站立着。

过了几天，一个深夜，我给开锁声音闹醒。门打开了，听到一声："出来！"

我勒紧裤腰，跨出了木门，但见走廊里一盏盏阴沉沉的电灯闪着微光。几天没有走路的双腿，摇摇晃晃提不起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歪歪斜斜走着。我面前有一垛高墙，整个高墙上仿佛写着一个很粗大的"冤"字。再看一眼，"冤"字闪闪消失了。那个叫我出来的人走在我后面，保持着距离，我略微放慢步子，他就吆喝着："快走！快走！"每走过一道门，就有一个卫岗。记不清走过多少道门，阴暗的门上仿佛都写着很大很大的"冤"字。推开每道门，走过去了。门便咯吱咯吱发出一阵凄惨的声音，关上了。开门关门，真像过鬼门关，阴森森的。将要发生什么？我在亮着灯火的门前停下来，跨进一间铺着石板的房间，玻璃窗上糊着报纸，两张破烂的写字桌拼在一起，并排坐着四个表情冷酷的人，对着他们有一只木凳，他们之中有个尖下巴的指指木凳叫我坐下。我清楚，又一场审讯开始了。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序言和按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序言和按语

中央下发胡风罪行材料

"我不是反革命，我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

"铁证如山！你还要抵赖，你这个反革命，我们冤枉你吗？"

瘦个子举起从裤腰里抽出的手枪，猛地从桌上扑向我，把枪口戳到我的额头，我的头歪了一下，那枪口落到我的肩膀，他狂

叫起来：

"你头已经破了，现在要流你的血了！"

"这是国民党特务作风，你可以这样吗？"

"就是要你流血！"

那个脑袋跟脖子连在一起的胖子也站了起来，挪开了瘦个子的拿着手枪的臂膀，缓声缓气地说：

"嗳，你不要死心塌地跟胡风反革命走，你上有老父母，下有孩子。你有信给家里吗？我们可以给你带出去。"

我闭了下眼，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说："你们把我关在黑牢里，白天晚上都漆黑，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怎么写信？"

胖子说："好！好！只要你好好交代胡风，交代你们的集团，我叫他们给你调一个笼子。"

我又给锁进了阴沉沉的黑牢，我怀疑我堕入了国民党法西斯的囚笼。

我一日三餐，每餐三块玉蜀黍糕或薄粥一瓢，加上一小撮咸菜，过了一天又一天，明日如何？简直不敢往后想了。

有一天，管理员打开狱门叫我把东西全部拿出。

把我领到一个新号子的木栅前，那个管理员大声对我说："你是42号，不准通名报姓！"从此，我的名字又改为42号了。

"活动！"有人一声吆喝。笼子里顿时沸腾了，所有的囚犯像马拉松运动员在木板上噔噔噔奔跑起来，我懵懵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靠墙壁坐着，那个笼子头头奔到我旁边，粗暴地抓住我的耳朵，把我拉起来："跑！跑呀！政府叫你们犯人活动活动，这是人道主义，你对抗人道主义吗？跑！跑！"我提起发麻的腿也奔跑起来，大家一个挨一个在木板上兜圈子，有的装着打篮球投篮的样子跳了起来，有的挥动双臂，奔呀奔呀，奔了一圈又一圈，木板上响着噔噔的声音，隔壁笼子里也是噔噔的声音。

这时候,有个青年人在嚼嚼的声音中挨到身边问我怎么会进来的,我简单说了一声"胡风"。青年人的瘦削的脸上立即浮起了笑容:"我是农业学院的学生。"我们一边奔跑一边谈话。我问:"你为了什么?"他说:"为了看胡风的书。看他们的小说他们的诗。"有个矮矮的老人也奔跑到我旁边来了,他那苍白的脸孔皮肉松弛,剃了光头,他一开口就说:"我叫曾猛。"这时有个体格魁梧的人也跑到我身边,看来也想跟我拉几句话,只听得笼子外面大喝一声:"停!"大家立即停步了,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时好几个人都挤在便桶旁边喊着"报告小便"。

比起独自关在黑牢里,这笼子显得热闹又光亮。住了没几天,我心情又烦躁起来。

新犯不断进笼,按照笼内规矩,我已经依次挪动到中间的坐位,不再挨近那臭气喷射的便桶。我的右边是47号,苏州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牢狱受过老虎凳的刑讯。现在也是为胡风问题进来关的。他同那个农业学院学生相识,他的家在杭州。他问我:"胡风怎样了?"我苦笑了一下说:"不妙。"他说胡风可能比我们待遇要好些,总不至于像我们同国民党特务挤在一起享受大灶待遇。

笼子里的信息传播很快,我并没有把我的案情告诉那个叫曾猛的老人,他却利用活动奔跑的机会问我:"胡风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回说:"不清楚。"

坐在牢门旁边的笼子头头是诸暨人,听说是镇压反革命时抓进来的当过大官的军统特务。他同曾猛在这笼子可算是元老了。农学院的学生告诉我,曾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这就使我意识到他可能是"托派",要不,怎么会坐牢呢?可是每当"活动"奔跑的时候,曾猛总要挨近我说话。他背诵《琵琶行》,背不下去了,就来问我,我说不知道,他便怏怏地叹气。

笼子里只有两个人的座位从不挪动：一个是曾猛，他背着木栅端坐，双目下垂，像一尊菩萨。他从国民党监狱一直到现在，不判不放，不知要坐到何年何月。另一个就是笼子头头，他像一只大铁钉子那么钉在牢门边，他不断在小纸条上写什么，写好了，把小纸条折了起来塞到木栅外上，外面有人经过，就把纸条取走。……现在笼子里挤满了人，甚至便桶盖上也坐着人，好不热闹。几个月没洗澡。开饭时搬进什么菜就吃什么。

外面在叫42号，接着牢门打开了，我已经懂得这叫做"提审"。我走进审讯室，又见到那个又矮又瘦的小个子转动着小眼珠，他第一句总是这么开腔：

"怎么啦？你这个胡风骨干，只有彻底坦白，才能争取宽大！"

这些话，我已经听腻了，他说他的，我想我的。

这一回他从一只牛皮纸大信袋里倒出许多照片，要我一一辨认。那么多照片中，我只认得胡风和梅志，其他人都不认识。

两天以后，管理员来拿我的交代材料。我写什么呢？审讯员要我写阿垅。不知从何写起，我们并不相识，也没有通过信，我很喜欢他的诗和文，就写了这么些，再也写不出了。

笼子里又进来一位新犯150号，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瞧什么东西都要搁在鼻尖前面，他那高大个子的一举一动，不免露出当官儿的架式。然而，到了这个鬼地方，不管你是大将元帅，也不管你是小偷惯盗，大家都是彼此彼此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个150号犯人居然带进了一本鲁迅的《三闲集》，我的麻木了的神经，终于兴奋起来，好像沙漠地里发现了一个水潭。

多次跟150号接触，知道他是从别处牢狱押解到这里的。他是余姚人，热衷于鲁迅著作的研究，他说冯雪峰送给他一部影印的《鲁迅书简》，他认识楼适夷，他感到不认识胡风是生平最大

憾事。我说我们能有一天出去了,一起去看望胡风如何?他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他认为胡风写了30万字向党进言,那片忠诚,已值得赞赏,即使全部说错了,也不应该把他当做敌人治之以罪,相互通信相互认识甚至光是爱读胡风的著作,都要坐班房,真是天理都没有了。

我收到了一包寒衣和一条薄棉被。家信中只写着:“你要靠拢政府,老实交代罪行,争取早日成为新人。”老父亲遒劲的毛笔字,写了一个“忍”字给我。他知道我的性格耿直容易激动,但是到了如此地步,即使无从忍耐也得忍耐,不过,我总觉得忍耐是有限度的。

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了春节。午饭时,大家的眼睛盯住了端进来的菜桶,禁不住喊了起来:“肉!肉!”整个笼子的犯人的神经都紧张了,分菜的犯人先把大拇指甲那么大的肉片一块块分到各人的菜碗里。每人分到一片肉和两瓢羹青菜,还多余四片。分菜人写了纸条,一一摺叠好,给大家拈,谁拈到写有“肉”字的纸条,谁就多吃一片肉。四个犯人拈到了,他们啊啊地得意洋洋,拈不到的默默地端起饭碗吃饭了。一餐肉宴匆匆过了场,大家板着脸孔端坐着。突然管理员给我们一副象棋,说准许下三天,三个晚上不用读报学习。我毫无兴趣下棋,我独自沉浸于幻想之中。

1956年6月一天,吃过早饭后,管理员来喊:“42号!把东西收拾好!”我一时有点惊惶,还以为是来提审,150号赶紧趴在木板上帮我收拾破烂的冬衣和棉絮,他附在我的耳边,慌慌张张地说:“你可出去了,我们在外面见,我一定会去找你的。”我抱了一大包衣物,管理员已经打开了笼门,我根本无法断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生死未卜的时刻,我来不及向150号告别,激动的泪水已涌淌出来。茫然地跟着管理员走进一间小屋,桌子边坐着一

个我从未见过面的汉子。木板上扔着一堆东西。那个汉子先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说：

"你释放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听觉。直到他要我在释放证上签个名字，我才渐渐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激情。管理员走来要我在伙食报销单上盖章，我说没有图章，便盖了许多手指印。我感觉有点头眩，那个汉子对我说了一些话，还要我休养几天再回去，我回绝了他的好意，我已归心如箭。

那汉子给我写了一个回去后向当地三人小组报到的介绍信。我要他们去找一辆三轮车。管理员指着地上一堆东西说："这也是你的东西！"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双白布鞋，还缝上了粗麻布，还有一块黑纱一朵白花，鞋子里塞着一封信，粗略一看：母亲死了，是去年10月逝世的。……管理员过来帮我把东西包扎起来。那汉子说："发给你一些路费和生活费，你签个名。"我拿了钱，签了名，赶紧把包裹往门外搬去。依旧是那扇木门，门边依旧站着持枪的看守。木门打开了，小巷里停着三轮车，搬上行李，等我坐上三轮车时，那扇木门已经紧紧关上。我拧了下大腿拉拉耳朵，都有痛的感觉，我才相信我并非梦中。

没有刑期的"刑期"满了，应该说我是自由了，然而以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更为可怕的噩梦。细述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只要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除了极少数借机得利者外，大概谁也不会忘记那个时代的人生况味。只有到1980年10月，胡风冤案得到平反，我才被恢复了党籍和原有的待遇。

1981年7月22日，又是夏天，我专程赶赴上海。在彭柏山夫人家与梅志重逢，彼此的心情甜酸苦辣，还说什么呢？梅志给我看了很多很多照片。

7月23日，梅志陪我去上海精神病院。路上，梅志说胡风

已有几天拒绝吃东西。走进一间单独病室,见到了一别34年的胡风,瘦削苍老的胡风坐在紫红色的皮沙发里,穿着一套阔条了的睡衣,双眼瞧着地面。电风扇在呼呼转,晓谷伴着爸爸,梅志凑到胡风耳边,大声喊着:"小孙来了!小孙来看你!"胡风抬起头对我微微笑了一下,又睁大眼睛呆呆望了望我,随即垂下头了。梅志赶紧抓了一块毛巾抹去胡风脸上挂下来的泪水。

晓谷搬来凳子让我坐在他爸爸前面,胡风缓缓抬起头,睁大了呆滞无神的眼睛,声音微弱地对我说:"你不是去国外了吗?"隔了一会,低声自言自语:"你去了国外,我很早以前就听说你去了国外。"梅志端来了一大盘切好的西瓜,大声说:"小孙来了,我们一起吃西瓜!"

胡风摇摇头推开了晓谷端过去的西瓜。

梅志把一片西瓜端到他的嘴边,说:"我们欢迎小孙,你也得陪客人吃嘛。"胡风咬了一口西瓜,又摇摇头推开了西瓜。

我说:"吃呀,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吃完西瓜,我们又要谈诗了。"

他呆木地望着我,他吃了,吃了一块又一块。梅志和晓谷起来,我感到室里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似的。

晓谷对我说:"爸爸近来身体好多了,每天还练书法。"说着,他拉开写字桌的抽屉,拿出一叠写着毛笔字的纸给我看。胡风恼了,两手拍打着沙发扶手,阻止他拿出来。晓谷赶忙把纸塞进了抽屉。

病室又肃静了,梅志忙着收拾瓜皮,只有电风扇呼呼转动的声音。胡风又垂下了头默默沉思。

我不能耽在病室太久,怕影响胡风的情绪和神经,我悄悄向晓谷挥手示意,梅志伴我走出医院,她喃喃说:"他今天总算吃了些西瓜。"

把一个追求和探索真理的文学勇士、一个忠诚于党的文学战士、一个智慧惊人卓有建树的文学巨匠，摧残到这种地步，可愤可悲可痛啊！

隔了一天，在友人家遇见梅志，她对我说："胡风在你走了以后对晓谷说，孙钿在国外，这个孙钿是假的，是他们派来的。"

从这次上海精神病院病室一晤胡风，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面。

世上事，太错综复杂了，胡风如果能像太史公所说的："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那么，已不是胡风了。胡风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之中。胡风说："我的错误是，我陶醉在本业（文学）特点（个体劳动）里面，以至违背了具体领导上的期待。"

果真如此吗？

胡风说："心安了，就能够在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类解放事业一定胜利的信仰和对自己的某些因蠢而错的言行的悔恨里面过下去了。"

胡风果真是蠢了吗？错了吗？

（孙　钿）

储安平你在哪里?

五十年代鼎鼎大名、曾任过《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惨遭羞辱,自杀未遂。绝望后失踪了,传说他死了。但不见遗体。笔者奉命去寻找,处处“碰壁”。有人在江苏一座寺院碰到一方丈,酷似储安平,上去问讯,那人摇摇头消失了。亲爱的读者,你说笔者还要不要找下去呢?……

储安平哪里去了?

死了。

什么时候?

1966年。

怎么死的?

自杀。

这是社会上的普遍说法。

一

1985年夏末秋初,一位负责人要编辑《新观察》创刊35周年纪念册。因为这本刊物是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组而创建的;而且据说这本老《观察》在解放前影响非常,以致惹怒了国民党政府,被查封。

从这位负责人言谈中知道,储曾经作为《新观察》的特派记

者，赴新疆进行过连续报道，这在《新观察》还是首例。特殊的背景，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贡献，找储安平——了解关于他生前的经历和死后的结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很荣幸，这次“外调”任务，交给了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的我。

到哪儿去找？储安平是哪个单位的？一概不知晓。

每张介绍信的开头，接待单位都是空白，内容却都准确：“了解储安平。”多亏储氏是不同凡响的名人，很快有人提供了线索——他曾是《光明日报》总编辑。

抓住这根稻草，我赶紧就上。

虎坊桥前门饭店的对面，我兴冲冲地走进那座米黄色大楼。但是，很快我又茫然地从那座楼里走出来。因为，我去访问的人(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对于储安平其人其事，知道的比我多不了多少。

“储安平与本报没有多大关系。”那人接过我的介绍信说。

“他不是你们的总编辑吗？”

“是，是，不对——”

“怎么？”

他只在这里呆了70天，以后就不知道去向了！

只有70天?! 这是怎样一个70天呀？而他在这70天里又是充当了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角色呀！

后来，有一大摞子落满灰尘的材料铺到我的面前，我翻看那些材料，虽然都是历史往事，都已见诸报端，但却依然感到心灵的震颤，感到一股强大的威摄力量。那70天，可不是寻常的70天，而是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玉石皆焚的70天；而他，储安平，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走进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光明日报》，并当上了那里的总编辑的。有人说，他将和胡风一样，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然而，才不到30年的时间，他就被人们彻底

地遗忘了,连让他扮演那个重要角色的舞台,都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模样了。

从材料中我得知,储安平是1957年4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因为二三月份,毛主席发表了重要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央研究决定,将原为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以常芝青为首的中共党组从《光明日报》撤出,由各民主党派协商推出一名民主人士充任总编辑。当然,这个协议也是征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的。

4月1日上午9时,这位新总编在社长章伯钧的陪同下走马上任。章伯钧向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介绍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这句介绍实际等于没有介绍,因为储安平是个作家,而且颇有些名声,是尽人皆知的事。人们想知道的是:这位旧社会办《观察》出了名的老报人,今后打算怎样办《光明日报》,怎样带领大家办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张民主党派报纸。形式是新的,内容也是新的,路子该怎样走,大家都没有经验,都想听听总编辑的施政方针。

储安平很坦率地向大家亮出底牌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没有告诉大家,是胡乔木事前到了他家,请他出来主持《光明日报》工作的,乔木同志知道他同许多知识分子过往甚密,由他出面约专家教授撰稿,《光明日报》会办得更加有声有色。接着,他十分得意地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最后,他踌躇满志,稳操胜券似地向大家宣布说:"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我只准备

和大家商量，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

这样，这位解放前在知识界中颇享盛名的总编辑，一上任就给100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写了约稿信，让他们为《光明日报》写些有见解、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来。他还计划请人来作主笔，为一些学者开辟专栏，在社委会下设顾问团，在编辑部下设顾问组等等……

他的这番热情饱满、大刀阔斧的行动和设想，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旧日光华大学的同学为他摆宴庆贺，费孝通先生说他工作"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名记者子冈甚至还要写一篇《新总编辑上任记》。遗憾的是，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在几十天后都成了右派，这又从不同的侧面逆向地证明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储安平这时更是全力以赴地扑到大鸣大放、鼓动那些对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的工作上。用他当时的原话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于是，他便派出了大批记者，到上海、武汉、南京等9大城市去找那些专家学者采访、座谈，鼓动他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他唯恐人们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多，提得不尖锐，还指名道姓地提出几个他认为意见最多的人。有记者临行前向他请示说："社会上常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在社会上有代表性但无可鸣，另一些人敢于鸣放却没有多大代表性。如遇这种情况，该请哪一部分人？"储安平说："要找后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出来，就登门拜访。"有的记者对他这番热情打了折扣，没有找那些最有意见的人，但绝大多数按照他的意见办了，而且还进一步地做了发挥。例如去武汉的潘文彬，本来让他

开一个座谈会,他却开了三个,没布置他写通讯,他却写了三篇,而且字字尖酸辛辣,诸如什么"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等等。后来,这些记者一一地被当地作为"纵火犯"给揪了出来,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

就这样,从5月初开始鸣放,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光明日报》共组织了11次座谈会,发表了22块整版将近13万字的座谈纪要。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和专题报道。

最后,事情走向了高峰,也就像毛主席所说的"达到顶点"。储安平在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已经临近尾声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毒草(原标题是《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事情自然也就因此而走向其反面,储安平便由各民主党派公推出来的、受人青睐瞩目的总编辑,一下子变成了个大右派。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江苏组的会议上,许多代表揭发批判他是"江苏组三个右派中最坏的一个"。人们认清了储安平的"真面目",口诛笔伐的烈火遍及报社内外、全国各地,使得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悔恨交加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邮递员给他送信,在门口喊储安平的名字,他不敢出去接,怕邮递员当面同他辩论。到医院里看病不敢说是姓储。储氏姓寡,怕人一下子认出他是储安平来。最后,他终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长达4000余字的《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几乎是用基督教的虔诚检查自己的罪恶说:"我今天在这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要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

6月8日下午2点,他向社长章伯钧提出了辞呈,不再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从此,他的生命旅程由沸点降至冰点。

"从那以后怎么样了?"我在《光明日报》社问那中年人。

"以后就不知道了。不过,他是民盟的人,你可到那里去问,他们也许知道。"

二

在北京沙滩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我找到了民盟中央,填好空白介绍信,急匆匆地走进院内。

还在路上时我便想,这回一定能够找到储安平的下落。因为,这里曾经是"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指示下,在中央一级民主人士中仅存的5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仕炳、储安平的所在地。毛主席当年曾经指名地批评过它:"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在我看到过的那一厚沓子揭发批评材料中,人们都说储安平是章罗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当初,就是章伯钧将他领到《光明日报》并推荐给编辑部的。关于"党天下"的发言,他在事前征求过罗隆基的意见,并让他看过发言稿的。还有人说,他是罗隆基、张东荪的得意门生等等。

不问可知,有章罗的地方,也必定有储。

然而,向对方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截然相反。接待者一句话就把我挡住了:"储安平在我们这儿只是挂个名,他的活动都在九三学社,你去那里问问吧!"

这时我才想起,在看过的那些材料中有人揭发说:储安平在民盟中只是一般的成员,在九三学社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可他6月1日的发言稿没有向九三学社的任何人征求意见,(主持

会议的许德珩气哼哼地说："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可却去到民盟那里交给罗隆基看。可见，他是有意违背九三学社的宗旨，有意躲避学社的监督的！

那么，当年他为什么要一下子参加两个民主党派呢？

历史退回到北平刚见黎明曙光的时刻。各民主党派为了迎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而这时，又正是储安平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

1946年4月，他断然拒绝了"南京方面以高级公务员荐委"，只身躲在上海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里开始创办《观察》杂志。由于这份杂志都是由社会名流、民主进步人士撰稿，敢于抨击国民党政局的昏暗腐败和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很得一部分知识界读者的喜爱，很快便由创刊时的400份上升到几万份，到1948年底国民党查封时，已经发展到10万零500份了。一个发行到10万份的杂志，在当时的出版界中，就已经是相当大的刊物了。

12月21日《观察》被查封时，储安平正潜藏在北平忙着搜集材料，准备发回一些透视这场使中国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的平津战役的文章。他有幸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但不幸的是，却连累到杂志社另外两位同事锒铛入狱。

北平解放后，他从藏身的北平城府学胡同里走出来，一下子就搬进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专门到饭店里来看望他们。使他感到特别荣耀的是，周总理亲自走进他住的房间，饶有兴致地同他谈了话。

正是在这种得意的心情下，他才一改平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的素志，而且不参加则已，一参加就参加了两个。因为两个党派都争取他参加，两边都有他尊重、交往密切的师友。他对朋友解释自己的这番举动说："两边都请，不好意思拒绝，就两边都参

加吧!"说话时,眉宇之间露出不无得意的神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之际,中共就首先想到了《观察》的复刊之事。中共党内两位主管宣传工作的老同志乔木和胡绳,专为此事写信给周总理。得到的批复是:"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复刊!"果然,11月份储安平就又当上了《观察》杂志的主编。复刊后办了一年多的时间,《观察》杂志改组成为《新观察》,储安平离开杂志转到新华书店任副总经理,1952年又改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他便常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到全国各地采访和视察,写回的系列报道不仅登载在《新观察》上,还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转载。储安平的名字在一个时期里还是挺响亮的。

在此期间内,他对九三学社的工作也确实是比较热心,因为主席许德珩是他尊敬的师长,其他如袁翰青、楼邦彦等也都是他多年交往、无话不谈的老友。他在九三学社不仅担任中央委员,还负责主编学社的机关报《社讯》。中共中央决定将《光明日报》归还民主党派主办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开会,让他们各出一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代表九三学社出任社务委员的,便是储安平。

这样看来,储安平确实是九三学社的人。

三

在北京西四颁赏胡同,我找到了九三学社,见到了一位有关负责人。

"自从打成右派之后,他便一直挂在我们这里,直到自杀时为止。"那位有关负责人对我说。

"他自杀死了?"我急切地想知道准确的下落。

"自杀过,但没有死,他被人救上来了。"

"那么说,他没有死?"

"不——"

"死了?"

"不——"

"那么,到底是死,是活?"

"怎么说呢?他被打成右派后,就回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每月发给他100元的生活费,没让他干重体力活,也没有让他按时点卯和挨训斥。总的说来,还是不错的,只是在开头两年里随着机关下放人员一起到西山农场里放过羊,干过一点零活儿。回来后他便一直安静地住在自己家里。就是他那房子,也还是学社帮助他从街道上讨还回来的。"

"他的家在哪儿?"

"厂桥棉花胡同,他一直住在那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每日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为了遣散闲暇,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只羊。红卫兵走上街头时,他被横扫出去,作为专政对象,让他拿扫帚打扫街道……"

1966年深秋的一天,储安平扔下象征扫街的扫帚,不远数十里到北京西郊青龙桥,跳河求死,不想水浅未遂,被红卫兵小将押回九三学社。当时已是深夜11点。院内临时工住的小南屋,暂借他当晚栖身。重返人间的第二天,他首先交上了检讨书,然后向小将们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儿?"最后要求把一些银行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结果是——"不行。"

于是他消失了,在10月份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的女儿回家来看他时,家里的东西被抄得乱成一团,在房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那是他从九三学社

刚背回来的。女儿找不到他，便汇报到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汇报给军代表，军代表汇报给中央文革，也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指定公安机关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组，叫他们一定要把储安平找到。调查组足足找了两年，荒山野岭，河湖港汊，这么说吧，凡是有人迹到过的地方和人迹没有到过的地方都找遍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任何踪迹。

两年之后，调查组做了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康生看到后极为不满地说："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能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样一个拿得起来放得下的人物，就这样轻轻易易地从人寰中消失了，杳无踪迹，犹如一丝清风，一缕荒烟……

"以后，他家里人再没有到这儿来找过他？"我一片痴心一片茫然地问。

"没有。"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来过，要他的银行存折。"

"他们有没有就他的问题，请你们找上级部门，要求重作结论和解决？"

"没有，这儿多年没人来为储安平说过话。"

"你们有没有为储安平问题的解决，做过努力？"

"当然没有。"

"如果连储安平都平反了，不就证明1957年反右搞错了吗？"对方非常不满地反问。

"《新观察》正在编辑创刊35周年纪念册，储安平作为本刊前身《观察》的主编，《新观察》第一位特邀特派记者，你以为可以在纪念册中提到他一笔吗？"

"当然不行。"对方态度十分明确。

我终于不得不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了。

后来,在那本装帧精美的35周年纪念册上,果然没有任何笔墨光顾到储安平身上。

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询:"请问,您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

我闻之,即发异想。

储安平消失已经20多年了,公安机关为此事专门组成了个调查组,一访就是两年,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一点点线索。看来,他也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

可是,有人听说后立即驳斥了我的论断,说:"储安平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决无这个本事隐遁20多年,不等他做什么修炼,早就饿死了!"

可是也有人说:"也不一定!他虽然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但既已出家,便自然习惯于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山菜野果,清泉甘露,也可充饥。更何况,他早有过超脱的悟性和淡泊尘俗的念头。"

我记起1957年报纸上登载的一条揭发材料:6月8日,储安平到社长章伯钧那里递送辞呈。

章伯钧问:"你的负担重不重?"

储安平答:"不重。"

章伯钧:"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我没有。"

章伯钧:"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人真的在深山古庙里皈依佛门，修身养性，以超脱物质束缚的悟性去研究、思索人生哲理、天地玄黄和佛门的种种禅宗法事吗？

这可能？

这不可能？

……可江苏的山不只一二，该在哪座峰？

山中庙宇比比皆是，又是哪座佛门呢？

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

（逸　馥　邓　加）

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师哲近影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级监狱！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这里吃尽了铁窗之苦！后来，幸存

下来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后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冯基平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个无辜的人被关进四面不透风的监狱，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这时，任凭他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任人摆布，屈辱、悲哀、愤懑一齐涌上心头，但也只能停在心头！

把我送进这高墙之内，我也并不太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坐了三年多不叫监狱的监狱。

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

1962年9月，正当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这样的会，一向是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喜讯频传的会议，我照例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组织部急电："立即派人护送师哲回北京"。省委当然照办。我心里纳闷：是调我去北京？又何须"立即""派人护送"？要处置我吗？处置我什么呢？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也得服从命令。于是，陕西省委"立即"派出秘书长"护送"我到北京。不过我心里始终是坦然的、踏实的。因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便有车接了直奔中央组织部。一向干部到此如归、倍感亲切的组织部，此时却令人窒息。他们让我坐在一间屋子里休息，门外工作人员乱哄哄跑来跑去，互相打听着"师哲到了没有"的声音，我都听得见。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还能怎样？

过了个把小时，副部长李楚离才出现在我的面前，几句问候的话之后，便陪我驱车到万寿路招待所去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安向我介绍了十中全会情况，还谈到康生在会议上给毛主席递

了个条子:“有人写小说反党”等等,接着又说明这些事都与我“无关”,调我回京,只是“为了弄清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问题。你过去接近过他们,你应该了解一些问题,你要老老实实,有啥说啥,向党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问题,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同高岗、习仲勋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部活动;二是高、习二人都干了哪些坏事;三是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哪些坏事;以及我所知道的应该向党彻底交代的所有问题。谈完后,送我回到家里。

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以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想帮助党把问题弄清楚。可难就难在我找不出坏事,但为了预防自己有好坏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坏,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脑儿交代。于是用几天时间,写了详尽的材料交给安子文。

在他们看材料的过程,我有三四天的空闲时间,我便利用这个时间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时,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因病在北京疗养(我在《披着人皮的魔鬼》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见我,十分惊讶,说我不该在此时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驻地去。当我告诉他是中央组织部调我回来时,他傻眼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诉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难言。我只呆了一会儿,他便送我几个大苹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诉我该告辞了。他送我离去时,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料这次见面竟成诀别!

不祥之兆纷至沓来,但我仍无法猜测,我能蒙受什么祸患?!

三四天过后,安子文对我说:“你的交代,领导(我立即意识到这个“领导”就是康生)看过了,但他说不行,过不了关,交不了卷(这些都是我早已听厌了的康生惯用的语言)。还要老实交代。”安子文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我能觉察到他内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己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并被发配到安徽,当他的儿子安民去探望他时,他对孩子说:他一生做过两件昧良心

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对不起师哲。我并不怪他，他又有什么能耐不执行"领导"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样逃不脱厄运。

安子文这次同我谈过之后，再未露面。过了两天，由李楚离向我宣布："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组织部再没有关系了，你的事由另外一个部门接管了。"这是在中央组织部宣布的，当时便由公安部派来的人把我接走，送到东总布胡同（原李宗仁的公馆）软禁起来。没有让我同家人告别，从此，我便从家中失踪了十几年；就在我的头上套上了"金箍"，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时紧时松，而是用"螺丝"一圈、一圈地紧箍下去的。

"唐·吉诃德"同我搏斗

自从我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那座楼里之后，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同我搏斗就开始了。三年中同我"谈话"的人总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后向我要材料的将近百人。开始时还有四五位像是高级一点的（副部长级）干部，一来到，先要表现出自己的非凡，但顶多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个较低级一点的干部，说他老早就认识我，他在统战部工作过，还参加过建设民族文化宫的领导工作，我们一开始交锋就搞僵了，经过几次折腾，他也不来了。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这次是他一个人来的，表现得非常谦逊和蔼，声音低沉。寒暄过后，他说他对不起我，要我原谅他的粗暴，因为"领导"要求他对我要严厉，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违心的。后来知道，那是他即将离开此项工作之前，来向我忏悔的。

接着来的像是一个局级干部，可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一开始也是来势汹汹，装腔作势，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势逼人。但谈不了几句话，就思路闭塞，语言枯竭，无所措手足，一副狼狈相。我讽刺了他两句："演'三堂会审'也没用，拍惊堂木更没用，

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却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苏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每次同我谈话之后，都是要向康生汇报的，然后又用康生教给他的那一套来攻击我。有一次我说：“你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时，就从他的嘴里早已听厌了，那时他就是这样教我们的，但这一套毫无用处，现在就更没有用处。还来重复这一套，岂非自找麻烦?！其所以没有用，就是因为它不科学，不实事求是。”这个可怜虫竟反问我：“在延安时你听谁说的?”我说：“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够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延安听他讲的比你在这里说的还要多得多。不过，这一套过去就不灵，现在更不灵了！”后来有一次他自我介绍说：他在延安杨家岭会见过任弼时，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遇见你这位政治秘书?”此话他在以后还重复过几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像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执行任务坚决，但是渐渐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诉我：康生教给他的妙诀是对我的每一句话，都要问个“为什么”，对每一句话都应该提出一万个“为什么”，使我永远回答不完。可是他试验的结果，自己也觉得十分无聊。于是我们常常只是对坐，沉默无言。哑戏一场又一场演过之后，他再也不来了。

向我问话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县人。他说：他从未接触和处理过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问题，“今天居然出面审查你——师哲，实在，实在……”

就这样度过了两三年，同样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实在无话可说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问题，我说：“我们已经谈了很多，谈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触及我在苏联的十五年，如果你们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愿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态，立即跑到楼下去打电话请示，一去两个多小时，转回来时则说：“今天

没时间了,下次再谈吧。"我明白了,他们同我谈话的范围是康生划定的,他们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对在苏联的一段是忌讳的(其原因见《披着人皮的魔鬼》一书)。

过了若干天,一个上午,此人又来了。显然我要谈的问题,对康生是个威胁,他自己做贼心虚,不敢让我谈。经过策划,重新限定了范围,再把他派来。而来者却以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气十足地来同我搏斗了。可惜他只不过是主子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是:要我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来往关系。我问道:"是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个人之间的关系?两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涉及到哪些问题和哪个时期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还是我国新政权成立之后?"他不能回答,只是含糊地说:"关于毛主席这方面的情况。"我又问他:"是谁提出、谁委托你们谈这个问题的?"他狂妄回答说:"审查干部对谁都一样,对谁的问题都可以查问的。"我说:"你错了。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你们都有权力、有资格审查的。"这话激怒了他,他跳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们有权审查任何人!"于是我要求他拿出中央的特别决定,而决定必须明确写清:"中央责成师哲彻底交代毛泽东同斯大林、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只要中央正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自然交代一切。"于是他们骂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听从上级"等等。我也毫不示弱,便同他们对骂起来,骂累了,他们走了。

他们用的是神经战,而我取得了主动权。对骂之后他们一连五六天不照面。我也只好等待,并准备着对付可能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攻击。

那两位终于又露面了,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一改过去那种凶神恶煞的狰狞面目,而是笑嘻嘻地向我问好,问我的健康、饮食、起居等情况,闭口不谈实质性的问题。难道我需要这些虚

情假意吗？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提出要谈。他们问我要谈什么？我已经意识到上次的搏斗，我取得了胜利，索性再将他一军。于是我说："就谈你们上次提出的：毛主席在外事方面的事情。"他们连忙声明："不谈那个问题了，此后再也不谈涉及到那方面的事情了。"我心里又好笑，又悲哀：可怜的无知的人啊，你们只能盲目地充当别人的棍棒！

高墙之内形形色色

1966年初，我被转移到太安侯街二十几号，此处也是一个独院。在这里，他们只来过一次，而且仅仅是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要求，健康状况如何等等。

在这里住了不到半年，又把我转送到学院胡同，这里是公安部一位干部住家的后院，前后相通。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即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之际。不过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便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的决定。

在秦城，我的编号是6601（即1966年第1号犯人）。这时，监狱里关押的人确实很少，许多楼房都空着。安排我的那幢大楼里空荡荡的，大约连我只有三名犯人。房间里的窗子离地面一人多高，这就是从远处看到的一排排小洞洞中的一个。

我从被软禁到关进监狱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除了精神上的摧残和压抑以外，生活上的标准仍相当高，饮食很丰富。

在这里看管我的只有一个人，此人看来是老工作人员，有经验，很老练。每天都要来几次，一会儿要我出去散步，一会儿要我去做轻微的劳动，当我做不动时，他就来帮我，人很和气，说话做事也近乎人情，有时还同我闲谈聊天。我生活上的一切要求，他大都满足了我。如我要的一个小木桌、纸张、笔墨、砚台以及

脸盆等用具，他都一一弄到了。有一天，在闲聊中我问他："你们这里关押的当然都是有罪的犯人，但把无辜、无罪的人关在这里，这合适吗?"他回答得非常妙："这是国家的需要"(!!!)又以安慰的口气说："你来了，就安心地呆着吧，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有什么要求，告诉我，凡能做到的事，我都尽力而为。"他的话对不幸者确实是点慰藉。

但是好景不长。大约 1967 年 11 月间，来了部队，实行军管，陆陆续续接替了原来的全部管理人员。进入 1968 年，听说原来的管理人员已经全部进了"学习班"。

秦城监狱虽然"掌握"在部队一些人手里，但是他们既不会管理，也不会安排工作，而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折磨人、污辱人、骂人、搞点小动作之类。他们对所有的在押人员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反革命"或"你是反党分子"。若是反驳他一句，他立即反问："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想出去?没门!"是啊，多么简单的"真理"!又是多么容易的颠倒!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人同我纠缠了，自从这些"大兵"来到，就开始了无缘无故、无休无止的无聊折磨。他们不断地故意敲牢房的门，即使在休息的时间，也要唤醒，使人无法安宁，无法休息。饭食也只有窝窝头和咸菜了。

他们似乎把监狱当做"练兵"的现场。一天午休后，来了一批人，有穿军衣的，也有穿便衣的，但从面孔上看，并不生疏，都是军人。然而见了面却无话可说。尤其是年龄大的，当军官的话很少，而是小青年冲在前。其中一个很积极，但说不了几句就词穷了，只能不断地重复那几句话，找不到结束点。时间就是这样被车轱辘话滚过去。

当"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响彻云霄时，我意识到弹片会落到我的身上。于是我自己争取主动，把我所了解的与刘少奇有

关的事，以及我同他的往来，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写了一篇长长的交代材料。交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毫无反应。过了大约两个多月，来了一批人，指责我“交代不彻底”、“避重就轻”、“没有讲到点子上”等等。我请他们提出具体问题、具体要求，他们无法回答，只是一味地纠缠、加压。我明白了，并不是我争取主动就能主动的，既然存心折磨你，还能让你主动？于是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根据他们的要求，我把已写过的“交代”又重新写了一遍，显然仍是“交不了卷”、“过不了关”。

每天来同我谈话的，全部是军人，海、陆、空，步、骑、炮，各军种各兵种都有。他们历来不提具体问题，实际上也提不出任何具体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地催逼、加压、谩骂。他们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我编造：“如何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当我弄清了他们的意图时，我反问道：“前不久你们花了很长时间，说我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而现在又说我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请问：我到底是反对刘少奇，还是伙同刘少奇呢？！”那位操着胶东口音的校级军官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并不矛盾！”真使人啼笑皆非，还能同他们说清楚一句明白话吗？！

继而追问刘少奇同斯大林的“特务关系”。我反问道：“是斯大林要收买刘少奇做特务工作吗？”回答说：“当然不是斯大林自己，而是他的特务机关这样做的。”我说：“如果你们不了解苏联，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和各部委的关系做出点推理。想一想，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的最高领导，会亲自去做收买特务的事情吗？他们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人，谁敢触动斯大林的客人？！”他们茫然了。

但是，这些可怜的人，作为他人的工具，不由他不拚命地、厚颜无耻地蛮干。车轮战没有停，只是再也不敢提问题，一味地

压、逼、催。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夏天。到了第二个夏天(1968年),他们日夜突击,轮番威逼,一刻不让休息。

我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门窗紧闭,屋内闷热,温度高达40℃以上。他们打开电风扇,只对着他们自己吹,把我置于墙角,并面墙站立,不准动。这样持续了二十余天,我的两腿两脚红肿,血液下沉淤积,血管膨胀以至坏死,脚面裂开血口,然后化脓。但恶狼般的嚎叫仍不绝于耳,既不让休息,也不让就医。这时有从"学习班"返回来的管理人员看到我的伤势严重,请来了医生。"天哪!"那位"医生"活像个"何仙姑",她站在门外老远的地方望望,问我:"你是不是害过梅毒?你这病是哪儿传染来的?这病没法治!"我要求给点消毒棉和绷带,我自己包扎,她理也不理,转身走了……

野蛮啊!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利用了愚昧,才能实现如此非人的野蛮行径!在这走投无路的日子里,我的确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江河有源　事出有因

大凡人在与世诀别之际,总要回顾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受迫害者,总要追寻到这步田地的渊源。

我在其它的回忆文章中,已经叙述过我自己种下的祸根,尤其是因为我对康生了解得太多了,所以在劫难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蛛丝马迹,我都回忆了起来——

1950年至1952年间,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一些闲话,主要是对刘少奇的意见。这些意见是说1949年开国大典时,江青匆匆从莫斯科赶回北京,为的是参加天安门的庆典,而毛主席坚决不允许她登上天安门城楼,然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

带上去了;1950年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他又不让江青到车站去接他,而在此之前,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时,王光美却到清华园车站迎接了刘少奇。还有其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都有损于诸领导的威信。我心里存不住话,实在忍不住,便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听了以后,要我把自己听到的闲话告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这就使我大大为难了,尤其因为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大部分源于江青,其中的隐情又难以尽知,而毛主席的话又不能违抗。不得已,我硬着头皮向刘少奇反映了些话,提醒他注意就是了。

1950年和1952年间,江青又有两次去苏联,一次是张国男陪同,一次仍是林莉陪同。江青作为主席夫人,苏联给以特殊的待遇——单独一幢小楼,中央联络部还派干部陪同,配有警卫随从、专门的医护人员和单独的小灶等等。

江青享受了这一切之后,又不满足了。主要是不满意她仅仅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出现在人前,而没有什么公职头衔,感到自己的身份不够光彩、不够辉煌。她为此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尽知,但我的亲闻可知其一二。

195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来了两位苏联大夫,要我立刻到主席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怠慢,可是一走进他的门,就感到气氛异常。室内一边坐的是毛泽东和江青,另一边坐的是苏联大夫和一位翻译。这位翻译我认识,是卫生部的,俄语讲得较流利。他们谈兴正浓。我立即意识到我的来临是多余的,而毛主席正以厌恶的目光盯着我。我非常尴尬,正想找个借口离开时,江青却把毛泽东拉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回来,态度竟然大变——阴转阳。毛主席只是面向着我,而且只要我替他翻译,不让卫生部那位翻译插嘴。这又使我十分窘迫,但我还是表示对那位翻译的信任

和敬重,我们共同商量着翻译。我很为这位翻译同志也为我自己难过。事后我了解到:机要秘书通知我去,只是照过去的常规办的,他不知道常规已发生了变化!

在1953年初夏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忽然质问:“从哪儿来的这个书记处的政治秘书室,又把他安在我的身旁?”这个政治秘书室是在西柏坡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它是中央书记处各秘书集体办公的单位,经常工作是为主席、副主席们处理各界、各团体和群众来信等事宜,室主任是我,已工作了四个年头。当与会者说明这一情况时,主席又说:“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大家说:“你大概忘记了。”主席又说:“我只要一个秘书小组就行了,不要那个政治秘书室。”于是当即决定另成立了秘书组,除了我以外,还是原来那班人,只是组长由江青来担任。杨尚昆受命向我传达了这一决定之后,还加了一句:“你看这老人家,大家都知道,只有他说不知道。”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却是为自己庆幸的。

接着,毛泽东专门宴请了秘书组的组长和副组长等人。这样,江青既有了官职,又有了政治地位,自然身份也提高了。但她只是挂个名而已,并未做什么实际工作。就是这样,她仍欲壑难填,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向主席提出了新的要求:送给毛主席的有关戏剧、电影、舞蹈等文艺类材料,要求由她批阅;接着又要求分担文艺活动方面的指导事宜。“文革”开始时,甚至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顾问等职。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都迁就了她。以后的发展,已是人所共知的了,不必赘述。

这里只说与我有关的事。1954年秋,江青在同一位同志的谈话中说:“要把师哲搞倒、搞垮、搞臭。”为什么却没有说,江青何以对我仇恨至此?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时,我那时既没有满足她要工作职位的要求,又不肯给

她报销一大笔没有名目的账目,为此她怀恨在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她同康生沆瀣一气,而康生是要把一切识他庐山真面目的人通统置于死地的。而最可悲的是他们当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使用。

1954—1955年之交,一次因事到毛主席的办公室里,办完事后,他忽然对我说:"你以后再到我这里来时,不要事先经过机要秘书,不要打电话通知他们,直接来就是了,我已经告诉了哨兵不要拦挡你。"天哪!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仅没有受宠若惊,反而脑子里乱蓬蓬一团,不知所以,只觉得后脊梁发凉。过了不久,又一次会见了他,他这样对我说:"你当我的秘书好吧?"却不说什么秘书,更不说是否中央决定。我推说自己不能胜任,而他仍表示坚持,说我只是谦词而已。这两次的会见,使我下意识地感到自己情况并不美妙。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又过了不多久,我到他办公室办完公事正要退出门时,他异乎寻常地走出来送我,并同我在颐年堂院子里来回踱步,他也边走边谈。忽然问我:俄语学院有多少学生? 留苏预备部又有多少学生? 我回答之后,他又问:"你不怕俄语人才过剩吗?"我听了非常诧异,因为我正承受着各方面需要俄语人才的压力。我怎能知道那么热乎的中苏关系会破裂?! 于是我回答说:"我因为培养不出足够的俄语干部,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每次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都受到冲击,这'过剩'又从何说起呢?"他看我不开窍,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只好说:"算了吧,今天不谈这个了。"

早在1950年,任弼时同志刚刚与世长辞,康生就说过:"师哲失去了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

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些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己的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于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

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 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了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话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寒问暖,问我的健康状况,饮食起居如何,也给我提供了医疗条件。有一次他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中)来到北京大学学生宿舍,鼓动学生起来造反。

们来找我谈话,谈话室本来有两个人,我进去以后,一个人离座走了出去,只剩下那位山西口音的青年。稍谈几句之后,我抓紧机会提出:"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带出去,设法转呈他,可否?"他吃惊地问我:"写的什么内容?"我说是揭发康生的。他马上回答说,他带不出去,更无法呈递上去;而且,"你也想一想,你今天所处的地位,写这样的信行吗?反正我带不出去,更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想想这中转间,会送到哪儿去?恐怕不会成功,只会招来麻烦,惹起祸端。我替你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讲得诚恳而有道理,于是我也就死去了这条心。我很感激他!

几天后,又来了另一批人,虽着便装,但仍能一眼看出是军人。他们一开口便问我的信写好了没有,信的内容是什么?我装作不明何所指。他们又说:"你不是要给毛主席写信吗?写好没有?"我说我是同一位同志闲聊时曾说过想给毛主席写信的问

题。他们又问:"什么内容? 揭发谁?"我说:"只想说说我个人的冤情。毛主席了解我,所以我想向他申诉。但并没有写成文字。"就这样算是搪塞过去了。事后我仍想起那位山西口音的同志,他提醒我是十分正确和有道理的。他是个正派人,有道德的人。我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处境,也进一层地懂得我们党和国家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

某一天,来了八九个人,似乎各兵种的都有。其中一个青年格外的积极,抢着给我说教,搬出了许多条文,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不要鬼鬼祟祟,混不过去了。"他一直在重复这句话,我纠正他不要说"祟祟",而应说"祟祟"。他回答说:"反正都一样。"还把"班门弄斧"说成"搬门弄术",再加上一些形象解释,我又给他纠正。真使人哭笑不得。

再一天来的似乎是一批老手,也很精灵狡猾。一进门就要我站起来朗读墙上贴的各种语录条幅,大都是从"红宝书"上摘下来的,诸如"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义主义,反对不实事求是、不忠诚老实、装腔作势、盛气凌人、自欺欺人"之类。我倒是很喜欢读,而且读到"反对不实事求是"之类的语录时,故意提高声音,且多读几遍。其中一人总算听出了味道,要求我说明"是给自己读,还是给我们读,让我们听?"我说:"这是主席的话,谁都得听,谁听谁不听,我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读法是给我们听的。"我说:"那只好大家都听吧。"此后,他们把那些语录全去掉了。这不足以说明那时叫得震天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货色吗?

接着,他们又向我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交代问题时,都不能涉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三人的名字和事情。过了几天,再次重申这一原则时,又变成了六个人,即加上了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强调:在谈话中不仅不能涉及他们的事,即使一提他们

的名字，都是犯罪。我反问了一句："如果你们提出有关他们的问题时，我如何答复？"他们说："不会问你这类问题的。"此后，全国十亿人口中，只有六个人受到保护，似乎进入了保险库。实际上在以后的谈话中，又不能不涉及到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遇此情况，我只好用"他"或"她"来代称，显然这就很难使他们听得明白，而他们又不敢追问具体人的姓名。这种愚蠢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渐渐地也就不再来纠缠了。

这期间，来了一批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她们的长相一个赛一个，然而她们那种无赖劲，更是一个赛一个。她们那被扭曲了的灵魂，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演。她们出言不逊，任意侮辱人，张牙舞爪，推推搡搡。够了，我想起就痛心，我们文明古国，到底造就了一代什么"新人"?!

还要说到一个文化水平极低，不懂事理，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我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

磨。一天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旅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的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城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了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了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欲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

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个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昏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

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　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大约1970年初，突然来了几个人，很神秘地要我揭发、交代陈伯达的问题，讲了很多，好言相劝。我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讲的是真话还是想捉弄我？希望你们的态度放老实点。我已经被捉弄糊涂了，被折腾够了！前不久，你们还划了个‘钢铁圈’，里面的六个人中就有陈伯达，是受到绝对保护的，连名字都不能提及，而今天却要我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则苦苦劝说，捶胸发誓说他们不是耍圈套，而是有上级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机密紧急指示。今天来，也还只是秘密调查，收集材料，在这里说的也还不能公开等等。我表示要考虑两天，待弄清问题再说，他们只好答应。我又问：“那么那个钢铁圈还存在不存在？”他们马上回答：“没有什么钢铁圈。”我又说：“你们曾经宣布的六个人不许触及，只要触及其中

任何一个人就要犯罪,还有效没有?这个罪我是犯不起的!"这使他们大伤脑筋。于是他们再次来时,把毛主席亲笔题词的复制件拿来给我看。那是几个大字和几行小字,原文已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陈伯达大闹庐山,几乎要翻天覆地,不待庐山会议开完,便不辞而去,不知所向何方。看了毛主席的题词,我答应写有关陈伯达的材料。他们嘱咐我:写好后,不可交任何人转,只要告诉公务人员,他们自己就会来取。

我当然实事求是地,据我所知,一是一,二是二地写了材料。但他们还是不断纠缠,反复"启发"我、提示我,授意我添油加醋。我说不能画蛇添足、弄虚作假。他们却说:"你只管写,不要你负责。"我反驳说:"这是什么话?!我写的材料,却不要我自己负责,那还行?!既然你们认为可以弄虚作假、胡说乱写,那你们自己按需要去编造岂不更好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正是利用了我的交代,而后加以歪曲,并编造了"中央文件",其中说:"'苏修特务'师哲检举陈伯达……"背后给我加上罪名,以加重陈伯达的罪过。何其卑鄙?!实际公开批判陈伯达,是我写了陈伯达材料的六七个月之后开始的。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陈伯达被揪出后,可以想见康生那种危哉殆哉、战战兢兢、不可终日的鬼样子——他同陈伯达的拉扯关系是永远也交代不清楚的!但是,"吾发之,吾能收之"。康生只不过大大地虚惊一场,而真正的后台却是林彪。

林彪摔死,我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但很快就来人了。来的还是那位操着胶东腔调的干部,另有二人相陪。这位干部绝对没有了以往的神气,而是一副哭丧相。看到他,我也就猜出个八九。他要我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我同林彪的关系等。我很乐意谈,于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起了林彪三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形、同高岗的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又如何经过高岗给毛

主席捎信等等。我谈得很上劲，这位干部却不耐烦，他心不在焉，听不下去，终于阻止了我的话。我十分惊讶！而他竟以十分沮丧和难过的表情说："人都粉身碎骨了，还谈他干什么?"看来，大戏快到终场了。

戏太大，尾声就不会太小。北京外语学院（前身是俄专）一批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也来"提审"我。我离开该校已二十多年，与他们何干？他们由几个教师模样的人带领，从上午就来到了。监狱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快吃中饭了，不能提审。"饭后又说："要放风，不能提审。"可怜的娃娃们就这样等着。放风后，工作人员对我说："有几个青年学生要找你谈话，但不着急，等一会儿再去。"最后带我去了，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开口就宣布"纪律"，老一套，宣布完了说："如果违反了这三条纪律，就要打烂你的狗头！"我问："谁的头?"他们紧张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你的头。"我又问："我的头怎么会长在狗身上?"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他们不敢动武。接着提了几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四、"张锡俦是怎样到俄专的?"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 1972 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二十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

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个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次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

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　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有一次他们为此事来到扶风时，正值我的小女儿明朗来看望我，她在旁插话说：“难道给毛主席做事也有罪吗？！”他们顿时哑口无言，无所措手足。啊！这就是经过风雨，见了世面的小青年！以后他们来谈话，就不许我的女儿在场。无理者却有权！

直到1979年初，一切专案统统移交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很快给我了最后的结论——“经13年审查，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监狱，泡上13年？加上前后流放的5年，共18年。18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8年？！对我个人来说，蹲监狱或许还是一种幸运，如果在外面，恐怕早就

落得同王世英一样被活活打死的结局。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和我们相同或相近命运的人还有多少？数得清吗？而实际上真正暗藏在我们心腹之中的奸人、反革命分子，只有康生、江青之类极少数几个人，怎么就会弄得人妖颠倒如此程度?！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几乎朝朝代代都不乏忠奸颠倒的事例，而“文革”则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不真正汲取教训，还可能踏上覆辙！

（师　哲）

历史谜案揭秘

谈起中共党史，人们自然不会忘记瞿秋白；经历过延安“抢救运动”的人，自然忘不了王实味。瞿秋白、王实味的遭遇，留下了太多的话题，太多的思索……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瞿秋白英勇就义30多年后，竟因为他的一篇遗言《多余的话》，在文革中被“揪出打倒”，甚至砸碑掘墓。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但《多余的话》仍然是个“谜”。虽然今天人们不再说它是什么“叛徒自白书”了，但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这至少是瞿秋白的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严重的污点罢？……至于《多余的话》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瞿秋白又为着什么目的而写？这桩近60年的谜案，我们请这位瞿秋白研究者来进行一次破译。

他是在肯定自己

初读《多余的话》，总让人感到消沉的情绪比比皆是：“留恋文学”、“厌倦政治”……简直自己全盘否定了自己！

然而，只要认真读下去，就不难发现，一涉及具体事实，瞿秋白不仅毫无否定自己的意思，某些地方反倒颇有自我辩解的成分了！譬如，他首先承认：“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路线了。”且明确表示：“这时期当然我应为负主要的责任。”但他不仅并未因此否定自己，而且反驳了当时对这个时期笼罩否定的错误看法，如“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并不是什么

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并且态度鲜明地肯定：“……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加着重号的这段话——显然是指1927年“八七会议”初期——虽仅仅一句，却包含有以下重要意思：一、“八七会议”初期，我党政策的主流是正确的。二、这一成绩是在党的集体领导之下取得的。三、并不排除与此同时也有犯有个别错误或错误苗头，等等。这段话措词准确、认识全面，其中也明显包含着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瞿　秋　白

总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顾自己一生每一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说法，都和上述例子情形类似，决无任何否定一切、自污自贬、强烈自责等意思。可以说是基本肯定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在作最后的斗争

既然这样，那么《多余的话》中那些确乎是“厌倦政治”、“否定一切”的话，究竟又指什么呢？很清楚，瞿秋白主要指的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最后这四年。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1931年初……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地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了罢。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

这些话相当蹊跷：说是“留恋文学”，这里却一字不提文学；强调“厌倦政治”，这里却专谈政治；本来就连四个月的盲动主义也有个清楚分析，决不盲目否定。这里却将整整四年——其前三年还正是他生平文学活动的主要时期——一古脑全否定了！

那么，他究竟在否定与谴责自己最后四年的是什么问题、什么错误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没有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

二、是违心地否定自己；

三、是错误地屈从了王明路线。

这固然确实只是自我谴责，但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

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

这就是瞿秋白《多余的话》强调指出的他“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

自然，这也就是“谜底”之所在。

揭开了“谜底”，难点也就迎刃而解。

譬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竟将自己痛斥为“叛徒”或“叛徒的一种”。这究竟如何解释呢？

“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

什么叫“结束了政治生活”？什么时候“结束了政治生活”？瞿秋白下面这段话，就是清楚的说明：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

显然，瞿秋白正是将最后四年没有“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看做是结束了“政治生活”或“政治生命”，从而将自己谴责为“叛徒的一种”的。这和前面提到的——由于没有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就将自己痛斥为“十足的市侩”，“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一类措辞，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奇怪”的是：整个《多余的话》竟没有一句话是公开地直接批评王明中央和王明路线的。甚至，这篇相当完整地回顾和总结自己一生的文章，却恰恰缺少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这最后的四年！也就是说，你想坚持看具体事实，真到关键处，它干脆空白，一句没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很简单，他不能在敌人狱中反对自己

的中央，所以《多余的话》中所有对王明中央和王明路线的尖锐的批评，全部是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谴责的曲折形式来间接表达的。他只能谈谈过去，谈谈自己，一切都到自己为止，至多到“瞿秋白主义——的逻辑发展”——立三路线为止。但是，我们知道，在立三路线问题上，米夫、王明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和瞿秋白同志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基本处于一种对立的观点。所以，瞿秋白无论怎么谈立三路线，都不可能不涉及王明路线的是非。

首先应该提出的是，瞿秋白“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这句话，一语就打中了王明路线的要害。在共产国际工作两年，并和米夫、王明进行过长期斗争的瞿秋白内心当然一清二楚；如果说立三路线已然是照搬苏联教条和苏联经验的话，那么王明路线就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它干脆连牌子也一起搬过来，自称为“国际路线”了；所谓“国际路线”，才是当时王是路线的原名。瞿秋白采用的“的确没有认出”“根本不同”等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王明路线实质上和立三路线一样犯着性质相同的弊病！

第二，在反倾向斗争这个当时党内路线是非的重大问题上，《多余的话》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六大决议案》在反倾向斗争这个问题上的提法是“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这和王明所谓国际路线的“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等提法恰恰针锋相对。

第三，再如王明抄袭斯大林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理论分析，夸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而造成了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的过分估量。瞿秋白就将“过分的估量革命形势的发

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作为自己认识上的错误来批评。

第四,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把苏联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责令中国革命也要按照这套公式进行——"准备大工业城市的武装起义"以"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瞿秋白则将"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有所表示"作为错误来检查。

所以,《多余的话》虽然婉转曲折,但它确实揭露并批评了王明路线的严重问题,甚至将王明路线痛斥为中国革命的"祸害"。

"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这期间,是指瞿秋白"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那段时间,即六届四中全会以前,"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最后三年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的那个"期间"。既然这样,那事关"历史功罪"的"后来",不是指王明路线时期是什么!"祸害"——不是指王明路线是什么!此文恰恰写于由于王明路线,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这决不可能是"偶然"为之。

陆定一说得好:他"心忧"的是什么?

那时,红军正在长征,还没有安定下来。蒋介石调集所有兵力,要消灭红军。敌众我寡,随时有被消灭或打散的危险。如果王明路线的统治继续存在,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他"心忧"的所在。

显然,这也就是《多余的话》的写作目的和中心主旨。

他用了魔术家的扇子

从《多余的话》那曲折隐晦、形同迷宫的文字中，切实把握了揭露王明路线这一中心主旨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这篇文章，就会有境界一新的感觉：

首先，题目“多余的话”不正是掩盖内容中“紧要的话”的吗！文章开头引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诗句，不正是启示同志理解自己“心忧”之所在，告诫同志切莫误入迷宫的重要暗语吗！

二、由于瞿秋白身处狱中，他只能通过谴责与否定自己和分析总结立三路线以前中央路线问题上的是非得失来间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祸害”。所以《多余的话》出现许多过头的自责与难解的暗语，需要一一具体分析，才能把握其真意。

三、既然是揭露王明路线这等十万火急的重大内容，故动笔之初作者就考虑了通过敌伪报刊公开发表去与同志见面的问题，作者亲手将《多余的话》交给来访记者，并两次要求代为发表，就是确证。因此，《多余的话》不仅没有任何可能触痛敌人的尖锐词句，并特意采用了“最后谈天”、“死前忏悔”之类的形式以便使敌人感到有点宣传之利的油水可捞……。所以整篇文章呈现出一种“低调”格局。

四、为了上述重大目标，作者几乎使出了自己文学修炼上的浑身解数，极力在开头、结尾加暗语，标题和关键词语上加引号，真假上捉迷藏，内容上绕圈子等办法，来极力掩护，又准确表达自己这篇最后遗言中揭露王明路线的中心主旨！

国外一位学者也有所觉察，他写道：“这是瞿秋白一篇令人惊异的文章；话既属‘多余’，又何必要说？话既说出了，那就不会是‘多余’。而话说出来了之后还认为‘多余’，即岂不是说明，作者在当时也是晓得了，说了那样的话是不应该的吗！然而终

于忍不住把明知不应当说的话也说了出来，则所谓'多余'只是魔术家手里的一把扇子罢了。"

他真诚地做了"自我解剖"

自然，瞿秋白同时也深刻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与责任。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主要错误不仅是"早就埋伏了"王明路线这个后来的"祸害"；而且在这一"祸害"为害全党整整四年期间，他个人不但没有"为党的正确路线"与之"奋斗"，反而对其违心屈从、随波逐流，成了"十足的市侩"！……

首先，所谓"早就埋伏"从道理上讲，自然是指他的盲动主义是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发轫和开端，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自然也是王明路线这一"祸害"的最早由来。

其二，尽管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米夫、王明拉共产国际之旗做虎皮，一时间几乎镇唬了全党，但对六大以来一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瞿秋白来说，则可谓知根知底，并无多少"神秘"可言。因为，当时他就团结与领导中共在莫斯科的党员不止一次粉碎过米夫、王明的阴谋发难，并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过撤换米夫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的严正要求，直到1930年11月25日《政治局关于最近来信的决议》中，以瞿秋白为首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央，仍坚持批评了王明等人"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的严重错误。但是，从1931年1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来华操纵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宗派上台以后，瞿秋白见大势已去，态度就确实转变。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不仅就"调和主义"作了检查，而且在1931年1月先后两个"声明"中，一再就王明中央对他的申斥，表示"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六四全会决议案的全部，是完完全全的拥护"。即使王明中央加予他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他也"尽量检讨，再也

不敢有任何反抗了”。别的不说，仅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宗派正是通过批调和主义、打倒以瞿秋白为首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央，才得以夺权上台为害四年的！——这一点来说，瞿秋白就无可推卸地负有第一位的责任！因此，瞿秋白的上述检讨不仅是真诚的，也是属实的。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旧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至于政治方面，则明显留下了一个空白。瞿秋白的上述检讨，就算是对这个空白的一个坦诚的补充罢。

他留下了靠得住的手迹

《多余的话》至今还没有找到瞿秋白的亲笔手迹……如上的“研究”、“论述”……靠得住吗？

靠得住的。首先，《多余的话》的确凿存在并无疑义；它的亲笔原件，也先后有多人见过。尽管现存的敌伪抄件，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任何讹误或篡改，但我们仍然不难证实《多余的话》就是这样的写作目的和中心主旨。因为还有瞿秋白的另一亲笔手迹可以作为确证。这就是《瞿秋白致郭沫若信》。

此信同样强调：使他“惭愧”不安的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当我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之后……”“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并将这一错误置于坐牢杀头个人生死之上的重要位置，作为“历史功罪”的大事……

《致郭沫若信》短短二百多字引文，简直就是《多余的话》那两万余言的准确缩影！

此信就写在《多余的话》完成之后的第六天——“1935、5、8”，同样写于“汀州狱中”；不仅和写《多余的话》是同一条件、同

一时间,而且是同一内容、同一目的,就郭沫若与党的关系而言,还是同一对象!这不仅和《多余的话》是一样的中心主旨,一样的曲折手法,而且一样地采用重于个人生死和事关历史功罪来强调自己揭露王明路线的中心主旨!这许多“同一”和“一样”充分证明:我们给《多余的话》所做的结论,不仅符合《多余的话》原文是正确的,而且符合瞿秋白《致郭沫若信》、符合客观事实,是真实可靠的。况且,他在这封信中也明确暗示:“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大量披露出来”,即暗示他在《多余的话》中大量披露了这封信里所强调的揭露王明路线的中心主旨呢!

这是瞿秋白同志亲笔手迹的确凿事实,是无可置辩的铁证!

为此,揭露王明路线——不仅应作为《多余的话》的中心主旨和写作目的确定下来,而且也应当作为瞿秋白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事实或历史行为而确定下来。

瞿秋白能够如此清醒地披露隐患,评断自己,预见未来,并正确坚信这个“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当死,则毅然赴死!该做,则死也要做!的确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耿耿赤诚和英雄气概!

瞿秋白烈士就义以来,中央曾多次了解他被捕以后的这段历史,党史工作者也曾先后写过一些文章,介绍他被捕以后的英勇斗争,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力争获释、粉碎劝降、英勇就义——十二个字。

其中就是《多余的话》有些疙瘩、矛盾,难以理解。现在这个疑团冰释,只要再加四个字,——力争获释、揭露隐患、粉碎劝降、英勇就义——就不仅事实清楚,道理也明白了。

(林　勃)

《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
——瞿秋白当年战友谈瞿秋白

从《诗经·黍离》说起。

中国古代的西周末年，周幽王姬宫涅这个昏君度过了11年的荒淫生活，结束了西周王朝。周平王宜臼东迁洛阳，周朝就式微了。《诗经·王风·黍离》以比兴手法记叙了这段故事。

《黍离》以种庄稼比喻政治上的忧患。原诗意译是：

那沉甸甸的谷子、粟子吐露黑黝黝的苗苗，
我徘徊其间觉得心神摇摇；
知我者，说我心忧宗庙被颠覆，
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
遥远的苍天呀，
这是些什么人呵！

那垂垂的谷子、粟子绽放出秀穗，
我徘徊其间觉得迷醉；
知我者，说我心忧宗庙被颠覆，
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
遥远的苍天呀，
这是些什么人呵！

那垂垂的谷子、粟子结成果实，
我徘徊其间心噎气窒；
知我者，说我心忧宗庙被颠覆，
不知我者，以为我有所求。
遥远的苍天呀，
这是些什么人呵！

瞿秋白在就义前夕忽然想到这首诗，这不是一个“文人”的顺理成章的癖好，恰恰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的哀思。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显露了国家的危机，外侮频仍，人民苦难，革命受挫，苏区被毁，红军被迫“长征”。从某些现象上比拟，“彼黍离离”，倒像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嚣戾，“长征”也许类似“宜臼奔申”，欲觅一栖息之地。而后，是否能借“犬戎”之力杀“幽王”[①]，或东迁加入“春秋战国”行列，这是后话。当时瞿秋白在缧绁中是难以推断的。但他的确忧心忡忡，为整体安危着急，而并不以个人生死为念。他之所以选用《黍离》诗篇为引子，意在惕励人们记取历史教训，不仅如此，而且暗示有更大的忧患隐伏着，危害至大，但又不能明言，所以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来导读《多余的话》。这最后绝笔是呕心沥血之作，用心良苦也。为了客观地公正地促使人们理解和信服《多余的话》的内涵，作者先坦直地自承过错，期望读者举一反三去思考问题。他用“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等主题作负疚的检讨，通过自

① 幽王宠幸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儿子伯服做太子。宜臼母亲是申侯女儿，宜臼奔申，借犬戎之力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亡于犬戎，平王靠诸侯援助，迁洛邑建立东周政权。

检作历史的反思,其结论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他忧心的是米夫、王明、博古、张国焘这帮野心家。

长征甩下了瞿秋白,这是王明博古一伙人有意借刀杀人的阴谋暴露。表面上,当时是所谓“三人小组”(博古、李德、周恩来)的高层决定,由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其实是“二十八个”宗派秉遵其上峰意旨、及其扈从们的卑劣心态所构成(当时正直的人如吴黎平、陈毅等觉得惊诧,但无力改变此项决定)。其时,苏区已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中,明知覆巢之下无完卵,而瞿秋白被硬性命令留守,并责成排练什么话剧,似乎是要他扮演空城计(其实是曹操杀弥衡的重演)。领导者们却纷纷乘骑坐担架走了。

瞿秋白知道,他在“八七会议”的“过火”,与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结怨很深;在莫斯科处理学潮时,与米夫、王明一伙意见相悖,动摇了米夫的权位,被这伙人仇视,欲置之于死地。还有,其他的人忌刻等等。长征前夕被弃置陷阱中,这也是必然的。瞿秋白个性淡泊,豁达不计恩仇,他无求于人,他毫不抗拒地服从了留守的决定。也不提任何要求,甚至缺少油盐和照明的蜡烛,他就淡食和早眠。一清早起来,还是和一群天真的青少年排练话剧。他是以此为醉来麻痹自己。在他当时思想里,可能是将革命原理与儒佛之道混为一体,而后化解成:“为党牺牲最光荣(儒说:“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与旧传统彻底决裂”(佛说::“躯壳解脱”)。这是瞿秋白当时被置于死地的逆来顺受的情状。

被捕后,更接近了死神,瞿秋白心神烦忧了,不是恐惧个人的生死,是忧心忡忡的关注着党的安危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忧患。他心忧的是“此何人哉”那批人。开始,情绪有些低沉,写了《卜算子》《浣溪沙》等诗词(“眼底云烟过心时,正我逍遥处。”“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年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继而又回想读过的六部小说,其中就有“多余的人”的影子。后

来,从历史的反思想到:幼年的党及其脆弱的领导、路线的错误、指挥的无能、干部的盲从、群众的彷徨……事事处处都有忧患。其中也包括了自身的过错和失误。身处囹圄,心急如焚,于是,想到《黍离》诗篇,写下了《多余的话》。这是写《多余的话》的历史、社会、思想的三条根源。

标题为《多余的话》,其背景很简单。即:作者是"被拉出了队伍的人"。瞿秋白早年喜爱俄罗斯文学,曾有"六年的文字因缘"与耿济之等从事俄国文学译作,读过不少有关"多余的人"的作品(例如屠格涅夫的《罗亭》,冈恰罗夫的《奥勃洛摩夫》,普希金的《奥涅金》等书),他也时常以"多余的人"自况,在狱中以双关语写《多余的话》,这是很自然的。

用什么格调来写"最后的坦白的话?""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首先想到了"知我者……不知我者……"为引子,坦荡的"自我分析",委婉地说清"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排除"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但是,有许多事不能在班房里剖白,特别是触及敏感的理论争议、失败责任诉属、今后任务与现状等等大事,不能平铺直叙的公式化,文字必须曲折的含蓄,于是《多余的话》写成了幽默的散文,它有哲理的隐喻,又是史实的剖析,它启迪读者理解了历史真相。

《多余的话》以自我批评的方式,隐喻党内宗派活动与权势之争的危机。例如"历史的误会":瞿秋白表明自己从小就无意从政,也无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由于家境贫寒才考入免费的俄文专修馆。又因偶然的机遇,当了翻译,在特定的环境被推上领导地位。乍一看来,这像一篇文学作品,瞿秋白为什么要写这类乎"辩诉"的文字?原来,就是因为他当了"领导"引出了事故,他不得不最后说说心里话。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

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觉得好像是拆台……"这是指1927年"八七会议"。这个历史原因竟铸成一股不共戴天的仇恨，就是与领袖欲强的人从此结怨，其中特别是张国焘。因为"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机会主义，张国焘亟想取代陈独秀。但是，瞿秋白传达共产国际电令和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决定：开革了张国焘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因为他在"南昌暴动"中违反了党的决定。张国焘大发雷霆，迁怒于瞿秋白，从此结了怨恨。瞿秋白谦恭地说：组织决定如此，但仍希望你以丰富的老经验，随时匡正中央的不足之处。当时因"南昌暴动"失败，国民党正紧急通缉张国焘，瞿劝告张暂时隐居，以保安全。张愤怒地自汉口去上海，专访陈独秀，鼓动陈另组"工农党"对抗中共。后来因为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陈独秀不愿出席，张国焘策划的"工农党"也就未实现。

这是《多余的话》中写的"历史的误会"的写作背景之一，其次，是1928年7月在中共"六大"会上，瞿秋白被拉下马，并被软禁莫斯科不许回国，这也是写作"历史的误会"背景之二。这时米夫、王明一伙人搞宗派活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嫉恨瞿秋白，把他看成阻碍篡党夺权的绊脚石。这期间，米夫和王明、博古一伙勾串了张国焘、向忠发等扮演闹剧。张国焘则觊觎总书记权位，满以为投效了米夫，把瞿秋白拉下马，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因为，陈独秀不出席"六大"，就等于放弃选举权，不能再为冯妇；李立三有湖北省总工会的错误，周恩来对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应负责任；蔡和森是宣传机会主义的第一责任者；张国焘自以为与米夫有了默契，按照"六大"预备会上布哈林示意他张国焘可当仁不让，以老资格稳坐总书记的宝座。

不料，米夫计高一筹，一切部署完备，最后亮出尚方宝剑：新中央名单不是由上届党委提名，而是从米夫口袋中掏出的，并指定向忠发为总书记。理由是：要工人成分领导(向是武汉江面上的船夫)。张国焘被指定陪同瞿秋白留驻莫斯科，互相监督，不准回国，理由是担心他们回去后各建“山头”。张国焘的旺盛领袖欲火给浇了一瓢冷水，金色的美梦破灭，由此更愤恨瞿秋白，觉得受了牵累。

张国焘由于嫉恨瞿秋白，在受命监视瞿的时期，不断向米夫汇报：瞿秋白、杨之华与鲍罗廷交往频繁，常到鲍家串门，鲍也赠送内参的每日电讯给瞿(还说瞿与德共右派头目密谈，有反国际倾向)；最后又自告奋勇，扮演“蒋干盗书”，自愿深入中大同学中去摸底，和杨子烈(张妻)一同去查究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内幕。《多余的话》写历史的误会，部分原因就是针对张国焘的解剖。

瞿秋白凭书生气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库西宁提议换米夫的中国部长，请以鲍罗廷接替。这件事使米夫、王明一伙切齿拊心的痛恨，结了深仇。瞿秋白不考虑鲍罗廷和其他几个从中国回来的“国际代表”都先后打人冷宫，兔死狗烹，或是做了替罪羊，不久都销声匿迹了。鲍罗廷以后也不例外。米夫当时却是斯大林信赖的“中国通”，这个提议是不明智的，反而授人以隙。

对于米夫的“老子党”的作为和共产国际的“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瞿秋白早已心忧。在王明路线篡权的四年中，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瞿秋白痛心至极，作为一个“被拉出了队伍”的人，只有“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了！

1930年，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与周恩来没有按米夫的指示彻底清算李立三，没有把“新干部”(二十八个)推

向前台。米夫的宗派活动没有得逞，大为恼怒，他亲自赶到上海，于1931年1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博古一伙扶上领导班了，开革了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加扣一项“调和主义”的帽子。这就是《多余的话》中写“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的来由。

瞿秋白从不诿过于人，他坦荡的自承错误，主动检查了“八七会议”以来左倾盲动的错误，举例说“广暴”失败后还认为革命形势也继续高涨，作了错误的指导。“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以我个人而论，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

这一段“自我分析”很值得深思。

有关“三中全会”的情况，《多余的话》也坦直地说明未能按米夫意图执行的错误。

“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都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提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和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其实，这段话是流露了与米夫国际路线的抵触情绪。“派别观念”表明中共基层同志抵制王明、博古等的事实。“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换言之，李立三执行的就是国际路线。但是瞿秋白又缓和的解释说：“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的逻辑的发展。”

对“调和主义”帽子，瞿秋白也一肩挑，使周恩来轻松地过了

关，但是，米夫十分恼火的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和实际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也就是未按他的叮咛指示把王明、博古捧上台。原先，以为瞿秋白在莫斯科软禁了两三年，在张国焘形影不离的监控下受尽了各种折磨，精神萎颓，病骨支离，如今放回中国，在周恩来陪伴下，一定会在“三中全会”上乖乖地执行米夫指示，驯服地完成使命。岂料放虎归山，竟敢如此悖逆！米夫、王明一伙决意剪除瞿秋白。这就是“四中全会”先开革，“长征”时指令留守，然后假手国民党屠刀杀之泄恨。

借刀杀人的先例不止一二例。王明在新疆诬陷俞秀松、董亦湘等被杀害是一例；“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雨棠等反对王明路线，认为“四中全会”是非法的，有几十个人抗议，结果被告密遭逮捕，在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23人被判刑。瞿秋白之死，也是这一条黑线贯串的。

总的一句话，《多余的话》的是一篇心忧书。它坦荡的“自我分析”，承认错误，却隐去了“别人”的一切是非，更没有亮出背景人物的脸谱。在“脆弱的二元人物”中写明：“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就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这意味着甘愿承担一切罪错，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某些领导人的颜面。即已身为死囚，自愿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而献身，捐躯就义，也为了促使以后的青年吸取历史教训，免蹈杀身之祸。

对《多余的话》评议不一，有些人不了解瞿秋白的品德秉性，不知道写作《多余的话》的背景，更不懂得他苦心孤诣的隐衷，包括他的亲近友人在内，大都是信笔所书，说《多余的话》是什么什么，凭一己意念下结论。有人说它是坦白交代，有人说它是揭发什么，有人说它是忏悔录，甚至有人说它是殉情的葬花词等等。我想，秋白在九泉有知会哈哈大笑，他一定会再告诉你：“中国的

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

但他还是预料地说:“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

(陆立之)

延安谜案: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50年前,在延安,发生过一桩冤案——王实味案,曾经轰动一时,震动了延安和一些根据地,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人的注视。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后,知道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了,大为震怒,曾厉声说要还他一个王实味。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人仍对此案颇为关心。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王实味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

平反决定

王实味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这三顶帽子都是在1942年戴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近10年来,终于逐个得到了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82年2月作出决定,否定了所谓"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

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在有关"王实味"的一个注释中,公开宣布:"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个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是由公安部作出决定予以纠正的。公安部在1991年2月7日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 实 味

王实味被错定为"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结论，原来是1942年10月23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常委会作出的。王实味坚决不承认。同年底，他被中央社会部康生下令逮捕。拘押期间，对他与托派关系问题继续审查。他反反复复，有时被迫承认参加了托派组织，有时又翻供否认，公安部决定中说的"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是指中央社会部在拘押审讯王实味期间再次作出的决定。现在事实证明，这两次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王实味在被错误处理49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完全平反昭雪，终于恢复了对他的"同志"相称。不幸的是，他被错误处决，离开人世，已有44年了。

冤案是怎样造成的?

王实味的冤案是1942年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发生的。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培养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是范文澜。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临走时委托李维汉代他照管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在张闻天离职期间,李维汉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最高负责人。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他的笔名。河南潢川人。1906年生。1923年中学毕业后,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读过1年书,因此英文的底子比较好。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他写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法国作家都德的《萨芙》等。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开头在艺术学院教书。不久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论丛》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翻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其中两卷半。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那时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级,王实味由于在文学和翻译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被任命为特别研究

员。当时中国文艺研究室的主任是欧阳山。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整风开始后,王实味于2月17日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4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3月13日和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说什么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王实味的这些错误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引起了思想混乱。

中央研究院在3月18日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讲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几点意见:讨论整风和检查工作分开进行;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这是针对许多人认为只着重检查领导说的);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院长、秘书长及各室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等等。王实味对李维汉的意见带头反对。他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反对

指定一部分人为当然委员，主张全体委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还写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出"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还提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王实味这些错误言论，在中央研究院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有很多青年研究人员表示同情。《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在小册子前面加上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召开全院的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从会议开始，康生就插了手。更准确地说，是抓了领导权。康生原是王明的副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1937年从苏联回国，193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共

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整风开始，担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受中直机关总学委领导的，康生就当然成为上级直接的领导人，他说的话就成为代表总学委的“指示”。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了反王实味的斗争会。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有些同志还是把王实味问题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过了4天，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说他“不单是思想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到第6天，有几个同志发言，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于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凡西、陈清晨（陈其昌）有过来往，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是王实味自己向党组织交代过的）。由于这些揭发，反王实味斗争迅速升了级，成为“托派思想”，“敌我问题”。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把王实味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了。在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李维汉发言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说：“支配着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仍抱着“挽救”的态度，声明：“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可是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在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就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会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帮”，常说“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过：“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反王实味斗争结束之后，他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他用“打迂回”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淇）夫妇

与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他们一起到中央研究院来看望过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和宗铮隔壁的窑洞，他们又一起看望过王实味（王里曾与王实味在河南相识）。此后，他们有过几次来往，在一起吃过饭。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5人的关系说成"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党委派人分几处去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又于26日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实际上是破坏党的错误"，他检讨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他要求把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视"托匪和敌特、国特为一体"，至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

康生对李维汉是不满的。1942 年 9 月，李维汉被调离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在此以前，中央研究院反王实味斗争是他领导的(虽然上面还要由康生决定)；在此以后，他就再没有过问了。

复查是怎样提出的?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持抓紧完成。"

中央组织部也明确提出："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哪一级定的；也不管是什么时期、哪一次运动定的，都要统统甄别、平反。"这里说的第一个"不管"，是指那些曾经由毛主席等定案的案件；第二个"不管"是指不仅"文革"中的错误要纠正，而且"文革"以前"四清"、"反右"以及解放前历次斗争中整错的，也都要纠正。这就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打开了大门。

为王实味进行复查，是李维汉在 1981 年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来的。李老此时已届 85 岁的高龄，在"文革"中惨遭"四人帮"和康生的迫害，身陷囹圄达 7 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才恢复自由。他在狱中身罹重病，此时尚未痊愈。他在完成当时党中央委托给他的任务之外，倾注极大的心力于整理和撰写回忆录。他要把自己的一生的重要革命经历作一番回顾，写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交给党。他说："这是我一生为党作的最后努力。"

李老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会员，

与周恩来一起在欧洲参加过建党活动，与瞿秋白一起在“八七会议”后的革命危急关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之一。他写的回忆文章，记述了他从1918年到1964年46年的主要革命经历，以写集体的活动为主，适当地联系自己，在写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时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些回忆，在李老生前，只零星地发表过几篇，没有来得及全部问世，在李老去世后，由专门成立的编辑组编成一部《回忆与研究》，分上、下两册，在李老诞辰90周年的那一年——1986年，才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这是供后人学习和研究党史的一部珍贵资料。

在李老的回忆录中，有一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讲到反王实味斗争的经过和教训。文章的最后一节：“一个悬案”，提出了王实味错案的复查问题。此文是李老在1981年定稿的。在1984年7月出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在1986年4月出版的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都收入了这篇回忆文章，但因为当时王实味问题尚未平反，都把最后这一节删去了。现将这一节全文照录如下：

一个悬案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近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组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来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和同志负责，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

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在写此文的同时，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问题的报告。

李老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征求过李言的意见。

李言，在1942年斗争王实味的时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机关党委书记。此时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他回忆说，早在1942年4月间，康生就派人找他，要他写一份关于王实味日常表现的材料。来人要得很急，要马上写好带走。李言顾不上中午休息，赶写了这个材料。他当时认为王实味发表了一些有错误的文章，说了一些错话，是思想问题。为了想说明未发现王实味有什么政治背景，就在最后写了一句："王实味的这些言论是在没有什么外界诱逼的情况下自然流露的。"因为写的非常匆忙，把"自然流露"写成了"热情流露"。过几天，康生叫李言参加中央社会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他说："什么'热情'？是反革命的'热情'！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哪里去了？"李言回忆了这件事情之后说，康生在这次会上已肯定王实味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他不知道当时给王实味定的罪名有什么根据，因此很同意李老向中组部的建议。

李老还就这个问题征询过我的意见，同我商量过。我此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研究生院的工作。1942年，我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室主任是艾思奇。整风开始后，临时调到院党委帮助做宣教工作。我到

院党委工作的第一天，就在全院研究人员中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对王实味错误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95%。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小视的问题，应当做细致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开座谈会的前一天，李言授意要我带头发言，指出有极端民主化偏向的人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他的错误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我说："我看不能这样提。"反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总学委。"我理解是康生。我就说："我刚来党委工作，如果这样发言，别人会误认为是党委的意见，会把方向引偏的。"李言接受了我的意见，他找了另一个同志发言。在第一次大会上，这位同志按照授意发了言。当时许多同志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想法，有好几个同志发言表示同意。在第二次的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从组织上说，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我觉得会议这样开下去不好，就找李言提意见，同时耐心找王实味谈话，希望他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家对立、僵持。经过三四次谈话，王实味哭着对我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于是在开会的第四五天，我就找李言谈，对王实味问题，应该明确作为思想问题来讨论，耐心地开导他，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李言听得很认真，神情很严肃，一言未发，未置可否，看来他是在考虑我的意见。隔了一天，李言找我，严肃地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他说，王实味是双料的，不仅是托派分子，还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在对敌斗争中，绝不能丧失警惕。"我问："有什么证据吗？"李言沉思一下说："有证据也是上面掌握的，不能告诉我们。"我想，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又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总不会凭空乱说吧。但是我又想，我在到延安以前有过好几

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坐了5年牢，同特务、叛徒、托派斗争过，怎么我看王实味总不像是个坏人呢？最后我按服从组织的原则相信了康生的话。在“文革”中暴露出康生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刽子手以后，我痛心地感到这个家伙在党内不知做了多少坏事！因此，李老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现在应该到了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的时候了。

1981年7月，是延安中央研究院创建40周年。在京原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开了个座谈会。有好几个同志提出，应该对王实味问题进行复查。李老表示，他正在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为王实味复查的建议，他会负责协助中央组织部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

曲折的过程

中央组织部在接到李老的建议以后，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中说：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与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王实味的“托派分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

托派分子王凡西在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4年7、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复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1985年，王凡西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声称要"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乃至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王凡西说，他和王实味原是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后来，王实味与党失去了联络，同支部的几个人也都失散了。1930年春天，他在上海遇到了王实味，大约有1年时间，来往不到10次。同他们来往的还有陈其昌（陈清晨），也是北大同学，还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此时王凡西和陈其昌都已加入托派。他们同王实味谈过托派的观点和主张，王实味同情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此时王实味已同刘莹（也是北大同学）结婚，生活十分困难，靠写作和翻译小说得来的稿费维持生活。王凡西正在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一本托洛茨基《自传》，约王实味翻译了书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说"……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句话作了说明："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王凡西文中还说：“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些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我是在1986年看到这篇文章的。我认为，王凡西在1985年写的这些话，与王实味在1941年向中央组织部的交代是符合的。这可以消除了对王实味平反的一个“障碍”。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两册）要出版。在下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个地方提到了“王实味”。编注者要加个注释，向我调查，与我研究。最后他们又反复查证，在该书“注释486”中是这样写的：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此书在1986年8月正式出版。我认为，这对于强加给王实味的“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这顶帽子，是个公开的摘除和平反。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一直想着，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李老临终的嘱托，常萦绕在我的心头。李老和李言都离开了人世，过去他们尚未做完的事，只能由我来完成了。因此，在我看了王凡西的文章以后，接着又读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那条注释以后，就以按捺不住的心情，在1986年11

月，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个报告，再次提出为王实味"托派"问题平反的申请。在报告中，我还建议把从批判王实味，直到"文革"批判"三家村"的经验教训作个总结。可是报告上去几个月以后，因故又被搁置起来。

1988年3月4日，我再次写了报告。5月13日，中央组织部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报告已经批转到公安部，因为王实味的档案在他们那里，并说中央组织部将协助公安部做好复查工作。

6月30日，公安部派了两个青年同志找到我谈话。我们集中谈了对复查王实味"托派"问题的意见。我并把李老写有《一个悬案》的回忆文章的油印稿送给他们一份。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很积极，其中一位年龄稍大几岁的同志说，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王实味，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看到我写的报告以后，又听了我的谈话，回去向上级汇报，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认真调查清楚。此后，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能够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的线索都调查到了，到年底写了一个复查报告。此后又因故搁置了一段时间，到1991年2月7日，终于由公安部作出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个决定。

至此，王实味在蒙冤49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政策，也终于在王实味问题上得到了落实。

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之时，他的夫人刘莹同志已届85岁高龄。公安部派了两位同志前去看望她，把《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送给她，向她表示道歉和慰问，并送了慰问金1万元。她看到《决定》上对王实味恢复用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坚决不收慰问金。后来她把慰问金捐赠给当地(湖北省十堰市)文联，作为对青年文学奖金基金的一部分，以此作为对王实味的一个纪念。

告慰关心此案的人们

王实味问题，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得到了不少人的关心。

也许因为我写过一篇题为《斗争日记》的文章吧？这是1942年5月27日到6月11日延安中央研究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日记，曾经在当年6月28日和29日两天的《解放日报》上连载，后来流传到各根据地，流传到大后方，建国后又流传到国外。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近几年来，为王实味问题，采访我的人，询问我的人，写信给我的人，很多。

当年在延安参加过反王实味斗争的很多同志，都十分关心为王实味平反这件事。1987年，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医院里，见到了老作家刘雪苇同志，他也在住院。我们几次谈起王实味。他对我说："在当年的斗争会上，我是第一个揭发王实味有托派思想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后来那样的结果。希望你一定要把为王实味平反的事促成。要不然，我死了也心里不安。"

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也有不少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人，问我这件事。我至今仍保存着几封信。其中有一封信是1988年7月收到的，信中说："最近阅读李维汉老的《回忆与研究》，……可感受到，李老是个非常正直诚实的人。不知给王实味平反工作为何还不能落实？但我想，在你们这些身历其事的老一辈的努力下，事情总有个正确的结果。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我在盼望着这一天。"

王实味的夫人刘莹和女儿、儿子，也都和我多次通过信，见过面。我深深理解他们"心中的痛苦"。刘莹在1988年写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已是82岁高龄的人，身体日渐衰弱，希望在

我有生之年早日看到王实味得以平反昭雪。"

有些外国朋友也关心王实味的问题。1984年，我接到过一位中文名字叫刘慕实的美国朋友的来信，他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我在《斗争日记》里的一段话，为此征求我的意见。在1986年和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阿普特教授两次来我国访问，也都同我谈到了王实味的问题。

我还看到过一些报刊发表的论文或提及这个问题的文章。为什么王实味这样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件事，至今还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我认为，这不是只对一个人，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我们党能否真正实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关心，是反映了人们对我国政治改革事业的关心。

我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温济泽）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张家口市饿殍月达一千余人。原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的市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实事求是，敢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彭德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撤销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公共食堂，提倡和人民公社相对立的包产到组等等。为此，惹恼了中央领导，毛泽东主席点名批他是“胡”开明，使他沉冤蒙难16年。但是，当地人民的心碑上却刻下了：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所写达一历史往事，虽然读来令人心碎，却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牛尾巴到底长在什么地方？

1959年9月下旬的一天，河北省委派往张家口指导整风反右的工作组，急匆匆地搭上北去的列车。

打从上车起，工作组的两个头头，纪委书记裴仰山和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很少说话。特别是胡开明，一反开朗、随和的性格，阴沉着脸，好像有什么心事。

确实，胡开明脑子里想起了不久前结束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然而，却采取了与以往会议不同的开法。首先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彭德怀元帅在

庐山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让大家看。至于这封信是对是错,却没有讲。这似乎是一份考卷,在考河北执政的这几十名领导干部。

紧接着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上,印发了张家口市委书记葛启的《葛启右倾言论集》,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进行批判斗争。16日,省委全会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指责葛启从今年1月开始,"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省委直到中央,进行了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这种攻击延续到7月,葛启同志在《大海陀》公开发表文章和在市人民代表会上的讲话,达到顶点。"

胡开明又取出葛启的这两篇文章。其实,这两篇文章他都看过了,此时,他又怀着沉重的心情读了下去。葛启在为理论刊物《大海陀》所撰写的署名评论《坚持社会主义,认真改进工作作风》中这样写道:"……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在谈到集体和自由问题,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日趋集体化,自由是越来越多,决不是越来越少。"

在市人代会上,葛启针对某些新闻记者一味猎奇,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新闻的恶劣倾向,辛辣地讽刺说:"他们认为,说牛尾巴长在屁股上没稀奇,非要说牛尾巴长在牛脑袋上才有新意。"没错!这是葛启写的,一句一段都体现了他敢说真话的精神。在葛启受批判的时候,省委就酝酿从省里选一个人出任张家口市委书记。胡开明作为省常务副省长,参与了这个酝酿。而最后出乎人意料的,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去接葛启的班。

看来胡开明是逆时针思维的,人们似乎都不理解他的这举动。他和林铁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居然说服了这位在

河北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书记。

胡开明在张家口工作过多年，1945年8月我军第一次解放张家口，他就在《晋察冀日报》社任副社长，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他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政协副主席。1952年，留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半年后，调往河北省委工作。这次他要求重返张家口，将是三进塞外山城了。从胡开明的潜意识来说，他认为，面对即将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市委班子出了“问题”，自己原是察哈尔的干部，对那里是人地两熟，自己去张家口实地主持这一地区的工作，全面调查研究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说得土一点，他要去看一看“牛尾巴到底长在什么地方”！

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已经伴随着自然界的寒风席卷着塞外的张家口地区。胡开明一到就在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只过了几天，他就顶着寒风，来到了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元帅县”——张北县。

张北县正在反右。他一下车就见到了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胡开明一进县委宿舍，一眼看到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他高兴地喊：“老刘！”没有料到，刘文达竟然扭头就跑，一直进了里院的一间房子。

胡开明生气了。哪有这样的下级，他“咚咚咚”追过去，一推门，里边插着，他伸出两个拳头，擂起门扇来。

门开了，刘文达垂着头站在门边。

胡开明气冲冲地问道：“我是狼？是老虎？叫你不应，喊你就跑，搞什么名堂？”

刘文达抬起头看了看胡开明，哭丧着脸说道：“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话刚说完，就嚎啕大哭起来。

胡开明余怒未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见人哪？你说说，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我刚调来，情况也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胡开明从刘文达屋里出来，又去找张文光，也是他熟悉的一个老部下。正在县里主持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他，"张文光组织右倾反党集团，已被隔离审查。"

"你组织了右倾反党集团？"胡开明开门见山问张文光。

"是的。"

"有什么事实？"

"原来是县委领导订粮食生产计划平均亩产400斤，我说在坝上地区根本做不到，同时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我又降低了他提出的指标。"

"就这些吗？"

"我们三个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

"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平均超不过一百斤。"

他又来到海流图公社。副书记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干部。

"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开明问他。

"人家说我胆子小，不敢放卫星。"

胡开明突然袭击，看了几个"高产"社队。

镜头之一：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人们一口汤，一口土豆。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

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产量。

镜头之二：

大圐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几乎无存粮。而按上报的"卫星"，这里的粮食早已成十倍地超出了库房储存的能力。

镜头之三：

狼窝沟村一户社员，孩子饿得直哭，母亲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却挤不出一滴奶水。

难道这就是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获得表彰的典型县？

张北县地处内蒙高原南缘，古长城以北，平均海拔1500多米，丘陵起伏，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温度高寒，无霜期只有90天左右，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55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亩产平均达到100斤左右。

然而，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张北县的主要领导在左邻右舍放"卫星"的影响下，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狂热口号。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北气候寒冷，条件恶劣，这个指标达不到。但县委却发动全县展开了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大反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只要看看墙壁上的标语，就能看出反右倾的"成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

"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

为了实现"元帅县"，张北县和其它县一样，做了很多"左"得可笑的事情。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捉毛毛虫，为的是煮肉汤追肥；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丰产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

1959年10月，中央发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民，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其实，这一年的粮食亩产只有110斤。翌年，张北县就闹粮荒了。然而，骑在马背上的"元帅"却下不了马。

像这种一方面大跃进、放卫星，一方面闹粮荒的怪现象又何止一个张北县，一个张家口地区。毛主席视察徐水县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而实际上，徐水人民第二年春天就开始吃糠咽菜了。山东给毛主席看了亩产4万斤的水稻田，亩产5000斤籽棉的棉花地；河南给毛主席看了亩产25000斤的玉米，亩产30000斤的烟叶。江苏给刘少奇委员长看了亩产10000斤的水稻，都受到了赞赏。真有点"一级骗一级，大家都骗毛主席"。张北县要是比起来，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呢。

这就是那个从上到下都"发高烧"的年代。

胡开明满腔的愤怒和焦虑。情况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全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很多社员还没有一件像样的御寒棉衣。"死宝变活财"，"砸锅炼铁"，搬空了人们家中的什物。浮夸风，高指标，使国家征购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二百多万人民生活没有着落。

"牛尾巴安到牛头上才算新闻。"这句葛启的"反动语言"，此刻却那么强烈地震撼着胡开明的心。

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他阻止不了，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

发动的全党、全国性的大运动。但是,他又不甘心这么无所作为。几经反复思考,他毅然拿起电话,要通了市委书记解峰。

胡开明先是平和地叙述他在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他告诫自己,“刚刚来,要小心,要谨慎!”不过,他毕竟没能控制住自己。当他说到很多敢于讲牛尾巴长在牛屁股上的同志正在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时,他激动了:“老解啊,下边的反右倾再不能搞了!这样搞,谁还敢说真话,难道真要说牛尾巴长在牛头上才好吗?我要在张北开个全区的电话会议,宣布反右倾刹车。你能支持我一下吗?”

解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就是省委派来的整风反右的工作组长吗?这就是即将上任的市委第一书记吗?虽然六年前他在这里工作过,然而,此时此刻听到胡开明的意见,解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这样的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同意和支持胡开明的意见和作法。

电话会议开始了,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话。一大批干部被解救了。

一场“急风暴雨”的“反右”斗争,一下子就被胡开明化成了“小雨”。

我欣赏的就是你能讲真话

1959年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复,胡开明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压着一副从来没有这么沉重的担子。

从第二书记刘一鸣(胡来前,曾代理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工业书记王云、城市公社书记张何明到一些县委和

公社书记，胡开明逐个促膝谈心。作为第一书记，他不仅需要了解真情，而且需要志同道合的同事和下属。

胡开明找到了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于力耕，这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可是在批葛反右的风浪中，他变得小心谨慎，生怕由批葛而“殃及池鱼”，因为葛启的那些“右倾”言论很多都是出自他的调查汇报。

人哪，怕有辫子呀！

于力耕打定主意，再也不能说那种大实话了。尤其是在第一书记面前，必须得拔拔高调。

胡开明好像看透了他的心里，先说话了。

“我找你谈话，是想和你谈心里话、真心话。”说到这里，胡开明笑了。“老于，说实在话，对葛启我早就反不下去了，因为他说的那些话都对。我虽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但我也不受批葛的影响。这就是我的心理话，你瞧，我向你全倒出来了。你呢？能给我说真心话吗？”

一席话说得于力耕热泪盈眶，他激动得连连点头。

“能！能！我向您说心里话、说真话！”

于力耕像见到亲人一样，毫不顾忌地向第一书记掏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葛启他说的句句是实话。……‘五风’刮光了社员的家产，有的社员家中只剩下一铺一盖、一碗一筷了……”

从下午说到傍晚，从晚饭后又谈到半夜，于力耕详细介绍了全市农村的真实情况。

胡开明到坝上找到了张文光：“我想听听你的高见。”“我说的都是右倾言论。”

“那好啊，我跑90里到坝上，就是为了听你的右倾言论。”

张文光抬起头，看着胡开明真诚而又恳切的神情，下决心

说："开明同志，大跃进再也不能继续搞了。今年秋收前，张北全县234112人，就有213965人缺粮，占农业人口的93%，缺粮数达2889万斤，明年的形势比今年严峻的多。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发昏，还在叫嚷'形势大好'，还在那反'右倾保守'，这样下去，明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啊！"

胡开明凝神沉思着，张文光又叹了一口气，他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打架，他既希望老领导能力挽狂澜，纠正"左"的错误，又担心老领导落得葛启一样的下场。想来想去，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起来。

"我是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您上次来张北宣布全区反右倾刹车，使我少受了很多批判。但在目前，我的右倾帽子是摘不掉的，您也不必为我费心。我刚才说的尽是和大好形势唱反调的泄气话，谁处在您的位置上，也不会欣赏这些右倾言论的。"说着，他痛苦地低下了头。

"张文光，你这几句话说错了。我欣赏的就是你能讲真话！"胡开明激动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当他走到张文光身边，突然一把抓下他头上戴的帽子，仔细端详着这顶普通的棉帽，缓缓地但却十分庄重地说："张文光同志，帽子能戴上去，就一定能摘下来，况且是顶不合适、不公正的帽子。你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地委，振奋精神，准备继续为党工作。"

胡开明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从坝下平川到坝上草原，从海陀山到小五台，他到处调查研究。有时，他先实地察看，与群众交谈，再听当地领导汇报；有时他先听汇报，再去实地和群众验证，看这些领导汇报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既是在考察干部，又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寻求正确的方针政策。

他感到自慰，因为他看到，尽管处在"整风反右"的形势下，

但是,仍有不少干部敢于抵制和批判"左"的错误,向他敞开心扉。

他想起了张文光的谈话,决不能让讲真话的干部坐冷板凳。在常委会上,他郑重提出了张文光、刘文达、白玉等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及安排工作的问题。

他说:"对这些干部的情况,大家比我更了解,更熟悉。我个人认为,这些同志说过这样那样不合时宜的话,但是,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是搞错了、搞过了。我们党历来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搞错了,就一定要纠正。这不仅是解脱几个负责干部的问题,还在于使广大干部都能说真话,说心里话,恢复党内民主作风。否则,敢说真话的人都戴上了帽子,那以后我们还怎么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呢?我建议,该平反的平反,该工作的工作,不要再让这些同志背着包袱了。"

会场沉默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安排工作!中央没这个精神,省里也没这个指示,市委能这么干吗?大家都在掂量着这件事的分量。

这也难怪,多少年了,大家习惯于听上边的,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办,而对于自己的思维器官倒很少考虑怎么用。现在,中央和省里没有平反的指示,无论是上边来的红头文件,还是《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核桃大的标题都是"反右倾鼓干劲,再创新跃进"。给右倾分子平反,显示是要担风险。

一阵沉默,书记处书记张何明首先发言了。

"我也做了些调查,开明同志说的很对,我们不能再让说真话的同志受委屈了,我同意给他们平反,安排工作。"

在常委中,何明同志资历很老,又素来以"好脾气"著称。他对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真诚,他处理事情的公道、正派和廉洁,使

他在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又是一个硬骨头，省委通过对葛启的处理决定，别人都举了手，唯独他不举手、不表态，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张何明同志支持第一书记的意见。胡开明不由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

书记处书记解峰说话了：

“我完全同意开明、何明同志的意见。但在方法上，我建议分成两步：第一步，首先分配工作；第二步，分期分批地甄别平反。这样可能更稳妥一些。”

书记处书记王云也表态了：

“解峰同志的意见很好，工作可以先安排，平反可以分批……”

虽然有同志一再提醒，这会不会右了，但还是以多数通过了决议。

我现在主要是管吃饭

民以食为天。这一年的冬天，衣不果腹的人们在严寒中挣扎着。

胡开明一天要接十几个来自各县的电话，而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要粮食。饥饿，像一头恐怖的恶魔，威胁着每一个人

造成大饥饿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指标，虚报浮夸。1959年，全国粮食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才560斤。但是，中央在1958年的经济计划，粮食要求达到8000—10000亿斤（直到现在，我国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过10000亿斤的指标）。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鼓动下，各级层层加码。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谁也怕当彭德怀第二，结果，汇总到国务院的数字不仅达到了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计划，而且

还超过了它。这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由高指标和虚报浮夸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实际上，很多地方连种子粮和饲料粮都交了，更不要说基本口粮了，岂有不饥饿之理？中央又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全国到处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一平二调，大吃二喝。在农民还饿肚子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粮食过早、过多地转化为工业原料。

从1959年到1961年，老天爷也不帮忙，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张家口是风灾、旱灾、雹灾、病虫害四灾齐全。遭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4.11%。再富庶的社也经不起这连续的折腾呀。

天灾人祸，雪上加霜。

1960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认为：所谓困难无非是女人的头发夹子少了一点，肥皂少了一点，这是小插曲。并说，经过反右倾以后，现在的情况是国内形势极好。于是会议决定1960年继续“跃进”。这一年的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的社论，再次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的热潮。

直到12月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头等重要的就是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到了这时，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0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公布，这一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大约是2870亿斤，比上一年少530亿斤。在600000000这样巨大的分母面前，这就是饥饿为什么连续三年在中国大地徘徊的原因。

全国大饥饿，张家口呢？胡开明来到蔚县合营，这里的人饿到了什么程度呢？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籽扒出

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对于饥饿难忍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籽被照样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个别村庄活着的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去。

196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宣化市委书记卢起打电话来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往往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儿食物一起服下去，就能治疗或减轻哮喘。

大烟土，这个已经绝迹十多年的祸害，要把它从公安处的仓库发放出来，就好比渔夫从宝瓶中放出魔鬼，虽然说是作为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然而，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吸食大烟的丑恶现象呢？

这真是一个难题。

胡开明把解峰和公安处长孙凯找来，试探地问：

“如果由我来负责任，能给哮喘病多发区发放一点大烟土当做药吗？”

“我和开明同志负责！”解峰加了一句。

孙凯感动得连连点头：

“行，行，我马上回去安排发放。”

4年以后，这件事就被说成是“发放大烟毒害人民”。当时，正在上映《林则徐》，于是胡开明的名字与电影中那位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和主张弛禁鸦片的投降派穆彰阿、许乃济相提并论。

发放大烟土一项措施，缓解救活了宣化多少群众，是难以计算的。当时，用过大烟土活过来的人，每当谈起此事，都噙着眼泪说：“是大烟土救了我们的命啊！”

1960年，在风雪交加、饥寒交迫的时候，省委主管农业和生

活的负责同志却作出日吃4两口粮的新规定。张家口这样的寒冬怎么过？随后，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朴实无华，简明易懂的口号。但是，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增产，而人是不是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抵御饥饿？这恐怕至今仍是科学家有待研究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于是，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种种的“增量法”应运而生。

1960年11月9日，胡开明主持召开县(区)委和公社常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集中讨论了生活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低指标、瓜菜代”的政策。

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市委书记王云、市长刘谦和全市4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利用公休奔赴山川，采集各种野生杂物。在领导的亲自带动下，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下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而全市的代食品原料已达到23000多万斤。其中的主要品种有玉米棒子芯、高粱穗、土豆藤、萝卜缨、榆树叶等，26400多台加工机械昼夜运动，粉碎这些原料。

代食品在缓解粮食紧张状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田间夫人回忆，当年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吃这样的代食品病号日渐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有的人死于低血糖休克。

严重的困难威胁着人民健康，也考验着每一个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真伪”。不过，这个4两却不是可以任意逾越的，省委负责同志指出，吃4两者为马列主义，超过4两者为非马列主义。上级领导把真假马列主义的标准定在4两上。

胡开明直奔省委，亲自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4两粮食怎么活下去？”

“全省都是吃4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

“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过下去吗?”

看到胡开明激动的神情,省委主要领导似乎也感动了:“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

胡开明针锋相对:“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讲的是实话,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但是,却没有人敢于向下负责,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然而,与省里某些领导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张家口地区蔚县的一个公社,却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公社书记——他叫武万升。

在省委提出吃4两标准以后,蔚县县委书记赵建国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上级指示,做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日吃3两粮食。把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量。即使这3两粮食,也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1961年1月,蔚县死亡人口猛增到1.0%。

武万升所在的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武万升带着公社干部深入各家各户了解生活情况,查看病情。每到一户,人们都拉着他的手,流着热泪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咱们再见上一面吧。”听到这样的话,好似一把刀子扎在武万升心头。他陷入迷惑不解之中。难道饿死人也符合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不采取措施,连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乌纱帽可以不要,党籍也可以开除,但人不能不救!

武万升冒着对抗上级指示,冒着戴上“非马列主义”者帽子的危险,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放粮的决定:

第一,从公社掌握的储备粮中给全社每个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自己家食

用。预计全社要放粮40万斤。

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

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物，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

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临开会前刚领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他详细汇报了张家口市广大农村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弱牲口度荒，请省领导开绿灯。

胡开明的请求使省里那位主要领导又一次陷人为难之中。

谁料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天津视察，于是那位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

毛主席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

一道指示传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却很难统计。

胡开明仍在不断向省委汇报张家口的真实情况，每天早上，他第一件事就是向主管生活的副秘书长询问死人情况。并交代副秘书长，实实在在把饿死人的情况汇报上去。

终于有一天，办公室的同志怯生生的请示胡开明，"饿死人数字是不是可以不报或尽可能少报一点？"

"为什么？"

原来，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五次批评。这真所谓"报喜则喜，报忧则忧"啊！

胡开明半晌没说话，直到办公室同志再次请求是否据实汇

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漏掉，是怎么回事就怎么汇报，大家都说假话，报喜不报忧，中央怎么能知道下边的真实情况呢？我们宁肯要说真话的批评，也不要说假话捞来的表扬。"

1961年1月，宣化市非正常死亡已达1891人，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2两粮食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而张家口付出的代价，是胡开明和卢起等一些负责干部受到批判。

口粮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仍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到了解决280万人民的吃饭上，他大声疾呼要解散食堂；允许多开一些小片荒；尽量多种一些夏收作物，以解决明年的春荒问题。

既然群众不拥护还办它干什么？

胡开明的眼睛盯住了食堂。公共食堂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建立的。这一年的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样兴奋地宣布："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是使得几千年来束缚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到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

全国大办食堂，张家口也不例外。共建公共食堂16000多个，有85%的农业人口入伙……

1959年，在严重挫折面前，葛启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顺应民心，再次强调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办食堂，结果有部分公共食堂解散了。其他省市也出现了食堂解体的现象。庐山会议后，全

党大反右倾，中央提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公共食堂提到维护三面红旗的高度。

1960年2月26日，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批语是"发给各地参考，希望各地也认真抓紧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文件上又做了新的批示，要求各省"一律仿照执行"贵州经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同志批示以后，中央公布了各省市公共食堂情况：

截至1959年年底止，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数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7.8%)湖南(97.6%)……七个省市。

70%～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87.4%)……河北(74%)……七个省市区。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68.2%)……六个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47.7%)……内蒙(16%)等省区。

在整个公布了当时28个省市区的情况后，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文件结尾加了一句话：

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

表扬的是谁？批评的是谁？确实是一目了然。难道仅仅是

统计吗？透过这些数字，不是说明了各地领导人的素质、领导人的干劲、领导人的政绩、领导人的能力吗？这对各级领导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谁不想使中央得到一个好的印象，而偏要受批评呢？

胡开明倒也不是爱听批评。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害怕那种违背民意、招致天怒人怨的表扬。

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省了粮食等。还引证了社员群众对食堂的赞扬话，说的有鼻子有眼。

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了电话，他问：

“省委工作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材料你看过了吗？”

“看到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不要求你现在下结论。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在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们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

王洁波接受了这个任务，一星期以后，一份详尽的报告送到胡开明的桌上。

报告上说：西二堡的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是存在着十个缺点。

胡开明还要亲眼看看公共食堂的情况。他驱车来到坝上，单等吃饭的时候挨个看各个食堂的伙食。

顶着“白毛风”他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食堂设在一座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背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

他来到狼窝沟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公共食堂提出来半罐子糠菜糊糊，吃力地往坡那边爬去，秘书追上去问，孩子说：“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

"你家里能做饭吗?"

"不能做,粮食都在食堂里,锅给砸了炼钢铁了。"

听了秘书的问话,胡开明久久没有说话,直到目送那个提着瓦罐的孩子一步一步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他才眼睛红红的上了车。

几个月时间,他亲自调查了几十个公共食堂,从食堂的组织、食堂的管理,到食堂的帐目做了全面的了解。他亲自和数百名干部、社员做了交谈,掏出了群众的心里话。

无须再调查了,很明显,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人为的、强制的办公共食堂,不符合群众的愿意,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严重遭灾,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坚持大食堂、大锅饭,将进一步加剧粮食紧张的状况,造成更大的灾难。可是,在巩固扩大公共食堂与解散压缩公共食堂之间,胡开明实在找不出一条可以使二者统一的新路。

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在不涉及全国、全省大办公共食堂前提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请省领导考虑,是否可以停办食堂?

对于胡开明的发言,省委领导反应十分迅速:"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办、解散。"省领导还提出办好食堂的十四字诀:

"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

胡开明找了王洁波,鼓励王洁波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把涿鹿县西二堡食堂的十条缺点说出来,以引起领导的重视。

后来王洁波如实在会议上讲了。会议简报将王洁波的发言摘要登了出来,不过换了两个字,把十大"缺点"换成了十大"罪状",把王洁波个人发言改成了"张家口地区认为"。这样一来,张家口就有攻击人民公社之嫌了。看来请求省委马上下令解散

食堂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市委第一书记，向上级如实汇报了情况，反映了意见，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胡开明没有入俗，而是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中央和省委不解散公共食堂，我自己来纠正的做法。他什么后果都不顾，无非是摘掉乌纱帽，和葛启一块去锻炼改造。

胡开明选中了郊区的永丰堡村公共食堂，这是张家口的三大红旗之首，是全省挂上号的典型。它的兴衰对其他食堂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全村的人都集中在永丰堡学校的院子里，胡开明登台说话了：

“社员同志们，今天，我是专门来和你们研究公共食堂问题的。我先问问大家，共公食堂究竟好不好？”

全场沉默了一下，社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盯住了大队几个干部。支书郝永昌站起来说：

“好！公共食堂好！”

随着他的话音，大家也锣齐鼓不齐地支应着。

“好！公共食堂好！”

“那么，谁能说说公共食堂好在什么地方吗？”

“公共食堂节省柴火。”人群中，不知谁嚷了一句。

胡开明却反驳说：“依我看，不是省柴火，而是浪费柴火。这么冷的天，家里不烧炕怎么睡觉？要是在家里做饭，炕也就暖了。可是吃食堂回家暖炕又烧柴火，你们说，这到底是省了柴火还是费了柴火呢？”

“费柴火。”不少人回答市委书记的问话，更多的人却是连连点头。

“那么，公共食堂还有什么优点呢？”胡开明又问。

“大食堂省粮食。”又一个人回答。

"是不是省粮食,咱们也算算帐。"胡开明伸出手指头说,"咱们村210户人家,自家做饭的时候,谁家不是算着吃省着吃,剩下点饭菜,下一顿热热还能吃,谁都不会扔掉,汤汤水水还要喂鸡、喂猪。我了解了,那时,哪一家也有十来只鸡,一两头猪。可现在,咱们村连叫鸣的鸡都没有了。你们说,这到底是省粮食还是费粮食呀?"

"费粮食。"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还有什么优点吗?"

"人工还是省了。"生活队长石宝珠不服气地说。

"大食堂确实用工少了,可是,各家做饭时都是什么样的人工呢?"胡开明扭过脸,点着郝永昌说:"郝永昌,你在家做不做饭?"郝永昌连连摇头:"我才不管做饭呢!那全是娘儿们的事。"

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胡开明也笑了:"我先不批你这个大男子主义,不过,原来在家里做饭的,确实没几个老爷子、壮汉子,尽是老婆婆们和出不了工的媳妇们。这些人,即使不做饭也出不了工、下不了地。可另一方面,大食堂里活重,挑水、和面、上笼,那个活也不轻,所以,应得挑壮劳力来做饭。咱们村5个食堂,一个食堂里5个人,五五二十五,大家说,这人工到底是节省了还是浪费了?"

"浪费了。"这回社员们是扯着嗓子吼了。

……

胡开明抬高声音问:"社员同志们,你们说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呀?"

"不好。"大家齐声回答。

"不!公共食堂还是好。"看社员不解的神情,胡开明继续说,"可咱们现在不具备办食堂、吃食堂的条件。办不到的事硬要办,这就不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是。"大家像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胡书记,咱们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您说咋办吧?"

胡开明面对大家,高声问道:

"现在大家说说,这公共食堂还办不办呀?"

"我们早就不想办了!"

"那么,就按大家说的解散了!"

随着他的话音,社员们兴高采烈的欢呼着"解散了,食堂解散了!"有的人飞跑回家,向未能前来开会的家人报喜。

上书就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

胡开明就任第一书记以后,走遍了张家口的山山水水,尽管他使尽浑身解数,张家口的形势却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他掉过头来看历史,逐年考察建国以来的十年农业和实际成效,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笔记、心得。

1962年初,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两段话: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已经被农民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包产到组,其核心是建立生产责任制。"

请不要忘记,这是1962年,当时全党是在肯定"左"的错误的同时纠正"左"的错误。万全县县长陈鸣歧说:谁觉悟得越快,挨棒子也越快,反思得越深刻,挨整也越厉害。这话颇有哲理,也是60年代的实际情况。

这一年的6月,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后到胶片厂任职的葛启得到平反。

省委原打算把他安排到省公安厅去当副职,胡开明反对说:

"这不合适，人家是地委第一书记，既然平了反，就应该官复原职。"

一道命令传达到张家口：葛启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免去胡开明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职务。

葛启到职。召开常委会听取工作组汇报。汇报中反映蔚县常宁公社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胡开明已经卸职，准备收拾行装回省。常宁推行"三包到组"是他提出的，但眼下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只是分厘之差，胡开明却不能同意。所以，当葛启、何明等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认为"包产到户"作为生产经营方式的一种辅助，那是有好处的，但最好不要推广。

29年以后，当胡开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感慨地说："葛启有魄力，在'包产到户'的实践上，比我走得远！"

复职的第一书记刚回张家口，就大刀阔斧地工作，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害怕、胆怯、衰退、萎缩的影子。他还是过去的葛启。在他领导下，张家口的工作会逐步破除"左"的束缚，经济建设会发展得更快。对此，胡开明感到欣慰。

一天，当他即将离开张家口的山山水水，离开280万人民群众，离开同甘共苦的地委班子时，胡开明心中不由自主产生一种留恋不舍的心情。这难道就是感情吗？

几天后，胡开明在省委机关见到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林铁高兴地说："老胡啊！你前脚回来，后脚你的县委书记就写联名信，请求省委将你留在张家口，看来你这地委书记还当出感情了啊！"

胡开明何尝不眷恋着张家口？特别是那么好的一个群体。他深深地感到县委书记们代表280万张家口人民的恳切希望。但没有想到，尽管他做了工作，13位县委书记还是向省委写了

挽留信。

胡开明在省委报到后，当他正在和林铁随意聊天时，华北局第三书记李立三推门进来。一进门就大声说：

“老林，告诉你，中央马上要开一个北戴河工作会议，华北局想赶在会议之前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搜集和提供材料。等到中央的会议开上了，咱们的会就和它同步了。最后再把中央会议的精神拿到咱们会上贯彻。你们河北北面去一个地区的代表，南面去一个地区的代表，加上省农工部的领导。你赶快把一南一北的人定下来才好。”他一口气站着说完了这些话，才和胡开明握手打招呼。

林铁书记问胡开明：“北面谁去？”胡开明微笑着没有说话。

“马力？”林铁书记说。

沉思片刻，林铁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行……”

李立三和胡开明转过头来，欣赏着房间的两幅字画，好让林铁静静的思考。

“张家口的葛启、承德的王克东刚平反回去工作不久，还不了解情况。”林铁沉吟着说。

突然，他抬起头，对胡开明说：

“你去怎么样？”

“我去？”胡开明感到突然。

“我已调动了工作，怎么还能做北片地区的代表呢？”胡开明率直地回答。

“这不要紧，这又不是什么正式会议。”林铁接着说。同时，林铁又征求立三的意见。

“立三，你看可以吗？你知道，胡开明对农村政策相当有研究呢。”

李立三快人快语，“可以，这个座谈会就需要能提出意见、反

映情况的人。"

李立三边说边将胡开明拉到了一边，谈起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开法，接着讲了一下当前形势，并随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中央发的调查提纲交给胡开明。

十分钟之间，决定了胡开明参加华北座谈会。而胡开明在会上的发言和上书，则几乎决定了胡开明后半生的命运。

胡开明回到张家口，他的日程表安排的满满的，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干到下半夜。常常是他的爱人、专区副专员李克林睡醒一觉了，他还在那里埋头工作。

"你又要放炮了？"李克林终于问他了。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能为孩子想想吗？"

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他的党性、责任、良心和对事业、对人民群众的一片真情又不能不使他去"鼓与呼"。于是，他默默地摇了摇头。

让孩子自己去闯吧，不要让他们仰靠父母过日子，如果他们能从父辈身上学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那才将是终身受益无穷的财富。胡开明这么沉思。

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形成了。这份建议凝聚了胡开明三年的心血，即使从确定题目开始也经过近半年的时间。林铁、李立三两位书记决定他参加华北座谈会之后，他下决心在这次会议上把建议报告拿出来。

胡开明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消息，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见分歧的。据说，毛泽东同志开始对安徽的"责任田"也讲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自留地多一些，不会饿死人！但时隔不长，到 1961 年底，又讲"生产开

始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当时，刘少奇、陈云、彭真等同志是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主张农业上要退够。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曾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作为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同志，主张实行包工，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包工，大活包到作业组，小活包到人，并支持包产到户的办法。对此，有人提出批评，说这是方向路线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中央局、省委，对责任制都是反对、怀疑的人多，赞同的人少。胡开明决心把自己的调查报告拿出来，意在说服更多的同志，推动和促进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以进一步纠正党在农村工作上的“左”倾错误。

建国以来，毛主席的兴趣一直在农村工作上，他密切关注、探索农业发展，调整着农村的政策。胡开明有这样的直感，在恢复农业生产改变农村政策问题上要拍板非毛主席莫属。他接受参加华北农村座谈会任务后，即萌生着一个信念：一定要向主席直接建议。

胡开明到北戴河的第二天，给张家口地委打电话，叫于力耕去。他告诉于力耕，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把那份报告“通天”，直接送毛主席，所以要叫他去最后斟酌修改一遍。

于力耕踏上张家口——北戴河的火车，一路上，他只觉时间是那么漫长。他竭力地思索着怎样才能说服老领导打消直接向毛主席“上书”的念头。

他赶到北戴河，见到胡开明，将自己途中苦思准备好的劝告词一古脑地说完。却未能动摇胡开明的决心。

随后，于力耕只得开始在内容和词句上做文章。请看他修

改文章时与胡开明的两段对话。

于力耕："'包'太敏感，批了多少年了，建议把'三包到组'改成'三定到组'。"

胡开明："包就是包，上书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

于力耕："这里提不要歧视包产到户的社员，对他们要满腔热情不合适，还是删了好。"

胡开明："删不得，这里不亮明观点哪行啊？"

议来议去，删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结果是观点更鲜明了。

7月30日，胡开明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发言，会议秘书处作为大会简报印发并同时转报中央。

8月8日，胡开明再次写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1962年8月8日

这封信是通过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的秘书转中央办公厅

呈送主席的。同时分送省委几位主管领导同志。建议开宗明义，旗帜鲜明。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让我们摘录几段报告中的话：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纠正了'五风'错误，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表现是：(1)社员出勤不主动，每天还得队长挨门上户去叫；(2)社员集体劳动的时间短，出勤晚，收工早，一般每天不过六小时；(3)耕作粗放，耕地留茬子，种地不到头(边)，锄地草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我说：'现在社员有四怨情绪：一怨别组出勤晚，本组出勤早；二怨别组歇息大，本组歇息小；三怨别组收工早，本组收工迟；四怨别组工分高，本组工分低。'"

报告紧接着说：

"为什么还存在上述现象呢？除了既定的政策还没有落实以外，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太不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它农副产品的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以上三个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由于目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物资少，解决前两个问题是有限度的，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前主要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即解决生产队内部的关系问题，发挥本身的潜力。"

在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了系统论证之后，报告详细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张家口区东窑子公社，有几个生产队在今年春季，自发地建立了常年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我去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孤石生产队实行‘三包’到组后，队长既不用每天派活，也不挨门上户叫出勤了，连钟也不打了。每天天一亮社员就自动下地搞集体生产，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到了天黑还不肯回来。现在他们集体生产搞得很好，开小片荒的很少。外东窑生产大队‘三包’到组的一、二、三队，种的十二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6939斤，5月12日就上市了，平均每亩收279元多，斤价3分9厘3；未包到组的第四生产队的三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757斤。目前生产组与生产组之间的竞赛劲头很大。”

报告列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并针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有根有据的批驳。

此件，经中央办公厅递呈毛主席。几天后，在中央召开着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8月16日

此信及胡开明同志《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被列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下发。

和彭德怀的信一样，毛主席的批示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

然而，胡开明明显感到，他上书不几天，座谈会的风向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支持他的同志也转了180度的弯了，对生产责任制基本上是一片否定之声。

是继续反映情况还是赶快转向？胡开明怀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选择了前者。

他手头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他与跟随多年的秘书曲维镇共同研究写的《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在这份报告中，他针对农村在生产资料归公后，大家口粮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口粮按劳分配是不行的。提出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建议。

8月18日，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信，并附录这份报告继续送了上去。

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毛主席见到河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时讲：“看来口粮问题不要强调按劳分配了，否则会打击农村‘四属户’（军、烈、工、干）。”显然，主席是阅过胡开明的第二封信的。近年来，在中央档案馆卷宗里，我们查阅到当年胡开明写给主席的信，在信笺上清楚地加盖着“已送阅”戳章以佐证。

胡开明万万没有想到，8月16日毛主席将胡的“上书”批给会议各同志讨论的前七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讲话中已经批了他。

那是1962年8月9日。

毛主席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

毛主席显然动气了：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

毛主席点名讲到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

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毛泽东同志批评“一片黑暗”和批评胡开明这两段话，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没有正式传达过，胡开明自己也毫不知晓。“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拿出“最高指示”他就像受到了晴天霹雳般的震惊！

两年以后，他的战友与他一起被称为“胡、葛、解反党集团”。最后被定成“胡、葛、解、张（何明）王（云）马（哲生）反党集团”。株连者不计其数。

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在每一公社轮流接受批斗，当他吃到埋在白菜下面的猪肉、豆腐时，当半夜三更干部和乡亲们来看他、安慰他时，他更坚信，是非功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了16年。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春风的吹拂下，16年没有正式工作的胡开明被中央一道命令调到安徽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他去了。在那里，他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配合和支持万里同志，在安徽率先实行了农村生产责任制。仅仅两年，素称要饭之乡的凤阳人民永远结束了乞讨的历史，整个江淮大地，到处响起了欢庆的锣鼓和鞭炮声。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

……

1980年9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18年的历史反思，我们

终于又返回到历史的正路上。这是一段多么坎坷的路,这是一段多么令人痛心和沉思的回顾。

1982年10月,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到安徽视察工作,在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说:“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从历史情况来说,在1960年以后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是先知先觉者。当时就主张要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同志也好,还有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也好,在座的其他同志就不清楚了。”

张家口地区有的老干部曾给胡开明送过这样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　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　你是真开明!

寥寥18个字,不正是这位市委第一书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写照吗?

(晓　凌　柳　铮)

战将许继慎之死

1930年春，中央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这位黄埔一期生以卓越的指挥才能，仅仅几个月，就把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中央在给他的信中，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把鄂豫皖苏区划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就其面积(25个县)和人口(250万人)来说，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

许继慎执行中央的指示，总是雷厉风行。金秋九月，左倾盲动主义者们对鄂豫皖红军，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按照这一指示。许继慎率红一军沿京汉铁路，先袭击湖北的广水县，未克，随即越武胜关直取信阳城。

信阳，古称义阳，春秋时为申国，北宋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信阳。这里，是连接武汉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敌人的情况，许继慎是了解的，但为了攻占信阳，完成攻占中心城市的任务，只有孤注一掷。

那天，他乘夜色指挥部队楔入了信阳火车站。如注的弹雨，打得墙壁、车皮、铁轨火星四溅。在熊熊的火光中，经过激烈的争夺，才占领了车站。翌日拂晓，城内守敌依仗坚固的城壕，负隅顽抗。至中午，红军数次进攻均未能越城池一步，部队反而暴露于敌人的火力圈内。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眼看攻城无望，许继慎下令撤兵。

两次战斗的失利，使红一军将士们的情绪十分沮丧。敌我力量的悬殊，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搞得他们无所适从。

一些干部战士当着许继慎的面说："连广水、信阳都攻不下，哪还有力量去打武汉啊？是谁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让他去试试！"

战斗的失利使许继慎清醒地认识到，红军远离根据地，无群众支援，无后方供应，如果继续在铁路沿线作战，势必造成被动。他率部返回根据地，每到一地，即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土地革命纲领，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还乘势建立了正(阳)汝(阳)游击队，罗山、光山地方武装。革命的势力扩大到了豫东、皖北等地。

鄂豫皖红军力量在许继慎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壮大，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鄂豫皖红军的战斗力，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惊恐。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兵力，于11月上旬开赴鄂豫皖，对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关键时刻，中央派来曾中生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身体消瘦，说话直率热情，两人一见如故。

自从有了曾中生相助，许继慎马不停蹄，带领红军驰骋于数百里的大别山区。一会儿从东转到西，一会儿从南麓跳到北麓。他根据自己总结出的"赚钱就干，赔本不来"的作战经验，在鄂东北根据地，于黄陂、新洲、黄安、黄冈、麻城一带痛击敌军，以后又迂回豫东南、皖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等形式，解放了商城、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六安等地，歼灭了大量"围剿"的敌军。特别是香火岭一战，歼敌三个整团，共毙俘敌3000余人。

1931年1月15日，活动在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十五军在蔡申熙的率领下，来到豫东南根据地，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与红一军会师。根据中央的指示，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加强领导，中央派来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许继慎改任第十一师师长。

1931年，王明的党中央为了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派出了张国焘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鄂豫皖军委主席。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极力推行“左”倾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

5月，张国焘来到金家寨，见到许继慎，许认为他是党的元老，有理论有水平有威望，耿直的许继慎把自己对建设军队和根据地的意见、建议，一古脑儿地向张国焘倾吐出来。

许继慎坦率地说：“有的领导一意巩固苏区，满足现状，我认为这比较保守，应该抓住一些有利时机向外扩大和发展。根据地毕竟就这么大块地方，人力物力是有限的，假如敌人再大规模进攻。我们就没多少回旋余地了。”

许继慎又说：“沈（沈泽民，中央分局委员）委员来皖西后，到处指责苏区党和红军这不对那不该，对许多有功的干部，不问青红皂白，只凭印象，打击较多，还说我们执行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现在是革命力量的发展时期，只有团结更多的人，我们才有实力对付敌人的进攻。请张主席一定要协调好这些事情。”

对于这些忠诚、坦率的意见，张国焘作为党的负责人，本应认真听取，深入研究，但他采取了两面派做法。当着许继慎的面，他说：

“嗯，很好！我从鄂东北过来时已经看到了，皖西一带买卖兴旺，粮食充足，苏维埃建设和红军建设都很有成绩，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嘛！我也早就听说了，原特委和红四军负责人都很重视你的意见，这与你的能力和功绩分不开的，对鄂豫皖根据地军事上你有很大贡献，你要再接再厉。至于沈泽民嘛，他过去是个作家，书生气十足，对皖西苏区的要求是有些操之过急，对同志过于严厉，这应该改正。不过，他的本意你们也应该理解，为了

工作嘛！他也是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

可是第二天，张国焘却对另一位领导干部说："许继慎是一位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昨天他向我提了不少意见嘛，有些我不敢苟同，他那种说法，目中无人，有军阀主义倾向，我们要注意，我不会任其发展的。"

7月上旬，在商城县余家集，张国焘在一家祠堂里主持召开了鄂豫皖苏区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军事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

张国焘坐在一张雕花老式木椅上，面孔有些泛黄，他正患痢疾，带病工作。他慢吞吞地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气陡然升高：

"现在，江西苏区正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做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调动敌人的军队，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人安庆，打下安庆以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6月28日，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扩大会议时，张国焘又说出了这个主张。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紧接着，许继慎站了起来，粗门大嗓道："我觉得，你说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的，那样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我的意见还是南下，先打英山，再去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策应江西。这样，可以使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蕲、黄、广去，请张主席再认真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嗯？考虑我们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是么？"张国焘对许继慎已经没有了好感，瞥了一眼曾中生、邝继勋和许继慎、徐向前，担心又出现上次会议的情景，赶紧先发制人，大声道："就这样定了，四军一个月

内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命令，代表党的命令；这也是尊严，一个250万人口的苏区领袖的神圣尊严。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于是，许继慎同曾中生、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东进。

红四军聚集了十、十一、十二师6个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在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的带领下，于7月28从商城南部的新集出发，冒酷暑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别山北麓，往南长途行军，过斑竹园、吴家店，直取英山城。

7月30日夜，部队到达英山城外，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激战一天，傍晚就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炎天酷暑，限制了人的活动。占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刘英等军师领导人乘这机会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研究决定：改变张国焘决定的行动方案。向南进击。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对于这个行动，徐向前元帅回忆说：

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太，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大家本来就想不通。在英山，我们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3个师才5(6)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住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4(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守，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

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鳞半爪知道点，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

因此，在商量利弊之后，出于对红军对革命负责的考虑，军部最后决定乘势进据蕲、黄、广，并将这一行动报告了中央分局。

8月19日，他们占领广济，又克黄梅，捷报频传。部队一面打仗，一面打土豪，没收官府财产，开仓分粮，开展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红四军就歼敌7个多团，震动了九江、武汉，并牵制了敌军，声援了江西中央苏区。同时，还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太大片根据地。而且这一带比较富庶，红四军的这次行动，除了大量的粮食、武器等军需物资外，仅收缴的黄金就有20余斤，银子1800余斤，大洋7万元，使部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保障。那20斤黄金，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人直接送交到上海，以提供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之用。

红四军的胜利，本该表彰宣传，事实已经证明和教育了当初的反对者。然而张国焘却不考虑你胜利不胜利，违背了他的意志，就是对他权力的侵犯，他连续写信到前线，指责红四军领导人擅自改变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返回新集。

鉴于同张国焘斗争的严重发展，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可是，考虑到中央分局的一再强令，红四军被迫回返。

北返途中，性格刚直、眼中揉不得沙子的许继慎，对张国焘

的无理指责一直有火，积极提议召开干部会议，明辨是非。他胀红着脸，对曾中生说："大路不平众人踩，全军干部都是这个意见，看他张国焘怎么办！"

曾中生、徐向前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下，不然就这么到了新集，依然难以交代。

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驻扎了下来。红四军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

那天上午，在鸡鸣河镇西的一幢逃亡地主的宅院里，红四军政委曾中生主持了这次会议。

曾中生首先念了一遍张国焘的两封信，对红四军南下以来的行动和战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表示激愤，接着，让大家发言。

身材魁梧的许继慎首先站了起来：

"张国焘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一来鄂豫皖我就感到不对劲。我们费尽心血统一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队伍，接着以曾中生同志为主的鄂豫皖特委领导苏区军民又开创了这么大地盘，建立了几乎是百战百胜的红四军，他不但不肯定，反而硬说我们这不是那不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打败那么多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路线错了，红军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再说，我们这次南下行动，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当初我力主南下，现在我更认为应该南下，事实是明摆着的。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我表示坚决反对！"

……

真是出乎意料。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姜镜堂等将领们和广大干部们，并不怕张国焘的压力，群情激愤，争相发言。这些久经战斗考验的指战员，对南下与东进的是与非，个个

都非常明了。革命队伍的优良作风，锻炼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坦荡直言的性格。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特别是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更是慷慨激昂，直接驳斥张国焘的错误，并勇于坚持正义，勇于承担责任。

会议讨论到最后，干部们一致表示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申明书》由曾中生起草，同时另抄了一份报中央军委。详细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上签名，那"许继慎"三个字，足足占有5个人签名的地方，可见他一腔激愤。

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到新集后，张国焘火了。他宣称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刘士奇携《申明书》随行军部队先期到达新集，向张国焘当面汇报的当天，张国焘就火冒三丈地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

两张合并一起的宽大的红漆方桌旁边，围坐着10余位党和军事高级干部。分局会议室内，充溢着紧张的气氛。会议错误地决定撤销了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并决定了开展"肃反"工作。

会后，张国焘即派陈昌浩作为全权代表，乘"列宁号"飞机赶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一职，并授意陈昌浩相机处理许继慎。

同时，张国焘还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说"严厉镇压反动派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

陈昌浩一到麻埠，就奉命开始在红四军中进行"肃反"。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平日同许继慎比较亲密的几个团干部。

许继慎更避免不了这场厄难。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余子店，他便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张国焘称他掌握了许继慎详实的“反党依据”。

原来，早在8月初，红四军收复英山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遣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带他的亲笔信到黄山找许继慎，妄图进行拉拢。许继慎是个有着坚如磐石革命信念的战士，两个特务找到师部后，许继慎接过信一看，勃然大怒道：“这不是要我与敌人勾结，倒戈投降么？策反竟策到我头上了。来人！”许继慎拍了下桌子喊来卫兵，“将他们捆起来，连同这封信一起送交军部。”

曾中生和徐向前也是了解许继慎的。

许继慎是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多少有点田地的中农家庭。父亲一生勤劳，才积攒点财产，因之多少能供他上学。“五四”运动后，他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思想激进，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于1921年4月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选为学生总会常委兼联络部长，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正因如此，他被反动军阀通缉，被迫离开安徽，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春，他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期学习。在那里，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因此，周恩来担任中央两广区委军委负责人时，根据两广区委的决定，他由团转党，与陈赓两人同任黄埔军校支部委员会候补干事。北伐时期，党派他到叶挺独立团任营长，屡建战功，后任团长，在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优秀的指挥才能。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他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负了伤，被党中央召回上海，一边治伤一边在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3月被派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一军军长职务，为统一红军、建设红军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突然间与敌人勾结呢？

曾中生、徐向前很慎重，严肃地审问了蒋介石口谕曾扩情派来的这两个特务，知道是敌人的离间计后，遂决定送中央分局处理，并说明了他们的意见：许继慎个人英雄主义是有点，但倒戈投蒋是绝对不会的事。

可张国焘不顾事实，找到了这个借口十分高兴："嗯！我说许继慎为啥拼命反对东进，原来有此因素，危险哟！他们一定有一个阴谋组织。"

其实，对于这样的信，张国焘不是不明白，国民党将领刘峙也曾给他送过同样内容的一封信。

不几天，在彭杨军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数百干部，张国焘别有用心地栽赃陷害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9人，主席是许继慎，他们决定9月15日在武穴暴动，幸亏被我们破获了。"

10月6日，张国焘命刚返回新集的红四军和红七十三师团以上干部，到光山县的泼皮河开了个会，本意斗争曾中生、许继慎，却因干部们不积极表态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8日上午，张国焘骑着马，带着一排保卫人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坐镇，主持军内"大肃反"。

屠杀之前，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还想最后做做许继慎等人的拉拢工作，只要他们听命于他的家长制，在会上认个错，他暂不想看到他们的血。

他让人把许继慎带了来："同志们没给你苦吃吧？快坐快坐！"

一见面，张国焘挤出笑脸，假装关心地双手扶着许继慎的肩膀。

"如果我确实犯了错误，就是吃苦也应该！"

许继慎依然是那种磊落、坦荡的硬汉子性格，宁死不会拐弯。

"你这个人呀！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可党的决定无论如何是要服从的嘛！你不该在南下路线上固执己见嘛！你已经有了'第三党'的嫌疑，你那样，人家能不怀疑你拼命南下为了啥？"

"那能为啥？为了红军，为了打敌人呗？我是个带兵的，总想打胜仗不打败仗呗！"

许继慎一直昂首挺胸地站着，胀红着脸，两眼望着窗外。

"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合作得好么？我来鄂豫皖后，你一直跟我过不去，我们都是做党的工作嘛！我素来喜爱战将，你还是承认自己是第三党，交代你的组织，考虑一下如何立功赎罪为好，你说呢？"

"我没罪。我不是第三党。我没有啥交代的。四军行动路线上，明明是你错了，可你硬让我们东进，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送死？"

无畏强硬的口气，正义直率的语言，吓得张国焘心里发寒。他知道拉拢不过来了，同曾中生一样，不会向他认输的，便甩起杀手锏，一反温和的态度，怒声道："那你为什么伙同他人搞一个组织？有什么目的？是不是想投靠国民党？是不是想反革命？有人供出你是第三党，你要如实向党交代！"

"那是有人陷害！对党对革命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反革命行为，我要想反水，何等今日？"许继慎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可靠的证据，中央也来信表过态。"张国焘怒冲冲地走了。

不欢的会面，更为许继慎的厄运下了注脚。

第二天傍晚，夕阳西下，河风习习，初冬的西北风，带着一股寒气，吹得人直打冷颤。张国焘吃过晚饭，骑着马到白露河滩上

散步。他再次让人带来许继慎。

他下了马,背着手慢慢踱到一片树林中,转身对许继慎说:"你是一个立有战功的人,党还是爱惜同志的嘛!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只要承认是第三党,分局还会重新考虑处置问题的。"

"不是就不是,让我凭空承认?不可能!我本来对你是很尊敬的,没想到你是这种卑鄙小人!"许继慎已是怒火满腔了。

张国焘听了这话,倒没生气,阴冷地一笑,眯着眼睛看看许继慎,朝几个跟过来的保卫局人员示意一下,便背过身踱着方步远去,假装欣赏哗哗流淌的大河及树林上空的晚霞。

几个战士掂着马鞭,被迫对许继慎狠狠地抽打。

一位目睹此情此景的红军班长,悲愤地记下了这个场面:

漕家河(白露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老军长呢?他是打了败仗,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

翌日上午,天高云淡。田野里,农民们在自由自在犁田耕地,准备播种小麦。附近村庄,听得到一阵阵战士训练的喊操声。看去整个苏区十分祥和、安定。

而白雀园镇内,在张国焘主持下,临时革命法庭正在火神庙召开"公审"大会。

会场很简单,两张方桌、几把椅子放在大厅上方。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参加"公审"的,是各师团连以上代表。戒备森严的会场,也允许一些群众进来观看,以示公允。

许继慎头扎绷带,浑身血迹斑斑。灰土布军装被撕得一条条的挂在身上。他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与他同时被带

来的，还有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其遭遇同许继慎一样。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当众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组织反革命9人委员会，企图暴动投敌和参加"第三党"、"改组派"等"罪状"，喝令许继慎交代。

许继慎怒火中烧，忍着巨痛，极力从担架上坐起来，两眼冒火地逼视着张国焘，大声说："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几十次大的战斗，大都取得胜利；在艰苦环境中，用鲜血和全部精力投入红一军建设中，统一和巩固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苏区军民有目共睹。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作出公证结论的，你张国焘是代表不了党的！"

这些话，如地下冒出的一股清泉，清清亮亮，句句是实，字字在理。在场人无不暗自叹息。尽管在此之前，张国焘授意一些人，在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上发表了批判许继慎的文章，在墙壁上书写："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制造舆论，但人们的心里是明白的。张国焘也感觉如此审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名堂，还让人怀疑他的所谓"证据"，了解了个中奥秘，便赶紧敷衍几句，宣布将许继慎、周维炯以反革命罪逮捕。"公审"大会草草收场。

几天后，张国焘回到新集。他一直放不下心，遂令人将许继慎、周维炯等4名"罪犯"秘密移往新集。

为防其部下闹事，许继慎等人被捆在担架上抬着，上面盖着白布单子。几个战士发现后，有所怀疑，追上来问："抬的什么人？抬哪儿去？"

保卫局干部应付着说："病号，抬到新集治病的。"

摄于许继慎、周维炯在红四军中的影响，张国焘不敢公开他

们。但这眼中钉、肉中刺，不予拔除，他浑身不自在。抬到新集还没三天，便迫不及待地令人将他们秘密勒死在保卫局禁闭室内。尸体被连夜抬到紧靠新集的西大山的一个山洼里埋掉了。

一个战功卓著、名扬鄂豫皖苏区，敌人曾重金悬赏而不得的红军将领，就这么命归黄泉。

1942年，陈毅元帅在延安时，对徐向前元帅说："我在新四军的时候，有次与国民党谈判，特务冷欣对我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1945年，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央为许继慎平反昭雪，把他的名字写在《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名。

1972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上讲话时，带着深厚感情说："鄂豫皖张国焘他们去了，曾钟圣(中生)、许继慎同志也就被批为路线错误，后被诬为敌人而被杀害了。许继慎当时就被杀害了。说他是'改组派''第三党'，主要是'第三党'。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军方面军。"

1981年，中共六安县委为许继慎烈士建墓立碑。徐向前元帅知道后，亲自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的碑文。

1983年，中央特把许继慎功绩的文字图片调进毛主席纪念堂，以长期留展。

1989年，中央军委把许继慎同志定为中国革命史上33位军事家之一。

(桂诗新)

第二次国共谈判中的秘密使者蒙冤记

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中共老党员潘汉年在第二次国共和谈期间"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

此事究竟如何,其中自有奥秘。

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办事处里,一片温馨的气氛

莫斯科。1936年2月初的一天。

北国严冬,寒气袭人。大街上只有稀少的行人裹着厚厚的冬装匆匆地走过。街道两旁干枯的树枝在冷风中微微抖瑟着。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办事处里,此刻却是一片温馨舒畅的氛围。暖气烧得很热,室内春意盎然。人们的心情似乎也很不错。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期望。自从半年多前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来,许多国家的革命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关于停止国内战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言(后来史书通称《八一宣言》),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内的一些进步政治力量做出了积极反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其"攘外必先

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些地方实力派已经表示不参与所谓"剿共"内战。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政见分歧日趋明朗,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就国民党的决策层而言,一些实权人物开始采取了较为松动灵活的态度。

在代表团的一间小办公室内,王明正在和数月之前才来莫斯科的潘汉年进行着重要的谈话。王明以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的权威身份和理论家的雄辩姿态,对潘汉年分析了自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他指出,实践已证明共产国际所确定的组织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的正确性。我们党提出的在国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坚决反共的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军队的领袖人物也不愿意继续参加"剿共"内战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他们也并非不想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又深感其财力物力的不足,强调要做好准备。特别是需要寻求国际援助。英美等西方国家虽一贯支持蒋介石政府,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也不能给中国政府以大量的援助。只有社会主义苏联,已经明确表示愿意援助中国政府抗日,蒋介石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苏联的援助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剿共内战,把援助完全用于抗日的目标。苏联的这一外交行动对我们是很有利的。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政府已经从坚持剿共灭共的顽固立场上有所退步,开始寻求和中共联系谈判以实现停止内战的途径。南京方面不仅已通过某些渠道和国内的中共领导机构进行了初步联系,且通过他们的驻外机构来和我党进行联系。他强调说:"最近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决策人通过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来和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些情况你是已经知道的。现在他们要

求我们派人回国去和南京方面直接联络,沟通国共双方的意见,为进一步谈判做准备,我们已表示同意。"

说到这里,王明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他就以部署工作的语气对潘汉年说:"今天同你谈,就是准备让你尽快回国去和南京进行联络,由你去当面转达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主张,同时也直接听听他们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你在国内已经有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你和陈铭枢、蔡廷锴、陈济棠等人都打过交道,相信你此番回国也一定能很好地担负起这项重大使命的。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吗?"



潘　汉　年

潘汉年想了想回答说:"要我去担当这项任务,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何时动身,行前还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可否请你再具体谈谈。"

王明说:"你同意去就好。动身时间不必太急,交通路线由组织上来安排。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剿共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再谈判组成一个联合的国防政府和联合的抗日军队。我们党愿意接受这个联合政府的领导,我们红军可以接受政府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王明要求潘汉年在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再设法去西北地区找到党的中央机关报告情况。他最后说:"你在动身前,还要和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部门联系一下,带去通讯密码,到达西北之后交给中央,以便尽早恢复中断很久的中央和'国际'间的电讯联系。关于你回国之后怎样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你可以

再和邓文仪联系见一次面直接商谈一下。”

和王明谈话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潘汉年在共产国际曼努意斯基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市中心的苏维埃大旅社。在一间宽敞的客房里，潘汉见到了事先约好在此会面的邓文仪。潘汉年此前已经和邓见过一次面，知道他颇受蒋介石器重。邓曾在苏联和蒋经国有过同窗之谊，回国后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过。蒋介石派他出任驻苏联使馆的武官，据说不仅是为了加强对苏外交活动，而且还有设法寻找当时下落不明的蒋经国、向苏方交涉让蒋经国回国的任务。

在曼努意斯基简短致词后，潘汉年首先说：“邓先生，我此次奉命回国和贵党中央进行联络，但我现在连进入国门自由都没有哩！”邓文仪立即答复说：“潘先生到达香港之后，请先给陈果夫先生直接写信通知他。他将派人到香港去和你联系，然后一起去南京。”说完，邓随手递给潘汉年一页写有陈果夫地址的信笺。

接着邓文仪问道：“中共方面对于即将开始的两党谈判的基本态度如何，可否请潘先生说说？”

潘汉年回答说：“我党对国内问题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实行联合的基本方针，在我们公开发表的《宣言》中实际上都已明确提出了。现在的情况是，国内战争仍在进行。国民党的军队还在追击红军。当前首要的步骤是必须立即停止内战，结束军事行动，这应当是谈判联合的前提。”

会见很快就告结束。当香槟酒被放在客人面前时，曼努意斯基请潘汉年和邓文仪共同干杯，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未来的谈判与合作中取得成功。

香港——潘汉年和张冲在九龙酒店会面

香港。1936年7月8日。

这一天本埠的《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一则寻人广告：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这则在局外人看来极普通的寻人启事，实际上却是极不寻常的。"叔安"是潘汉年，他给南京陈果夫的信中用的就是肖叔安这个化名。黄毅，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派大将之一张冲的化名。登广告是潘汉年在给陈果夫写信约定的在香港取得联系的办法。

广告见报第二天，潘汉年和张冲在九龙酒店会面。一条联结国共两党的谈判与合作的新的重要渠道就此打开。

打通这条联络渠道，仅从2月在莫斯科约定到7月在香港见面，就用了足足半年时间。

2月在莫斯科接受回国任务之后，潘汉年稍事准备，即由中共代表团干部欧阳新护送(潘汉年不懂外语。欧阳原是潘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助手，来苏已久，由他护送，既当翻译又当向导很合适)前往列宁格勒，从那里乘船去希腊，绕道回国。不料船离列宁格勒不久，共产国际急电要他们中途靠岸时速返莫斯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希腊政治情况发生突变，他们将无法在希腊港口安全上岸。直到4月初，组织上重新决策，让当时正在莫斯科逗留的胡愈之陪同潘汉年一道回国。这次是以旅游者身份乘国际列车取道巴黎，转赴马赛再乘船直达香港。因有胡愈之陪同，语言方面没有困难，胡是精通外语的。胡愈之原是中共秘密党员，不久前才从上海经香港、巴黎，赶到莫斯科，任务是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报告，经过杜重远的积极工作，已争取到张学良决心联共抗日的情况。因为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和

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已久，胡愈之获得情报后无法直接向中央报告，只好舍近求远，去向中共驻莫斯科的机构传递信息。可是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和长征途中的中央也已中断联系。潘汉还是半年多之前，即1935年9月，和陈云一起从长征途中辗转了很久，才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有关状况的。潘汉年回国的主要任务是去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另一重要任务便是设法到西北去找到中共中央。为此，他在回国之前，还由卢镜如陪同到"国际"机关去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以便回国后提供中央机要部门使用。

潘汉年和胡愈之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相识，这次同行，组织上事先交代，以后胡的工作由潘直接领导。朋友加同志，两人在漫长的旅途中倒也减少了寂寞，他们多次倾心长谈，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5月末到达香港，潘汉年立即给南京的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人到香港联络。与此同时，他又派胡愈之到上海，去了解目前中共在沪组织活动情况，并进一步打听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情况。

潘汉年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干部。他在香港等待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时，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他先后拜访或约见了当时在港的各方面人物，包括救国会的成员邹韬奋、陶行知，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桂系驻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刘仲容，以及梅龚彬、胡鄂公、钱铁如、叶挺、柯麟等一批朋友和同志，一面向他们了解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状况，一面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准备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合作的意向。当时在港的一般进步人士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福建事变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

的口号上，一些人还在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建议他们突出抗日的大目标而不要强调反蒋的要求，以便创造条件争取实现联蒋抗日。例如救国会当时提的口号就比较“左”，而过“左”的口号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是难以起积极作用的。潘汉年便说服在港的邹韬奋、陶行知，让胡愈之帮助他们按《八一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文件：《告全国同胞书》，这一文件拿到上海后，沈钧儒签了名，章乃器却嫌文件过“右”而不签名，坚持要改。这一文件被转送到陕北，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名义给章乃器等救国会领导人写信作了解释之后，才形成共识。

派往上海的胡愈之很快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他通过关系找到了刚刚从陕北派到上海不久的冯雪峰，将潘汉年到达香港和此行所负的重要使命告诉了冯。冯便迅速赶到香港去向潘汉年介绍了他从陕北到上海前后所了解的情况，并告诉潘说，上海和陕北之间已有秘密电台可以直接联系，从西安到陕北去也已经有了秘密交通渠道。

但是，写给南京陈果夫的信却迟迟未得回应。直到7月的第二个星期，才见到《生活日报》上的那则广告。

原来，陈果夫和陈立夫收到潘汉年发自香港的信件之后，并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立即派联络人员前往香港。原因是复杂而微妙的。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二陈，尤其是陈立夫，确实比较倾向于主张停止剿共内战，和中共进行谈判，促成联合抗日的。但他们也知道反对这一主张的还大有人在。而蒋介石当时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还远没有做出明智的决断，依然在坚持剿共的旧政策轨道上运行着。他当时正在洛阳前线亲自指挥剿共战争，声称不解决共党“武装割据”决不停止军事行动。因此，二陈

虽自去年秋季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秘密行动设法沟通和中共的联系渠道。为谋求通过谈判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他们也不想操之过急，立即打开谈判的门。他们事实上还处在一种政治试探的过程之中，只想先了解一下对手的谈判价码，更寄希望于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行动获得顺利进展，以便增加国民党方面的谈判筹码。因此，在收到潘汉年的信件后，他们没有立即回复。但他们也清醒地知道，已经打开的联络渠道，决不能轻易放弃。他们认识到，谋求和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事实上已经是国民党摆脱被动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是眼下还没有形成非立即谈判不可，除此别无选择的政治气候而已。经过再三斟酌，决定采取低姿态，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和中共代表接触，既可以讨价还价，又留有余地。

这样，到了7月初，二陈才派出了他们的代表张冲，前往香港迎接潘汉年。

南京——潘汉年抵达后被安排在扬子饭店住下

张冲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是位颇为能干又比较开明的人士。他原是一热血青年，投靠国民党实力人物陈果夫、陈立夫，成为CC派的得力干将，深受器重，直到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思想敏捷，头脑清楚，较早地认识到国民党实行坚决反共政策不会有根本的出路，而主张停止内战和中共实行合作。后在国共谈判期间曾秘密访问过陕北，并会见了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受到了积极的影响，更使他确信反共剿共的政策不可取，进一步增强了必须和中共实行联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此后，他一直是一位热心促进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多次参与沟通联系和谈判活动，和中共方面建立了较深的关系。后来不幸病死于重庆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曾亲往吊唁。

在香港九龙酒店会见之后，张冲便请潘汉年随他一起前往南京。轮船从香港到上海足足航行了三天。潘汉年和张冲同处一室。他们虽然是分属于对立政治集团的代表，但又都是具有相当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的人物，即使是初次接触，也不能不进行适度的交谈。张冲首先向潘汉年坦率地介绍了自己的重要经历，并且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他说，他曾经信仰过共产主义。大革命后在哈尔滨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军阀逮捕坐了监狱，是国民党把他从监狱中释放的。从此他便信仰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潘汉年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与观点。他说："我信仰共产主义已有十年。我原是个文学爱好者，也写过作品，编过刊物，希望用文学为改造社会人生服务。但我后来更相信革命是改造社会与人生的最有效办法，我因此也就放下了文学，专门干革命了。我去过江西，参加过长征，到过莫斯科，现在奉命回国和国民党联络，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抗日是我们共产党人当前的主要奋斗目标。谁赞成抗日，我们就同他联合，并不问他信仰什么主义。"

张冲说："我个人赞同你们这个观点。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抗日。信仰的不同不应成为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障碍。在强敌压境的危机严重之际，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内战下去而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潘汉年觉得张冲对联共抗日的态度是积极的诚恳的，便又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对他讲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和重要的方针政策。张冲则表示国民党当局已经在重新检讨原有的政策，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政府正准备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也准备和中共进行谈判解决国内问题，把全国的力量统一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

这两位国共谈判合作的联络代表，经过数日的朝夕相处和坦诚的交谈，彼此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多次的接触与谈判中，他们也一直以诚相见，比较友好。1939年春天，潘汉年从延安去香港途经重庆时，当时在蒋介石手下管苏联军事顾问工作的张冲仍然热心为潘汉年弄飞机票，亲自到机场送行。

抵达南京之后，潘汉年被张冲安排在扬子饭店住下。过了一天，张冲到饭店对潘汉年说，他已将潘的到来向陈果夫、陈立夫先生报告了。二陈要他向潘先生转达的意见是：

一、他们对于潘先生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热诚欢迎。潘先生在南京的安全绝无问题，但请潘先生不要外出活动，保守此行的秘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二、他们目前还不便向蒋先生报告同共谈判的事情。因为蒋先生现在不在南京而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

三、他们决定派曾养甫作代表先和潘先生进行初步会谈，以便同潘先生交换一些国共双方关于谈判的意见。等潘先生去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诸位先生见面，并将中共方面的具体谈判意见带来南京之后，再进行正式谈判。

几天之后，潘汉年和曾养甫就在扬子饭店进行了初步会谈。曾养甫也是二陈手下的大员，CC派的骨干人物。当时任铁道部次长，一直以从事实业和建设方面工作为主。由他出面和中共代表会谈，据说是有助于掩人耳目，便于保密。会谈中，潘汉年首先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条主要意见，即：(1)立即停止内战；(2)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3)军队实行联合抗战。曾养甫表示，他将把这意思报告给国民党中央。接着，他代表陈果夫、陈立夫向潘汉年转达了两条意见，即：(1)国民党对于抗日是有决心的，但需要做好准备。蒋先生反对空谈。目前外交问题敏感而险恶，希望中

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接触搞对外宣传;(2)国民党认为,国共合作谈判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问题。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而中共目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能否像北伐时期那样,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曾养甫最后说,请潘先生把这两条意见向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生等报告。等陕北有了具体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负责和中共进行联络。

和曾养甫会谈结束后,潘汉年便结束了这次神秘的南京之行。他立即赶到上海进行前往陕北的准备工作。他和冯雪峰一起研究了去陕北的交通路线,并决定请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到上海来一趟,以便共同做到妥善安排。

在等待刘鼎来上海的空隙时间里,潘汉年又抓紧时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通过地下党的联系,分别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上层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赞同。不久,刘鼎应约到了上海。潘汉年和刘鼎几年前在中央特科曾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关系颇深。他们一别数年,此番相见倍感亲切。潘汉年简要地向刘鼎谈了他此次回国以及即将赴陕北的主要任务。刘鼎则向潘汉年详细介绍了目前经西安去陕北的交通路线,同时汇报了他目前在西安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红军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工作。

在刘鼎的陪同下,潘汉年8月初到达西安。他在西安停留了两天,然后根据刘鼎的具体安排,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军事防线,于8月8日抵达了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

保安——1936年，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精英人物

位于延安西北百余公里的保安，原是一块偏僻落后的土地。但在1936年至1937年间，这里却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领导机构所在地，聚集了一大批精英人物，策划着中国革命与未来的命运。

潘汉年于1935年春奉命离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队伍，时隔一年半，他又在保安这偏僻角落回到了党中央和红军的中枢机关。这一段时间政治风云变幻和他个人的艰辛跋涉，使他感慨良多。他没有和红军一起走完长征的全程但却经历了一条也许是同样险阻的长征之路。离开红军时，他是扮做商人，混在一群不法商人和鸦片烟贩子当中，偷越层层封锁线，从贵州经广西、广东长途奔波到香港的。然后又经上海、海参崴赶到莫斯科，整整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此次由苏联回国同样经历了许多周折，历时半年之久，才又回到党中央和红军队伍之中。

潘汉年在保安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亲切热情的接待。他是自1934年秋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以来第一个恢复了直接联系的使者。他带来的新编密码，重新沟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的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被孤立和隔离近两年之后，终于冲出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重围，走出了困境。潘汉年被特意安排和张闻天住在一起，以便向这位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详尽地汇报莫斯科的一切以及他南京之行的经过。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的第三天，中央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潘汉年汇报的关于他在莫斯科接受指示以及在南京和国民党当局初步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会

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国民党。并且同意周恩来在会上的建议，决定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9月15日，中央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的问题。

会后，张闻天通知潘汉年，要他准备起程前往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联络与谈判。毛泽东特地给潘汉年发了一份电报，指出"南京政府已确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电报说"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潘汉年离开保安之前，在听取了张闻天的谈话后，又分别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地，接受了他们的具体指示。

9月24日，潘汉年携带着《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简称"八项条件"）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等重要文件从保安出发。临行前，中央又指示他路经西安时去拜访一次张学良，代表中共向张介绍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尤其要说明从联合反蒋抗日到争取联蒋抗日策略转变的意义，说服张"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同时要和张学良一起商讨蒋介石正企图将东北军调离西安开往福建的对策。

和潘汉年一起离开保安前往西安的，还有一位中央大员叶剑英。他是奉命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和张学良谈判有关军事防务的。和这位红军儒将结伴同行潘汉年颇不寂寞。他们一路上谈了许多彼此感兴趣的问题。

在西安，潘汉年原计划立即会见张学良。不巧张患牙疾就医。潘只得等候，并给张冲发电，说明要在西安逗留几天，不料张冲接电后立即飞抵西安，找到潘汉年，询问中共领导对国共合

作谈判的最新决策精神。潘觉得张冲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积极热诚，也就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共中央最近决定的有关国共合作谈判基本方针和各项条件，以及目前陕北的大概情况。

大约一个星期后，张学良牙疾痊愈，潘汉年在孙铭九、苗剑秋的陪同下会见了张学良。他向张详细地陈述了中共中央最近确定的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方针基本条件，并转达了中共希望张学良将军"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争取国民党政府能够转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他们又共同讨论了对付蒋介石准备调东北军去福建使东北军和红军完全脱离接触的企图，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灵活的办法，不让蒋的隔离与孤立东北军的企图得逞。

在此期间，叶剑英也会见了张学良，就军事防务问题进行了讨论。

10月5日和7日，潘汉年和叶剑英两次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他们在西安与张学良分别会谈的情况。

为了尽快将陕北中枢的精神向在上海的上层民主人士转达，潘汉年在离开西安到达徐州中转津浦线火车时，提前给南京的张冲发去电报，请他到浦口见面，他本人将不在南京停留。

当火车到达浦口时，张冲果然已在迎接。潘汉年将从保安带来的几份需要交给国民党当局的文件亲手交给张冲，让张转达。潘说，他将在上海住下来。南京在研究了中共的这几份文件之后有什么答复和建议，请及时和他联系，他将和他联系的地址与办法告知了张冲。随后，潘汉年就过江直接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上海 （一）蒋介石和陈立夫都把形势估计错了

潘汉年是继4月间陕北党中央派冯雪峰来上海之后的第二位中央代表。冯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联系、了解情况。潘这次来

却肩负着更重大的多方面的使命。

潘汉年除等待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外，首先抓了中共的组织建设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机构。他被任命为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办事处迅即开展了工作。

潘汉年还积极展开上层的统战活动。他首先会见了宋庆龄，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并按照毛在保安时的嘱托，向宋庆龄“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和宋一起“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同时约定以后由地下党员李云（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任务。接着，潘汉年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救国会领袖人物的信件亲自交给他们。毛在信中特别写道：“托汉年先生与诸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先生的热烈希望。”并将中共中央最近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一一向他们介绍，并征询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当时在“反蒋”还是“联蒋”问题上，党内外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服党外上层民主人士中的不同意见，并不简单。

不久，张冲到上海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和陈立夫见面。到南京后，潘被安排在大中央饭店，第二天，就由张冲陪同到陈立夫官邸和陈正式见面。陈对潘再次来南京联络表示欢迎之后说：“你带来的几份文件，我们都已拜读了。现在已经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谈判的具体条件。我想先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意见，请你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诸先生转达：（1）对抗日，我们是有决心有打算的。但不能空谈抗日，而应当做好准备。没有准备好，只是宣传空谈，反而会被日本人所利用。（2）贵党文件提出的组织抗日联军的建议，好像是两个国家在谈判，这使我们感到不解。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但都没有军队。中共既有军队，又有所谓苏维埃政府，形成了一种‘割

据'状态。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3)我们的意见,是希望中共放弃这种'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抗日。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那好解决。干部可以适当安插,毛泽东、朱德等先生如感不便,可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陈立夫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国民党决策层虽然表示愿意谈判国共合作,但反共的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们迫于国内外形势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准备和中共谈判实行联合抗日的姿态,但又企图利用联合抗战的名义将中共的武装力量瓦解,将中共的根据地政权取消,迫使中共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成为国民党政权下的附庸力量。

对于陈立夫所谈的意见,潘汉年当场并未直接批驳。因为陈声称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些意见",具有某种试探性质。潘这时的主要任务是联络,是以联络代表身份工作的,因而也就没有就谈判具体条件问题同陈立夫争辩。他只表示可以把陈的意见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达。

和陈立夫首次会晤后,潘汉年立即返回上海,他一面将与陈的会晤情况电告陕北中央,一面继续在上海开展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并不理陈立夫所说的"不要空谈宣传抗日"的要求。

中共中央根据潘汉年报告和形势的最新发展,决定正式委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1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约潘汉年,要他以中共代表身分邀请陈立夫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

11月10日,陈立夫应邀到上海沧州饭店和潘汉年会谈。这次潘以中共谈判代表身分首先发言,他以中共中央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为依据,对各项条款作了具体的阐述,其主要的内容包括:立即停止内战,联合进行抗日,释放所有

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他最后指出，中共希望以上各项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国民党方面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

陈立夫这次也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政府的代表身分发表正式意见。他说："我们的意见，主要就是军队和政权的对立并存问题应当解决。既然中共表示要开诚合作，那我们的条件就是：现在和政府对立的中共政权和军队都应当取消；中共的红军可保留三千人由政府统一管辖，红军师长以上的长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再召回录用。"陈立夫最后说："军队问题如能这样解决，则中共所提的其它各项要求就都好办。"

针对陈立夫所提的上述意见和条件，潘汉年当即指出："这是蒋先生仍站在剿共立场上收编红军的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就是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见潘汉年态度如此强硬激烈，不愿造成僵局，马上又改变语气转移话题。他对潘汉年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谈判也难有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蒋先生愿意和他面谈。"

潘汉年说："如果不把贵党的条件向他报告，仅说蒋先生愿意见他，岂不是要把他骗出来。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沧州饭店的这次谈判实际上毫无结果。潘汉年立即将和陈立夫的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联名给潘汉年的复电中强调说："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沧州饭店谈判情况表明，蒋介石政府企图瓦解和收编红军，是他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力作战的地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谈判，决定在军事上进行必要的反击，以显示红军的力量不容轻视，迫使蒋放弃收编红军的企图，停止内战。11 月 18 日，中央

军委下达粉碎蒋军进攻的命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1月21日在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团,达到了预期的军事与政治的双重目的。

蒋介石也是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的。他一面部署三个师的兵力"围剿"红军,一面又由陈立夫出面邀请潘汉年于11月19日举行又一轮会谈,企图在军事压力下迫使中共让步就范。会谈中陈立夫仍然坚持原先提出的无理要求,潘汉年则坚决拒绝。至此,国共谈判似已无法继续下去。不过张冲一再向潘汉年表示,谈判不宜中断,双方仍应保持密切联系。

根据潘汉年报告的谈判情况以及各方面的反映,中共中央12月8日致电潘汉年时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

这一段时间的国共谈判所以无法获得进展,原因就在于蒋介石一直坚持他的那些无理要求。他始终不愿放弃消灭中共的目标。即使军事上达不到目的,也需在谈判中施加压力,企图瓦解红军,取消根据地,在事实上达到"溶共""灭共"。周恩来在谈到这一段时间谈判所以未能取得突破的原因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想法。"陈立夫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时间的谈判时也说:"那时候的情形,我们好像是接受中共投降,他们只要我方停止剿共,提其他条件,我们都可接受。"

蒋介石和陈立夫都把形势估计错了。

上海　(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潘汉年的精明和干练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蒋介石的顽固态度

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就在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之际。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在西安,但在上海的潘汉年却因此而紧张忙碌起来。中共中央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参与协商后,迅即将中央精神电告上海,要地下党及时向各阶层人士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以争取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12月19日和12月21日,毛泽东接连两次给潘汉年发电报,要他主动与南京政府洽谈有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并重申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南京一度陷入惊慌失措状态。宋美龄惊魂稍定,就请阿哥宋子文赶到上海会见宋庆龄,希望从这位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阿姐那里打听到中共对此事变的立场与对策。宋庆龄紧急约见潘汉年,潘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时做了说明。

陈立夫也派人到上海向潘汉年探听有关情况。CC作为国民党中央情报中枢机构,对于此次事变事先竟一无所知,没有发出任何先兆性的警报,致使蒋介石突遭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次重大挫折。

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及时赶到南京去分别会见了宋子文兄妹以及陈立夫先生。向他们再次转达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实现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12月26日终于签订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协议,其中包括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中共早就提出的重要条款。

协议是签订了,但贯彻落实却大费周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同意签订协议,但又不甘心于此次的挫折而及时认真地履行协议。他在回到了南京之后不仅背信弃义扣押并审判了张学良,而且继续派重兵进逼延安,准备讨伐异己。内战的阴

云密布，东北军内部此时已发生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严重对立。中共不得不以大局为重，继续向各方进行艰巨的说服工作，努力争取使一纸协议变成事实。

1937年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嘱他通过各种渠道敦促蒋介石政府实践诺言，履行协议。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从西安给潘发电，要他去和宋子文取得联系后速去西安报告情况。潘汉年在张冲的协助下，乘国民党军用飞机赶到西安，稍事逗留又返上海。

1937年1月5日，张闻天再次给潘汉年打电报，向他部署一系列任务，包括：通过关系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活动，要他们促进解决西安事变协议的实现；向宋子文做工作，要宋“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表示我们拥护他调解的诚意”；通过杜重远从熊式辉那里了解何应钦等亲日派目前动向。潘汉年接到电报后迅速展开活动，积极完成上述各项部署，并很快就向张闻天复电报说：“已请大姊（指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已派人去孙（科）冯（玉祥）处活动”，“已嘱杜重远、叶挺设法往南京”。

为了尽早促成和平协议的实现。中共方面在具体问题上还做了一些主动的让步。1月25日，毛泽东给潘汉年发电，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但要求给红军“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同一天，周恩来又给潘汉年发电，要他敦促蒋介石政府保证在和平解决问题之后不再发动战争，并要求蒋先生手书保证以消除各方疑虑。

在中共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协议的许多障碍终于逐步消除，一度出现的危机也随之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的国共合作，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7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人士的努力，通过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联合抗日的相关决议。

随后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等在西安进行了国共合作的实质性谈判。3月下旬，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杭州会谈。去杭州之前，周恩来在上海让潘汉年将中共方面所提出的有关国共合作的15条具体意见先递交宋美龄，请她交给蒋介石，为会谈作好准备。然后，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前往杭州和蒋进行谈判。

周蒋杭州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原则的共识。随后，蒋介石指定陈立夫、宋子文，周恩来派潘汉年，就政治合作和红军经费预算等具体问题分别进行洽商、谈判，到"七七"事变前，上述具体问题的谈判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上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上形成。

大量资料显示，自1936年春自莫斯科受命回国到1937年夏在上海、南京和陈立夫、宋子文谈判取得了一系列的结果，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说是历尽艰辛的，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前后几个月非常困难而又特别紧张的时间内，他成了陕北中枢机构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之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热线"。他肩负重任，风尘仆仆地活动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辛辛苦苦周旋于敌、我、友以及各方实力人物之间；或苦口婆心，或唇枪舌剑，为贯彻执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落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各项决议，推动新的国共合作的实现而竭尽全力。

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的重要贡献，不仅受到了中

共许多领导人的表扬,凡是和他有过接触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们,对他也是深为赞许。宋庆龄、沈钧儒等进步朋友固不必说,他们和潘汉年之间从那时起便建立起真诚友好的关系;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一些当事人如陈立夫、宋子文、张冲等,也不能不承认潘汉年的精明干练和积极负责的工作精神,并对他表示钦佩。

尾　声

一、历史是曲折的

1963年1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刑事判决书上写道:被告人潘汉年从1936年起叛变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1936年4月被告人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国共谈判联合抗日的意见。被告人到达香港后,竟秘密写信给国民党中委和中统局特务头子陈果夫要求会见,由该局另一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委陈立夫指派特务张冲到香港和被告人联系,被告人向张冲密告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具体条件,交代了自己的履历,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被告人充当了国民党特务后,同陈立夫及其部下张冲等保持密切联系,供给了国民党有关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同国民党斗争的策略,以及陕北红军人数、物资供应情况,红军与东北军前线的情况等许多重要情报……

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1982年8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写道:关于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的问题,经复查,

1935年8月1日，我党发表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宣言以后，南京国民党当局曾派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潘汉年同志当时正在莫斯科，也参加了这些会谈。随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会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汉年同志回国后，一面同国民党当局联系，一面通过党内秘密交通关系，到达陕北，向中央报告了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以及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的情况。不久，中央就决定派他带着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进行谈判。这段经历是完全清楚的，党中央是完全了解的，潘汉年同志在1936、1937年间，是我党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的正式代表。当时，他与陈立夫、张冲等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经常联系国共谈判的事宜，根据中央1935年《八一宣言》和其它通电的精神，向他们谈了我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和条件，介绍自己的一般经历，均属于正常来往和正常工作范围，并没涉及党的机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根据中央档案馆所存当时的文电档案材料证明，他是坚定地按照党中央的谈判方针行事的。在此后几十年中，也无任何事实表明，潘汉年同志有勾结国民党给我党造成危害的行为。因此，所谓潘汉年同志"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根本不可能成立。……

（尹　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历史谜案揭秘
作者＝
页数＝３８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５５７７
出版日期＝